

# 摘 译

外国哲学历史经济

上海外国哲学历史经济著作编译组编

1

4:9-7-6

上海人民出版社

**摘 译**

外国哲学历史经济

一九七六年第一期(总第十三期)

上海外国哲学历史经济著作编译组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0 1/32 印张 5 字数 112,000

1976年1月第1版 1976年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2171·98 定价: 0.37元

**内部发行**

## 目 录

### · 慕尼黑事件 ·

- 慕尼黑阴谋的历史和现实 ..... 本刊编辑部( 1 )
- 慕尼黑阴谋 ..... [英] 安德鲁·罗思坦( 6 )
- 希特勒在慕尼黑的胜利 ..... [英] 罗伯特·佩恩( 24 )
- 慕尼黑回顾 ..... [捷] 帕维尔·埃斯列尔( 42 )
- 玩火 ..... [苏] 《真理报》( 57 )
- 英国在对付希特勒中能够做些什么?  
..... [英] 温斯顿·丘吉尔( 60 )
- 张伯伦外交政策的剖析 ..... [加] R·P·达特( 68 )
- 英国亲德外交的内幕 ..... [英] 克劳德·科克布什( 72 )
- 英国外交的秘密 ..... [美] L·法拉戈( 75 )
- 慕尼黑协定的反响 ..... [日] 菅本骏二( 78 )
- 我的离国出走 ..... [捷] E·贝奈斯( 86 )
- 张伯伦对慕尼黑协定的辩护  
..... [英] V·M·托因比等( 89 )

黑暗后的光明……………〔英〕内维尔·张伯伦(97)

寻求和平……………〔英〕内维尔·张伯伦(111)

论慕尼黑……………〔英〕爱德华·哈利法克斯(117)

慕尼黑危机的真相……………〔英〕弗雷德里克·莫姆(120)

\* \* \*

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美〕科林·利格姆(130)

**小资料** 《日本与中国》周刊简介……………(152)

日本史学动态……………(153)

## 慕尼黑事件

# 慕尼黑阴谋的历史和现实

本刊编辑部

本期可以说是“慕尼黑事件”的专辑。选译的文章，有三十年代的，也有七十年代的；有评论，也有回忆；有阴谋的揭露，也有无力的辩解。文章的作者，绝大多数是运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叙述和评论“慕尼黑事件”的。但是，这些文章也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慕尼黑事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以及它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读一点慕尼黑阴谋的历史，分析一下勃列日涅夫在赫尔辛基会议前后策划新的慕尼黑阴谋的现实，对于克服和平麻痹思想、加强反侵略战争的准备，是很有意义的。

慕尼黑阴谋是现代世界史上大国主宰世界、出卖小国的巨大阴谋之一。希特勒和张伯伦之流共同策划了这个阴谋。问题倒不在于这个阴谋本身，而在于当年策划这个阴谋的许多人物，在策划这个阴谋、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前后，竟象蚊子那样，“哼哼地发一篇大议论”，以“说明人血应该给它充饥的理由”（鲁迅：《华盖集·夏三虫》）。这是很值得注意的。这一类议论，要而言之，大致上有：

一曰：慕尼黑会议给人们带来了“时代的和平”。这是张伯伦叫得最起劲的论调。今天，这句话早已成为笑柄了。但在当年，却也确实欺骗了不少人。

一九三四年希特勒上台以后，就积极策划重新分割世界的

阴谋。他重新占领了来因兰和奥地利，兵临捷克斯洛伐克边境，进一步妄图囊括欧洲。面对希特勒这样穷凶极恶的霸权主义者，是坚持斗争，还是妥协退让？这是当时摆在世界人民尤其是欧洲人民面前的重大问题。张伯伦之流以为，希特勒要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只要把苏台德区割让给他，就可以换得“一代人的和平”，即达到损人利己的卑鄙目的。但是，事实很快就粉碎了张伯伦的如意算盘。“慕尼黑协定”的墨迹未干，希特勒就迅速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整个国土；不久，又兵分三路大举入侵波兰，掀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张伯伦的目的是损人利己，但是，在法国灭亡、几十万英军从敦刻尔克狼狈溃逃之后，英伦三岛也逃不脱希特勒狂轰滥炸的厄运。这真是对所谓“时代的和平”的莫大嘲弄。“慕尼黑协定”刚刚签订，毛主席就高瞻远瞩地指出了张伯伦政策的反动实质：“张伯伦以损人的目的开始，以害己的结果告终。这将是一切反动政策的发展规律。”（《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历史雄辩地证明了毛主席当时的论断是多么的英明！

二曰：签订“慕尼黑协定”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什么叫两害？照张伯伦之流的说法，一害是爆发战争，一害是割地求和。割地求和虽然不好，但比起爆发战争来还是好。这是典型的投降哲学。割地求和、重定边界能够防止战争吗？当年，希特勒在“慕尼黑协定”上签字以前，一再说：“这是我在欧洲的最后一次领土要求。”但是话音未落，不仅是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而且是整个捷克斯洛伐克，不仅是捷克斯洛伐克，而且是整个西欧，都落入了希特勒的魔掌。“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论人民民主专政》）在希特勒这一类的野兽面前，谈论什么“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不是为虎作伥又是什么？

在三十年代，英法等国的兵力，是不是已经衰弱到不能对希特勒作战的地步了呢？根本不是这样。《慕尼黑阴谋》一文指出，在一九三八年秋天，德国法西斯只有五十五个师的兵力，其中有些师装备还较差；而据当时法国甘末林将军向张伯伦汇报的材料证明，仅法国就可以动员一百个师参加作战，捷克斯洛伐克至少也有三十个师的兵力，如果加上英国和苏联的军事力量，打败希特勒是绰绰有余的。希特勒这类人物都是一些色厉内荏之徒，他们自己也未尝不知道这一点。如果当时张伯伦响应斯大林提出的结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希特勒的灭亡肯定将会更早一些。

情况既然是这样，为什么张伯伦在希特勒的咄咄逼人的气焰面前，仍然大搞“绥靖政策”呢？这不是偶然的。张伯伦是英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英国外交的秘密》指出：“由于张伯伦迁入了唐宁街十号，英国金融界的亲德反苏政策便胜利地进入了内阁衙门。”张伯伦不遗余力地大搞“绥靖政策”，目的还是为了把祸水东引，推向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苏联。但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张伯伦的这种把祸水东引的政策，到头来，还是把希特勒这股祸水引到了自己的身上。这当然是张伯伦始料所不及的，但在帝国主义集团中，这却是必然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三曰：“‘慕尼黑协定’不是德国的一份不容讨价还价的命令，而是一个在国际委员会主持下国际间安排的解决办法。”这是一种阿Q式的辩解。在戈德斯贝格，希特勒提出的强占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区的蛮横要求，并不因“慕尼黑会议”而有所改变。所不同的是，戈德斯贝格最后通牒是赤裸裸地军事占领，而慕尼黑协定是披上所谓国际协商的外衣，把苏台德区奉献给纳粹德

国。不但如此。当希特勒不满足于仅仅攫取苏台德区，而提出凡是有日耳曼人居住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土都要霸占的时候，张伯伦所谓的“国际委员会”又干了什么呢？“慕尼黑协定”规定：“其余日耳曼特征最强的领土，将由国际委员会迅速确定，并由德国军队占领。”原来所谓的“国际委员会”，不过是希特勒手中肢解别国领土的屠刀。事情就是这样，在希特勒这样的霸权主义者眼中，什么协定、条约，什么国际委员会，通通是不算数的。当年，张伯伦拿了一张希特勒签字的废纸返到伦敦，就手舞足蹈，自以为“得胜回朝”了，就是典型的阿Q精神的体现。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慕尼黑阴谋已经成了历史。但是，“历史在重演，不过是在新的基础上重演。”（斯大林：《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今天，勃列日涅夫代替了希特勒，他策划的赫尔辛基会议同三十年代的慕尼黑会议是多么相似啊！令人惊异的是围绕赫尔辛基会议，苏修以及那些为虎作伥的人发出的议论，同当年围绕慕尼黑会议发出的议论竟是大同小异，什么赫尔辛基的这次会议“开创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新阶段”呀！赫尔辛基会议规定了“边境不可侵犯”的原则呀！这次会议“既无胜者败者，也无得者失者。这是理智的胜利”呀！等等，等等。这些议论也同蚊子一样，无非是使被吃者在被吃之前，“先承认自己之理应被吃，心悦诚服，誓死不二。”（《华盖集·夏三虫》）事实是，赫尔辛基会议不是什么“开创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新阶段”，而是开创了国际紧张局势的新阶段；不是什么“边境不可侵犯”，而是把大片大片东欧国家土地，正式划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不是什么“理智的胜利”，而是勃列日涅夫新沙皇的胜利。希特勒如果看到苏修新沙皇步他的后尘，在欧洲这样的称霸扩张，一方面当会感到苏修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似的安慰，一方面也许会感到自己不免有点是小巫之见大巫了罢？日益觉醒的欧洲

人民说得好，赫尔辛基会议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设下的“陷阱”，是“西方的另一次慕尼黑”。这就是当代欧洲的现实！

大浪淘沙，汹涌澎湃的历史洪流早已把希特勒和张伯伦之流冲刷得无影无踪了。七十年代已不是三十年代了，七十年代的世界人民也不是三十年代的世界人民了。毛主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前夕指出：“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论联合政府》）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胆敢发动侵略战争，经受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锻炼的世界各国人民，一定会把这头比希特勒还要凶恶的野兽送入坟墓！

# 慕尼黑阴谋

〔英〕安德鲁·罗思坦<sup>①</sup>

“慕尼黑”，这一令人不胜震惊的事件，对今天的三十五岁以下的人来说，都是没有亲身体会的。对大多数人来说，“慕尼黑”也只是历史书里讲讲的事情，或者是报刊政论文章中提到的事情。它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词汇，不必再加以阐明了，但情况并非如此。

在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的日子里，“慕尼黑”是朋友之间和家庭、党派、国家内部造成看法上对立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在英国和法国，更是如此。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正是由于这两个国家的发号施令，也是由于纳粹德国的武力威胁，欧洲一个最繁荣、最民主、最进步的国家碰上了一桩使人不禁为之目瞪口呆的遭遇。不出三个星期，不顾这个国家的政府明白无误的反对，无视它的人民的悲痛，也违背了它强大的军队的强烈意志，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未经一战就被肢解了，它的民主体制没有遭到反革命政变就此崩溃了。

## 希特勒的计划

纳粹德国的统治者多年来就一直在策划重新分割世界。他

---

<sup>①</sup> 作者是1938年时常驻日内瓦国际联盟总部的英国记者。

们的目的是要推翻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的协约国一方所规定的对国际问题的解决办法。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间拟订的凡尔赛和约所加在德国头上的条约义务，根据和约规定的德国的以及一些新成立国家的边界，所有这些都必须推倒重来。德国要的是建立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均势。这是它要树立世界霸权的跳板。这在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中是说得一清二楚的。

一九三八年三月至十月的日子里，希特勒又在过去一连串的胜利纪录上加上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征服。这是获得新均势的一个决定性的、达到了高潮的阶段。

没有捷克斯洛伐克，就不能控制从来因河和美因河到多瑙河流域的通道，也不能控制沿喀尔巴阡山脉北麓到多瑙河流域的另一条德国通道，从而也就不能控制到多瑙河以东去的通道。捷克斯洛伐克古老的由山脉构成的天然屏障，就象是突入德国南部的一个巨大的有坚强防御工事的拱门。如果捷克斯洛伐克能转而成为德国在中欧的突出部，三条通向多瑙河流域的军事路线就全都打通了。

有了捷克斯洛伐克，这就意味着拥有现代化工业技术的、在飞机、坦克、装甲车、运兵车等军事装备方面占有优势的德国，在战略上将能向西进军到地中海，向东南到达达尼尔海峡，向东到波兰和乌克兰的平原地带，而不必担忧会遭到重大侧翼攻击的危险。中欧或东南欧其他国家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相比，工业发展水平都没有后者高，民主团结精神也没有后者强烈，因此一旦发生战争，且不说地理条件如何，它们之中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取捷克的位置而代之，以构成对德国军事活动的威胁。

捷克屏障的撤除，其重要意义还远远不止于此。没有捷克，法国就失掉了它在中欧的最强大和可靠的盟国。它也早已失掉

了它过去在那个地区的一些盟国(波兰、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中的影响。现在它几乎是孤立了,只有英国和苏联还对它表示善意。

捷克屏障的撤除也意味着雄厚的德国金融资本在第一次大战中受到挫折后,又一次向土耳其、巴格达和印度洋进军了。这种进军直接威胁着印度洋周围的英国领地。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就只有土耳其还构成向印度洋进军的真正障碍。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区别,在于飞机和其他使用石油的军事装备的作用大为增加。捷克屏障的撤除,就使德国有可能轻易地从重要的罗马尼亚油田获得石油。再占领第二个障碍土耳其之后,德国就能打开伊拉克和波斯湾这第二片油田的大门,而这也就是通向印度的最后一程路了。

除了这些战略上的考虑之外,继奥地利之后又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再加上随后占领其他地区的可能性,德国就将囊括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西里西亚地区的巨大重工业设备以及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巨大粮食资源,还将拥有巨大的新的人力资源。

希特勒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试图通过内部征服捷克斯洛伐克。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和十二月间,他试图通过同贝奈斯进行秘密谈判,说服后者同意签订一个条约,规定两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诉诸武力”,规定人民可以有权自由“宣布准备接受德国国民身份”,而作为交换条件,德国将承认捷克斯洛伐克现在的边界。这实际上意味着德国有权在捷克组织纳粹党的支部,从而从内部颠覆捷克斯洛伐克。同时,捷克还必须废弃同法国和苏联签订的互助条约,从而在国内瓦解的过程中孤立无援,最后允许希特勒可以直接发动进攻。

虽然贝奈斯是准备在谈判中作出很大让步的,但他也不愿意掉入这样明显的陷阱。结果在一九三七年春,德国报纸发动

了一场有组织的反捷宣传运动。与此同时，明眼人不难看出，德国纳粹分子控制的亨莱因的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德国人”党也采取了行动。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八日，这个党公开提出捷克要废弃同法国和苏联签订的条约，还要求捷克外交政策同德国外交政策“协调一致起来”。

但是，希特勒的准备工作还不仅仅限于进行政治阴谋。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四日，他的武装部队总司令布洛姆堡签署了“绿色方案”（侵略捷克斯洛伐克计划的代号）的第一个草案。随后又进行了其他准备工作。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希特勒在总理府找空军总司令戈林、外交部长纽赖特、海军总司令雷德尔上将、战争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布洛姆堡将军、陆军总司令弗里奇将军等开会时，第一次全面地摆出了进攻的想法。希特勒在发言中阐述说，德国需要生存空间，并宣称，“他已下定决心要用武力解决德国的问题。”他认为，“英国几乎已心照不宣地放弃了捷克人，而法国大概也是一样。”他明白无误地指出，他的目的是把捷克斯洛伐克“吃掉”和“并入”德意志帝国，还提到以后要从捷克斯洛伐克“强行迁出两百万人”。

当然，在公开场合，希特勒和他的代言人继续对捷克斯洛伐克和它的所谓的朋友提出保证，说他是要和平的。正如他在两星期后对哈利法克斯勋爵所说的那样，德国所要的只是捷克斯洛伐克应“合情合理”，只是要“同邻居保持和睦关系”，只是要“巩固和平”。哈利法克斯勋爵提到，对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奥地利的疆界，“随着时间的消逝”，“可以作出一些调整”。希特勒对此也没有表示异议。一个月前，亨莱因也曾在伦敦散布过这种温和的善意。对此颇具好感的范西塔特勋爵告诉亨莱因说，英国将“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做工作，为苏台德日耳曼人谋求最大限度的自治”，但不能容忍武力。十二月一日，艾登先生也对意

大利驻英大使格兰迪说，英国准备支持一个“按照德国的意愿，即根据自治原则”而拟订的解决办法，“并且法国也会这样做”。迟至一九三八年三月三日，希特勒还只是对英国驻柏林大使说，要圆满解决捷克问题，“必须使日耳曼人享受文化和其他方面应有的自治权利”。

总之，希特勒在十一月五日会议以后的几个月里，就在一再试探他得到的关于英法已“心照不宣地放弃了捷克人”的印象是否确实。

## 奥地利之后

三月份，在纳粹占领奥地利之后，德国报纸和电台突然爆发了一阵关于捷克人“压迫”苏台德日耳曼人的宣传浪潮。重要的是，这次运动一爆发，德捷边界上就有了军事调动。这个突如其来的威胁是起作用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内那些非纳粹的日耳曼人党派就此退出了捷克联合政府，有些人就此加入了亨莱因的组织，而该组织已开始“弹起并入德意志帝国的调子了”。

情况是，三、四月份时亨莱因的党已在靠近德国的一些地区发动一场恫吓运动，以粉碎任何不接受它作为捷克斯洛伐克国内日耳曼民族发言人的抵制活动。恐怖活动包括：如果有工人和职员拒绝参加苏台德德国人党，就使他们失去工作岗位；在反对者的住宅外面游行示威；在学校里虐待和凌辱他们的子女；抵制到他们的商店购货；有时甚至不准就医治病。

希特勒此时对他的副官霍斯巴赫谈到了更大的计划。他必须帮助墨索里尼获得一个非洲帝国，但为此，先决条件是捷克斯洛伐克。这位副官的记录中写道：“要囊括捷克而归”。四月二十二日，即希特勒同凯特尔元帅谈话后一天，霍斯巴赫又记下了绝

密的“绿色方案”的要点：“在经过一段时期能逐步导致危机从而导致战争的外交谈判之后”就采取行动。可以随着一个偶然事件（“例如德国公使被杀害”）的发生而采取行动。这个行动将是闪电式的，由摩托化部队在四天内完成，“使外国认为军事干涉是没有希望的”。

捷克政府早已受到英法政府施加的极大压力，要它迁就亨莱因，因此，对德语区的恐怖活动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这就鼓励了纳粹分子去实行希特勒同意的下一个步骤。四月二十四日，亨莱因在卡尔斯巴德发表了演说，比以前更加强硬地提出了旨在从内部瓦解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纳粹计划。

他要求苏台德地区享有完全的自治权，名义上是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主权下，全部官职却要由德语民族的人来担任。他也要求他的党有权控制全部捷克境内讲德语的公民，不管他们是在哪里。第一个要求意味着摧毁保证捷克斯洛伐克独立存在的军事屏障，因为共和国的大片边界堡垒都将由亨莱因加以控制。第二个要求意味着摧毁捷克的政治屏障，因为这意味着不仅会瓦解捷克全境的民主体制，而且连国家本身也势必随之而崩溃。他还要求彻底改变捷克斯洛伐克的对外政策，抛弃同其他斯拉夫民族的现有联系，“同受德国影响的中欧进行合作”。

五月份，德国部队在捷克边界的调动实在令人心惊胆战了。德累斯顿的英国代理领事报告说，他们是在西里西亚南部和奥地利北部一带集结，同天（五月十九日）的来比锡《日报》也证实了这一点。此时，亨莱因的党宣布在捷克境内成立“志愿保卫”组织。它是按照纳粹冲锋队的形式组成的，实际上这个组织早已存在，并暗中接受边界那边德国人送来的武器。同时德国报纸也不断威胁，如果不“解放”苏台德日耳曼人，捷克斯洛伐克就要倒霉。换句话说，除非捷克人拱手交出它设防的地区，否则，

德国就将整个地摧毁他们的国家。

五月二十日，形势如此危急，捷克政府于是发出了部分动员令，英法公众舆论对此也表示同情。捷克境内纳粹的种种挑衅性恐怖活动立即停止了，柏林报纸的语气也变得温和了，德国军队也没有入侵捷克。但是，德国人不久就发现英法政府对捷克政府的行动是恼火的。因此，在暂时缓和了一阵之后，德国又恢复从外面施加压力，通过典型的办法，由亨莱因在五月二十六日接见《每日邮报》的记者。在这次接见中，他露骨地威胁说，如果不让德语区享受完全自治，德国就将发动军事进攻。

现在，希特勒暗中又向他的目标跨出了一步。五月二十八日，他下达了修改“绿色方案”的命令。两天后发给军事领袖的新方案，开头是这样的：“我的不可变更的决心就是在最近即以军事行动粉碎捷克斯洛伐克。”该方案依旧详细交代了“闪电行动”的方法，但不再选择德国公使作为可以杀害的对象，而强调了另一方面。所谓“无可忍受的挑衅”应该“至少在世界上一部分舆论看来，是构成采取军事行动的道义上的理由的”。这表明，伦敦和巴黎政府对希特勒的要求已愈来愈有同情感这一点，希特勒是了如指掌的。希特勒的指示还说明，他已在考虑征服捷克以后的事。他命令尽可能保留“捷克的工业设施”，因为这对“重要工厂”迅速恢复生产以“加强总体战的经济力量”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行动日期定为一九三八年十月一日。

六月间，秘密军事准备和公开报纸舆论的密切配合又重新开始，德国报纸的反捷运动达到了新的高潮。德语区当局总是被描绘为进行着“血腥的恐怖统治”，捷克政府的行为总是被说成是“残忍的”、“可恶的”、“罪恶滔天的”等等。五月二十二日后的三个星期是进行市镇选举的时候，选举会上的任何小纠纷，酒店里的任何小争吵，都被利用来作为新的辱骂和威胁的依据，真是到

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因为当时到苏台德区访问的外国记者都可以证实，这些指控和辱骂实际上是没有根据的。的确，连德国自己的驻捷公使艾森洛尔也在六月九日向柏林提出抗议，说这次运动显然完全不顾真实情况，导致卡尔斯巴德和马利恩斯克温泉等胜地营业一落千丈，因为人们误认为这些地方是在“战区”内。

但是，这位在他主子的军事指示中至今一直被认为是可以作为牺牲品的德国外交家，确实是头脑简单，幼稚透顶。因为，通过这些活动，德国已在欧洲创造了一种不安气氛，有利于纳粹重新对捷克提出条件，这就是六月七日亨莱因的党提出的“十四点”备忘录。

备忘录要求有一个代表共和国全体日耳曼人（不管是否住在将要建立的日耳曼自治区内）的议会。如有需要，还应举行公民投票。

这个自治“议会”将对讲德语公民行使广泛的权力（包括进行纳粹主义教育的权利）。这个议会的代表由德语区选举产生。议会推选出来的议长，将是中央政府内阁和共和国最高国防委员会的当然和终身成员。因此，在“自决”的外衣下，这个计划的实施就等于是分裂这个国家，特别是向纳粹德国敞开了门户。

英法政府不仅没有对这些要求加以谴责，而且在戈培尔六月二十一日发表了威胁性的演说（“当三百五十万日耳曼人受到虐待时，我们不能再袖手旁观了”）之后，也没有加以批驳。六月二十七日，英国外交部次官巴特勒反而说，在那篇公开发表的演说文本中，找不到这句话嘛！

## 军事讹诈

七月二十三日，捷克政府公布了它所拟议中的新的民族问

题法典的内容。德国报纸大肆攻击说，这是在耍花招。亨莱因在七月二十五日对报界说：“就我们而言，战争是不会发生的。”但如果到秋天还达不成协议，那时可能发生什么事他就不能负责。他说他是在“约束”自己的人民，他们要求“并入德意志帝国”。面对新出现的僵局，英国却派出了朗西曼勋爵到布拉格充当“调解人”。德国人得到了这个消息真是兴高采烈。德国驻伦敦的一个著名记者在电讯中说：“这是自从第一次大战以来第一次公开地试图修改凡尔赛和约的主要内容。”《小巴黎人》报驻柏林记者八月二日发出的电讯说：“我们可以说，由于朗西曼勋爵将扮演为泛日耳曼主义服务的角色，这一点是柏林欣赏的，但是如果认为纳粹领导会接受妥协办法，这是很成问题的。”

八月份的事态发展提供了具体的证据，说明这位记者完全言之有理。朗西曼勋爵在捷克活动极其神秘，周末经常同一些亲纳粹的大地主大富商在一起。与此同时，德国政府在八月上半月动员了数十万后备军参加“军事演习”，还派了几十万人去德国西线筑防御工事。为了加强这些行动在国外的效果，使讹诈更起作用，德国当局开始几乎是公开地暗示说，战争迫在眉睫了。

八月十九日，戈林的报纸《国家报》发表了一位前匈牙利总参谋部上校写的文章，然后德国各地广泛加以翻印。此文心安理得地议论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方法和前景，把捷克描绘成为“对付苏联的西欧防御中的薄弱环节”。此后不久，在法国空军总参谋长维耶曼将军访问德国时，戈林笑嘻嘻地问他说，如果德国同捷克开战，难道法国真的会打德国吗？八月二十二日，德国驻莫斯科、贝尔格莱德和布加勒斯特的代表分别通知当地政府说，一旦苏台德地区发生武装冲突，德国将向苏台德日耳曼人提供“一切支持”，并问苏联等国的政府，它们将抱什么态度？八月

二十六日，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纳粹报纸看来是发出了这样一场冲突的信号。这样的搞法多年来在国际上已屡见不鲜——据说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散发了“秘密通报”，命令党员起来暴动，于是亨莱因党的领导人就发布告示，号召他们的党员群起“自卫”，即发动内战。

此时，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朗西曼勋爵和亨莱因的党正在进行谈判——进行得拖拖拉拉，因为后者本来是在执行着一种拖延政策。贝奈斯交给亨莱因的一个建议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使纳粹也感到非常吃惊。里宾特洛甫为此重申了谈判的意图，他在八月十七日说：“关于如何答复贝奈斯的建议这一问题，已给亨莱因发了总的指示，即一定要使谈判继续进行下去，不要断了线；一定要继续不断地提出对方无法接受的要求。”

到九月五日，贝奈斯已起草了“第四次方案”。当天捷克政府通过了这一方案，两天后交给了亨莱因党的领袖。这一方案给予讲德语公民的权利基本上就是亨莱因所要求的。朗西曼勋爵后来也承认，如果亨莱因在卡尔斯巴德提出的要求就是他真心实意要得到的东西，那末这个要求实际上已经得到了。

亨莱因一伙担心的时刻到来了。如果他们接受这一方案，那末，他们就要被“束缚住手脚了”。必须迅速采取对策。他们得到了《泰晤士报》的帮助。《泰晤士报》在过去四个月里，曾一再建议分割捷克，通过公民投票或其他办法把德语区交给德国。亨莱因过去的几次建议从未提出过这一要求，使亨莱因分子陷入困境的“第四次方案”也没有包括这一点。但显然英国政府只是一心一意要讨好希特勒，而《泰晤士报》的编辑正是多年来一直“同鲍德温、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保持亲密的私人友谊关系”的一个人。在他的监督之下，《泰晤士报》撰写了一篇社论，发表于九月七日。这篇社论建议说，如果苏台德日耳曼人和捷克斯洛

伐克人实在无法达成在一个国家内生活的协议，那末苏台德区（即捷克斯洛伐克设有防御工事的多山地带）可以交给德国。这篇社论在全世界轰动一时。

这篇社论发表的当天晚上，苏台德日耳曼领袖以一个完全是捏造的“暴行”（说捷克警察打了摩拉维斯卡-俄斯特拉发的议员）为借口，宣布同捷克政府进行的关于贝奈斯方案的谈判就此中断。德国报纸对《泰晤士报》的社论表示欢迎，对捷克的“暴行”则大发雷霆，这一次不是强调捷克警察的“残忍性”，而是强调了捷克政府“软弱无能，不能维持秩序”。言下之意，德国必须进入捷克以恢复秩序，这个意思已是昭然若揭的了。

捷克斯洛伐克德语区纳粹暴行和对警察的袭击已日有所闻，不足为奇。九月九日和十日，希特勒同他的将军们在纽伦堡讨论对捷克“发动闪电战”的计划。九月十日，戈培尔在纽伦堡发表演说，谴责布拉格是“布尔什维克阴谋颠覆欧洲的组织中心”。第二天，戈林又发表演说，宣称德国不再能“容忍对我们的日耳曼兄弟加以伤害”，并详细谈到备战情况，“使听众感到欧洲已处在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的边缘”。在其他地方，紧张局面也不断加剧。就在戈林发表演说的那天晚上，英国首相向报界发表声明，再一次威胁说，如果德国发动战争，它将发现英国会站在法国一边反对它（这一点已不是什么新东西），但又说，只要德国继续愿意谈判，它可以从捷克斯洛伐克得到它所要的一切（这正是希特勒要听的话）。九月十二日，希特勒在纽伦堡发表演说，作出了答复，表示他是愿意同英、法、波兰保持和平的，但他威胁捷克说，如果捷克不接受亨莱因的要求，就要同捷克开战。这篇演说的特点在于，它不仅侮辱捷克人民和贝奈斯，而且还大耍无赖，胡诌什么捷克斯洛伐克德语公民“受尽折磨”，还直接鼓动亨莱因分子起来闹事。

这就是十二日晚亨莱因分子在一些重要地点起来闹事的信号。边界地区一些公家的大楼被占领,还使用了炸弹,杀死和绑架了一些警察。十四日,亨莱因分子的头头们逃到边界那边。第二天,他们在德国电台上发表声明说,日耳曼人已不可能同捷克人共同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要求苏台德即行并入德国。然而,这次闹事还是轻易地被警察和军队镇压了下去,根据捷克的官方数字,死二十七人(其中十六个是捷克人),伤七十五人(其中六十一个是捷克人)。

### 从贝希特斯加登到慕尼黑

十三日晚,张伯伦(反映了他自己的恐惧感和法国政府的恐惧感,认为希特勒即将攻打捷克,这意味着法国无法逃避它承担的义务)打电报给希特勒,表示愿意前去同他谈谈“和平解决的办法”。希特勒对张伯伦的态度是了如指掌的,他欣然接受了这一建议:“我的天哪!”希特勒当时不禁又惊又喜地叫了起来。接着在九月十五日贝希特斯加登的会谈中,希特勒先是威胁要立即发动战争,并厚颜无耻地当面撒谎,说什么苏台德地区“死者达三百人”,“城镇乡村成批被焚毁”,“一万名难民已逃到德国”等等。张伯伦指出,如果希特勒已决定要开战,那末再谈下去也只是浪费时间。此时,希特勒端出了他预先准备好的方案——民族自决,但更正确地说,在德语居民占多数的地方不经公民投票就并入德国。(希特勒已在当天收到了亨莱因的信,信中说亨莱因从他同朗西曼代表团成员的谈话中得知,张伯伦会建议苏台德“同德国结合在一起”的。)张伯伦果然接受了这一原则,并答应提交英国政府批准。

但希特勒并没有就此减轻压力。九月十六日,德国向捷克

边境增派了军队（后来估计为十个师）。十七日，布拉格德国公使馆接到命令撤退德国妇女和儿童。同天，亨莱因公开宣布成立“苏台德自由团”，其目的在于“不断保持冲突和纠纷”。

十八日，根据“绿色方案”要从不同方向进攻捷克的五个军团得到了进军命令。二十日，法国驻柏林大使估计这支进攻军队共有二十二个师，而英国大使则报告说，已动员了一百五十万人。二十一日晚，“自由团”从德国越界而过，占领了阿什，而德国的党卫队和冲锋队则占领了埃格尔。

有了所有这些准备工作为后盾，希特勒九月二十二日在戈德斯贝格同张伯伦举行了第二次会谈。他拒绝接受英国首相提出的逐步解决办法（捷克境内凡居民的百分之六十五是讲德语的地方都转交德国，但个人有权选择国籍，不带走的财产要给以赔偿等等）。希特勒要求割让一切他已决定要拿到手的地区，并立即由德国军队加以占领（具体地说是十月一日）。九月二十三日，他又发出一份备忘录，规定有关地区将于九月二十八日加以占领。

英法政府先是分别地研究希特勒的条件，然后在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一起在伦敦商量。此时，已经宣布动员的捷克政府表示不能接受这样的条件。英法政府也采取了一些准备部分动员的措施。英国又派了霍勒斯·威尔逊爵士去见希特勒，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会谈的结果，只是规定捷克斯洛伐克必须在二十八日下午二时之前接受条件。英国政府在二十六日发出了警告，指出如果发生战争，英、法、苏将帮助捷克。但希特勒确信，所有这些使各国人民（包括德国人民）惶惶不安、惊恐万状的措施不过是讨价还价的策略——要从他那里获得有所约束的保证，让英法政府能把捷克的被征服使人看来真象是一桩拯救了欧洲和平的行为。

九月二十六日，希特勒为这样做准备了条件。他在柏林体育馆发表演说，大骂捷克斯洛伐克和贝奈斯，也骂了苏联，还威胁说要发动战争，但中间插了一些话，保证这次是“我在欧洲的最后一次领土要求”，表示要同英、法、波兰保持友好关系，并以个人名义，专门对张伯伦表示谢意。这种做法有把握可以给对方留下好的印象，因为几个月来英国驻柏林大使汉德森对这件事一直是这样认识的，而希特勒从许多其他来源也知道，内维尔·汉德森是不会不同意的，另一些人也是这样认为的。在发表演说之后，他立即于二十七日又发了一封个人署名的信给张伯伦，用非常讲理的语调对那些批评他提出的条件的意见进行辩解，说愿意给捷克斯洛伐克余下部分的独立以正式的保证，最后又邀请张伯伦“继续努力”，以阻止“布拉格”引起一场大战，“为此我要顺便再一次衷心地对你表示谢意”。

希特勒的估计是正确的。张伯伦抓住了这根救命稻草，第二天就打电报给希特勒，建议立即召开四强会议（即包括意大利在内）。希特勒也已事先通知了法国政府，而该政府领导人只是一心一意要跑在张伯伦前面，更迫切地要双方合作来对付捷克，要捷克同意（否则法国就不予支持）立即让德军进占“波希米亚周围要塞地带的所有地方”。

希特勒于是在二十八日晨发出了正式邀请。希特勒、墨索里尼、张伯伦和达拉第于二十九日下午开会，一直开到三十日凌晨。墨索里尼手头早已有了前一天意大利驻柏林大使交给他的德国人拟订的协定草本。会议一开始，先由希特勒按过去的老调初步谈了一阵。在适当的时机，墨索里尼就把那个协定草本作为他所拟订的拿了出来。这份协定草本规定捷克人要按照德国人所绘的一张地图在十月一日至十日间撤出苏台德日耳曼区，不得拆毁任何设施；规定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四国加上捷

克)监督撤退事宜;规定在“有争议地区”进行公民投票,而这些地区在投票前将由国际部队加以占领;德国部队将自十月一日起开始占领“日耳曼人占多数的地区”。

这几点就成为九月三十日签订的慕尼黑协定的主要内容。另外加了几点,以便使这个文件更适合英法公众的胃口。这就是规定要由国际委员会对在慕尼黑尚不能确定归属的一个地方作出是否要由德国占领的决定;规定个人有权从被移交的领土迁出;规定英法对九月十九日划定的新边界提供国际保证,而一旦波兰和匈牙利少数民族问题获得解决,德意也将提供国际保证。

归属未定的那块地方结果由德国总参谋部说了算,它在十月一日举行的第一次国际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希特勒的最后通牒,于是在会上以多数票通过。个人选择权后来根本没有再提起过。国际保证也从未兑现。国际委员会(包括法、英、意驻柏林大使和德国外交部长为一方,共同对付捷克的一位部长)几天后干脆取消了拟议中的公民投票,也从未召集过那个空有其名的“国际部队”。

尽管张伯伦大吹大擂说,在慕尼黑,希特勒的戈德斯贝格条件是有所更改的。实际上,这不过是换汤不换药,两者并无真正区别可言。纳粹德国事实上获得了它所要的一切。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五日,哈利法克斯勋爵在一次有关慕尼黑的演说中也承认,“我认为,每一个有争议之点都是按照德国的意图决定的,这样说是符合真实情况的。”那个伟大的目标,即妨碍发动一场重新分割世界的战争的障碍物必须摧毁,终于达到了。德国报纸是非常强调这次胜利的意义。

半官方的《德意志汇报》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写道:“元首在《我的奋斗》中所表达的意志已经如愿以偿。”《进攻报》十月四日大吹大擂地说,一场反对上次大战结束时缔结的条约的“外交

革命”完成了。

《法兰克福报》十月一日写道，法苏之间的主要联系环节现在被切断了。“多年来，德意志帝国一直在问自己，如何才能有可能摆脱捷克这把钳子。阿道夫·希特勒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于他看到了这个可能性，找到了实现的办法，并教导德国人对此深信不疑。”

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捷克斯洛伐克面积为五万四千平方哩，到十一月三十日就只有三万八千平方哩了。它的人口在前一日期为一千四百五十万，到后一日期只剩下九百六十万了。

在这一过程中，捷克斯洛伐克丧失了它采煤业的百分之六十六，钢铁业的百分之七十，纺织业的百分之八十，化工业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和发电量的百分之七十。

但更为主要的是，捷克斯洛伐克丧失了它历史上的边疆区，丧失了保卫自己的手段——它的庞大和花了不少钱的防御工事以及它的装备齐全和训练有素的四十五个师的军队（余下的、大大减少了的军队也是士气低落，一蹶不振了）。它的铁路网也完全乱了套。

德国在他的一串长长的胜利链条上又加上了一环，但从质量上说来，这可是最大、最决定性的一环！

### 德国真的能打吗？

慕尼黑前夕力量对比究竟如何呢？这里有两个来源截然不同的证据。一个来自内部：尽管经过希特勒在五月底决定采取新的广泛的努力之后，到一九三八年秋末时，德国也只能部署五十五个师（其中包括后备师），而有些师“装备也较差”。因此，这个数字只比四月份的数字多了九、十个师。而且，在五十五个师

中，五个作战师和七个后备师必须放在西线，于是只有四十三个师可以放在捷克和其他地方。另一个数字来自法国陆军情报部，法国的甘末林将军曾以此为据，在九月二十六日向张伯伦汇报：法国一开始就可以有一百个师；德国的陆军既不完善，也不完整，还缺少汽油，它只在空军方面占优势；捷克斯洛伐克可以有三十个师（实际上是为大为低估了的）来对付德国的四十个师。但这个力量对比完全没有把苏联考虑进去。

后来，德国凯特尔元帅受审时，在他的关于慕尼黑的证词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都非常高兴这次事件没有导致军事行动，因为在整个准备阶段，我们一直认为，我们进攻捷克边境防御工事的手段是不充分的。从纯军事观点来看，我们的力量还不够强大，不足以发动一场旨在突破捷克边境防御工事的进攻；我们缺少作这样一次进攻的物质力量。”

一般说来，任何人都有可能做出发疯的行为，希特勒也不例外。但是到慕尼黑会议时止，不论希特勒如何“做作”，以便使那些需要借口的政治家有所借口，我们看不到希特勒执行的政策中有任何发疯的迹象。相反的倒是，他的行为表明这一切是经过冷静而周密的计算的，尤其是，他能敏感地估价他的对手愿意合作的程度。

有充分理由可以这样认为，如果几个对和平感到关切的国家能够为了保卫国际安全而站在一起，希特勒是会听从忠告而不是发动大战的，因为当时要发动大战，德国的失败将是肯定无疑的和彻底的。

## 结 束 语

“我不知道你们的国家是否会从慕尼黑作出的决定中得到

好处，但肯定无疑的是，我们不会是最后一个受害者。在我们之后，其他人也将遭遇同样的命运。”这是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捷克外长将他的政府接受慕尼黑协定一事通知法、英、意部长时讲的几句话。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纳粹头目施特莱彻在纽伦堡庆祝德军进入波希米亚的一次盛大集会上发表了演说。他说：“这还仅仅是开始，将有许许多多大事接踵而来。让民主国家尽量暴跳吧！它们最终是要投降屈服的。”

事实是，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希特勒同他的高级将领（其中包括戈林、凯特尔和雷德尔）举行了一次决定性的会议。在会上他宣布说，为了扩大德国在东方的生存空间，要尽早抓住机会，进攻波兰。他接下去说：“我们不能期待再有一次捷克事件。这次将要打仗。”

战争果真打起来了。然而正如希特勒和他的将军约德尔所说的，占领捷克为“对波兰的行动打下了基础”和创造了进攻波兰的“比较有利的战略前提条件”。但一九三九年三月之所以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这又是因为一九三八年九月捷克斯洛伐克被迫把它设有防御工事的边境地区交给了纳粹德国。一九四二年八月八日，贝奈斯在英国广播公司电台上说：“正是慕尼黑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摘译自一九五八年伦敦出版的《慕尼黑阴谋》一书  
张仲礼译）

一个很出色的情报系统，此外它还有苏台德德国人党领导人康拉德·亨莱因，此人为了要反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或制造暴动，或故意挑衅，是什么事都做得出的。德国报纸充满了在苏台德区无辜男女被大批逮捕的消息报道。

就内维尔·张伯伦来说，从捷克斯洛伐克源源而来的报道使他非常不安。他既不信任德国人，也不信任捷克斯洛伐克人。他却似乎相信德国报纸上刊登的暴行报道，决定进行干预。

起先，他是试探性地、半心半意地进行干预，他的目的并不明确，明确的只是另一次大战必须避免。八月初，他派他的亲密朋友朗西曼勋爵前往布拉格。对外宣称朗西曼的使命是前往调查研究，但朗西曼勋爵认为他去的目的是要在贝奈斯、希特勒和亨莱因三人之间进行调解。远在他未到布拉格之前，他已得出结论，希特勒要把苏台德日耳曼人并入德意志帝国是言之成理的。他没有想到苏台德区一旦割让给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就简直没有防御，也没有想到这远远不是一个边境问题。

九月十二日在纽伦堡的一次大会上，希特勒大声疾呼地说，捷克斯洛伐克正在用一切手段消灭三百五十万苏台德日耳曼人。他们被剥夺了权利，不准唱德国歌或穿白袜子。声调是极其具有威胁性的。他宣称，“苏台德日耳曼人苦不堪言”，德国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还加上了一句预示着凶兆的话：“我希望外国政治家将会相信这决不是空话。”

希特勒讲话语调之激烈以及它攻击捷克斯洛伐克的猛烈程度，使在昏睡中的张伯伦大吃一惊。他觉得有迅速采取行动的必要时，于是向希特勒发出了一封电报：

鉴于局势日益严重，我提议立即前来见你，以寻求和平解决办法。我可以乘飞机前来，并且准备就在明天启程。请示复你最早能在何时见我，并告知会面的地点。盼尽早赐

复为感。内维尔·张伯伦。

希特勒答应第二天午后在贝希特斯加登会见首相。张伯伦已经是六十九岁高龄的人，而且以前从未坐过飞机，他兴致勃勃地花了四个小时，从伦敦飞到了慕尼黑。他搭乘敞篷汽车从飞机场到火车站时，途中看到德国人热情而友好地向他挥手示意，他大为惊喜。首相感到很有把握，他们向他挥手是因为他是负着和平使命而来的。但是，在到贝希特斯加登的三小时火车旅途中，他看到一辆辆满载士兵的军车和一望无际的士兵队伍在行进。他一定也知道，这种粗暴地显示军事实力的方式是元首所命令的。街道上人民所表示的和希特勒所打算的可不是一码事啊。

从贝希特斯加登起，首相的车进入了蜿蜒曲折的道路。车子驶往希特勒的别墅，这个别墅几经改名，现在的名称是伯格霍夫。这时细雨绵绵，乌云和浓雾遮住了群山，走向别墅的台阶是滑溜溜的。希特勒为首相所准备的方案，只不过比为奥地利总理许施尼格所准备的那个方案稍稍不同罢了。

可怜的张伯伦落入了圈套。他对德国历史一无所知，对希特勒也了解不多，但却要求同希特勒举行一次个人会见，以便“两人私下”讨论政治问题。当提出译员问题时，希特勒和蔼可亲地说：他自己的译员保罗·施密特博士可以出色地担任，因为他是中立的，不属于任何一派。那是第一个圈套。

他们走进希特勒的伯格霍夫别墅二楼的小书房，一间光秃秃的没有装饰的房间，有一只小书桌和一些书。墙上挂着一幅希特勒向大会致词的照片。雨点冬冬地在屋顶上响着，夜幕已经降临，而希特勒仍在滔滔不绝地演说。这是一些反来复去的老调，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的德国历史开始，谈到凡尔赛和约、国际联盟、胜利的协约国强加于战败国的苦难，然后辛辣地攻

击贝奈斯总统和“那个不配存在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随后又攻击了英国报纸，指责英国干预德国内政。当希特勒谈到英国报刊上发表对德的挑衅性文章时，张伯伦以最和解的态度，边笑边解释说，出版自由是英国的传统，这是没有办法加以改变的。

在希特勒的长篇大论中，张伯伦难得能插进一句话。他进入这间光秃秃的房间已超过两个半小时，却可能只讲了五、六句完整的话。他越来越清楚地知道：希特勒一心一意要打仗。

张伯伦两眼注视着希特勒的脸，并说，他到贝希特斯加登来，是讨论德国的不满意见，但在一切情况下，必须不诉之于武力。

“武力！”希特勒答道，“是谁谈到武力？是贝奈斯先生在苏台德区用武力来对付我的同胞。是贝奈斯先生在五月份实行了动员，而不是我。我决不能再忍受下去了。我要以这样或那样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我要把主动权掌握到自己的手中！”

希特勒也是在五月份实行动员的，并且在同月发出命令，加紧扩充空军和在西线建筑规模庞大的齐格非防线。这一切张伯伦都知道，他现在才明白他碰到的是一个极端狂暴、情绪激动的人，他是无法同这样的人讲理的。张伯伦惊慌地说：“如果我理解得不错的话，你是下了决心，准备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对付捷克斯洛伐克的。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你要我来贝希特斯加登呢？在这种情况下，我最好立即回去。再谈其他任何事情，现在似乎都是没有意义的了。”

当任何人对希特勒说“不”的时候，他总是感到惊奇。现在他用相当阿谀逢迎的方式，婉转了口气，建议说，大家应该从民族自决的原则来考虑苏台德区的问题。张伯伦这时已精疲力竭，并不想再听一次高谈阔论。他说道：“如果我要答复民族自

决问题，我首先得同我的同僚商量。因此我建议我们的谈话到此结束，我立即回英国去商量，然后同你再见面。”

保罗·施密特在翻译这些话时，注意到这些话使希特勒非常不安。当他听到“然后同你再见面”时，希特勒才感到宽慰了。希特勒早已规定了他盼望张伯伦应该扮演的角色。在一刹那间，他是怕张伯伦攒纱帽，不再为他效劳。

“同你再见面”这句话带来重重灾难。在以后每一次会议上，张伯伦更深深地陷入希特勒为捷克斯洛伐克所策划的悲剧性的阴谋。

在回英之前，张伯伦提出要一份译员整理的会谈记录。他被告知说，记录已整理好，送给了希特勒，但是没有副本可以给他。这是无理的侮辱。还将有更多的侮辱在后面哩，他都以温文尔雅的谦卑态度加以接受了。

第二天早晨，他飞回伦敦，立即召开内阁会议。在张伯伦看来，问题是在于通过姑息希特勒而使全面战争不发生，或使战争的爆发推迟。他不想为捷克斯洛伐克而战，如他以后所说的，对这个国家“我们是一无所知的”。他认为希特勒要苏台德日耳曼人“回来”是有理由的。他的任务是要使苏台德区和平地被接管，只要接管能进行得更为顺利，他可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提供任何保证。他从未想到他对这件事的干预，是完全不必要的，只是满足了德国的利益。甚至当他已了解他所碰到的是一个非常凶狠无情的人时，他仍毫不动摇地象小孩般地信任希特勒。几天之后他说道：“尽管我认为从他脸上可以看出此人的凶狠无情，我还是觉得他是一个在他作了保证以后可以信赖的人。”

捷克斯洛伐克曾同法国和苏联签订了互助条约，因此，贝奈斯总统误信为一旦发生无端的侵略，它们就一定会给予帮助。但达拉第总理和他的外长乔治·庞纳已吓得魂不附体，不敢和德

国作战。越发使他们吓坏的是，西班牙内战即将告终，法国不久在比利牛斯山脉那边还要碰到另一个法西斯国家。因此，驻布拉格的英法两国大使劝告捷克斯洛伐克人答应德国的要求，把苏台德区归并到德国。英国和法国将保证那段没有防御工事的新边界的安全。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保证，连张伯伦和达拉第两人都知道他们实际上没有保证什么。感到失望的捷克斯洛伐克求助于苏联，可是了解到，在法国拒绝作战的情况下，俄国人也难于履行互助条约。被他们的盟国所抛弃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只得承认失败。他们提出要出席决定他们命运的会议，而张伯伦对他们解释说，希特勒不想同他们讨论这件事。

希特勒提出，同张伯伦会晤的日期“不迟于九月二十二日”，因此，张伯伦在那几天是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工作着，他同法国政府和他自己的顾问召开了一次又一次的会议。是希特勒选择了时间、地点和议事日程，这就决定他是处于优越的讨价还价的地位。会晤地点是引起令人不愉快回忆的戈德斯贝格，那里的德莱森饭店就是希特勒最后完成清算冲锋队领袖的计划的地点。

九月二十二日下午，在德莱森饭店的会议室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张伯伦对希特勒终于是更为了解了。

“我是否可以理解为英国、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已同意把苏台德区转交德国？”希特勒傲慢地问道。

“是的。”张伯伦答道。

“张伯伦先生，我极其抱歉，我不能再讨论这些事情，”希特勒说，“由于过去几天内形势的发展，这个计划已经再也没有什么用处了。”

张伯伦大吃一惊。他正襟危坐，在那浓密眉毛下的一双和善的眼睛现在充满着怒气。为了满足希特勒取得苏台德区的欲

望,他是冒着政治风险的。他不知道,就在这个时刻,德军在前线已作好向布拉格进军、摧毁和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准备。希特勒用嘶哑的嗓音说道:“对贝奈斯压迫苏台德日耳曼人以及他所使用的恐怖手段,我是不能置之不理的。”于是,张伯伦小心起草的那份要缓慢而谨慎地接管苏台德区的计划,就此被抛在一边了。

由于不能同希特勒讲理,张伯伦离开会场,回到来因河对岸山顶上的彼得斯堡饭店。希特勒曾答应,在张伯伦留在德国领土上时,他不会采取军事行动。张伯伦相信这话,因此只要存在着能取得谅解的一线希望,他是不愿回英国的。他没有特殊通讯工具可以同伦敦、巴黎和布拉格通消息,只能靠电报通信。他决定不做什么。由于并未预定要和希特勒再开一次会,他就安静地消磨他的夜晚,很早就上床就寝。

第二天早晨,他渐渐理解整个形势的可怕情况,他写了一封信给希特勒,称呼他为“我亲爱的德国总理”,信中回顾了前一天的辩论,并重申他相信如果捷克斯洛伐克人被侵犯,他们是没有其他办法而只能作武力抵抗。原则上,捷克斯洛伐克人已同意苏台德区有秩序地转交给德国,因此,如果作出安排能让苏台德区人遵守法律和秩序以等待德国人的到来,这是最为合适的和明智的。这封信是克制的,说了他以前说过的话,意图是要拨开早一天笼罩在会议上的一片恐怖乌云。张伯伦似乎完全不理解希特勒对恐怖是感到高兴,而对创建和平气氛是丝毫不感兴趣的。

希特勒收到信后,几乎火冒万丈。由于他没有新的论据,他口述了一封长而不连贯的攻击捷克斯洛伐克的信,重复了以前的一切谴责,为了加重分量,还加上一些新的内容。打字机打下来有四、五张纸,保罗·施密特受命亲自到彼得斯堡饭店去见张

伯伦，并要用英语朗读这封信。希特勒并不是在进行协商，而是在发泄怒气，他是再一次在故意侮辱首相。

张伯伦留心听了这封长信，了解到没有提出新要求，虽然在许多地方是有所暗示的。他因而要求希特勒提出具体建议，并附一张地图，由他担任德国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调解人。除此之外，他觉得自己已无能为力，决定要回英国。希特勒带信来说，他的新建议在晚上可以准备好，所以当晚十时三刻要在德莱森饭店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到那时，希特勒以备忘录的方式提出了他的具体要求，并附有地图。主要的要求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武装部队必须在九月二十六日上午八时开始撤离苏台德区，并于九月二十八日撤退完毕。整个苏台德区将在不到四十八小时的时间内落入德国手中。

张伯伦断言说，“这是一份最后通牒！”并指出他很难把这些要求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提出。“总理，我以最大的遗憾和失望，不得不向你说，你没有尽力帮助我取得和平。”

希特勒答道：“这全然不是最后通牒。如果你仔细地看，你会看到文件上明明写着是‘备忘录’。”这是儿戏般的遁词，但这却是探索希特勒真实意图的一条线索，因为他是要用讹诈勒索的办法来取得苏台德区。几分钟后，一个副官送来一份电报，说贝奈斯总统刚刚在电台上宣布捷克斯洛伐克军队总动员。这时，希特勒倒是表现得出奇地镇静。他用简直很难听清的声音说道：“尽管发生这种没有前例的挑衅，我将遵守诺言在协商过程中不进攻捷克斯洛伐克——无论如何，张伯伦先生，当你在德国领土上时是如此。”

贝奈斯博士说了声“不”，希特勒就退缩。他现在准备在撤退日期上讨价还价了。他所提出的最好条件是非常吝啬的——把最后撤退日期延长三天。

“张伯伦先生，为了使你满意，我愿意在时间表上作出让步。我很少给别人做过这样的事情，你是难得的一个。我将同意十月一日为撤退日期。”

张伯伦答应把新条件带给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他飞回英国，两天后的九月二十六日，霍勒斯·威尔逊爵士携带了张伯伦的信到达柏林，通知希特勒，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认为建议完全不能接受。

希特勒一听这些话，勃然大怒，并大声地说：“再谈判已毫无意义！”

在这一天余下的时间里，希特勒都是在发脾气。那天晚上，他借在体育馆演说的机会，大大地发泄他的忿怒。他对贝奈斯博士怒气冲天，指责这个“谎言之父”如何野蛮地从中欧挖出一块土地成立了一个没有理由存在的国家，说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如何自相残杀，说捷克是建立在恐怖基础上的国家，建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威胁德国。他还说，捷克斯洛伐克是指着德国心脏的大炮，是到了去除大炮的时候了。有三百五十万德国人居住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德国是再也不能容忍扣留着如此之多的德国人民的这个政权存在下去了。希特勒又说，至于贝奈斯博士，战时是在世界各地游荡中消磨过去的，是一个对人民放毒的鬼鬼祟祟的学者，而他希特勒那时却是前线的一名战士。

这篇演说的突出之处是声调高、任意歪曲历史，并且是粗暴透顶。希特勒在演说中又说：“现在我们面前有一个最后的问题必须解决并且将要得到解决。这是我在欧洲的最后一次的领土要求，但这个要求我是不会收回的。上帝保佑，我将如愿以偿。”

他很鄙夷地指出民族自决原则同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多民族现实情况是有矛盾的。在描述危机的过程时，他再一次把自己扮成受害一方的角色，为苏台德区的恐怖遭遇叫屈，并提出难

民数字，这些数字证明他所说的和事实是完全不符的：

“我们看到了骇人听闻的数字：头一天是一万难民，第二天两万，一天后已是三万七千，再两天后是四万一千，接着是六万二千，七万八千，然后是九万，十万七千，十三万七千，今天是二十一万四千人。大片地区的人民流离失所，村庄被焚毁。为了要找出德国人，还企图用手榴弹和毒气。可是贝奈斯先生却在布拉格稳坐钓鱼台，他认为：‘我什么都不必害怕，最后英国和法国国会支持我的。’”<sup>①</sup>

象戈培尔为了使希特勒的忿怒更有依据而捏造出来的数字一样，这里所描述的关于贝奈斯坐在布拉格欢欣鼓舞，认为他受到英法武装力量保护的说法，也完全是虚构的。贝奈斯博士并未欢欣鼓舞。他在同英法使者的谈话中知道，他将被出卖。理由很简单，因为在希特勒的体育馆演说中另外也提供了一些较为准确的数字：“贝奈斯先生的最后靠山是七百万捷克人，但是这里的人民却超过七千五百万人。”

希特勒在演说中又说：“我的同胞们！我认为现在已到了毫不客气地说话的时候了。……这片领土应于十月一日交给我们。……决定权掌握在贝奈斯的手中；究竟是和平还是战争！”

他再一次提出保证，他对消灭或并吞捷克斯洛伐克不感兴趣。他叫道：“我们不想要捷克人！”他以狂喜的调子结束了他的演说：

“现在我以统帅的身份走在我的人民前面，在我的后面——让世界人士都知道——有人民在齐步前进，他们是不同于一九一八年的人民。……我的人民将会觉得我的愿望就是他们的愿望。他们同我的看法一样，正是为了他们的前途和命运，他们才

<sup>①</sup> 方括号内的引文，摘译自〔西德〕约希姆·费斯特：《希特勒》一书，作为本文的补充。下同。——译者

授权我采取行动。我们现在要使我们的意志象我们在夺权时一样的坚强，当时我是以普通一兵的身份出发征服德意志帝国的。……所以我号召你们，我的德国人民，所有的男男女女，都坚定地站在我的后面。……我们已下定决心！

“现在让贝奈斯先生作出选择吧！”

接着是一片暴风雨般的掌声，而希特勒则浑身大汗，眼珠一动不动地坐了下来。戈培尔跳了上来，大声叫喊：“有一点是肯定的：一九一八年再也不会重演了。”希特勒向戈培尔看着，似乎这句话就是他想了一晚而没有想出来的。]他跳了起来，眼睛里闪着光芒，把手挥了一下，然后对桌子一捶，用尽了他肺部的全部力量大叫一声：“对！”

那些希望他的怒火会自己熄灭的人是错了。在第二天午前，张伯伦的特使霍勒斯·威尔逊爵士到总理府带来张伯伦于昨晚拍来的电报。他提出是否还有什么话要他回去向首相汇报。希特勒说道，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只有两条路可以走：接受或拒绝德国的要求。然后出于发怒狂癖，他又叫嚷道：“我就是要彻底地消灭捷克人！”他的举止表示得很清楚，捷克斯洛伐克要被撕成血淋淋的一片一片，布拉格要从地图上抹去，贝奈斯博士要由秘密警察看管。张伯伦认识到希特勒可能会坚持己见，他事先准备了一封信，如果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攻已迫在眉睫，就要霍勒斯·威尔逊把此信交给希特勒。信的内容是：“如果法国为履行其条约义务而参加对德作战的话，联合王国将认为有义务支援法国。”

希特勒说道：“这意味着，如果法国决定进攻德国的话，英国将感到也有义务进攻德国。”

霍勒斯·威尔逊爵士否认这是对张伯伦的话的正确解释。

仍旧在发火的希特勒，提高了声调叫道：“要是法国和英国

要打，就让他们打罢！我根本不在乎。我是对一切情况都有准备的。我只能接受眼下的这一形势。今天是星期二，到下星期一，我们就在打仗了。”

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他并不是不在乎，他并没有对一切情况都有准备，他的军队虽然强大，还不是强大到可以同时同捷克人、法国人和英国人一起作战。可是他必须继续吓唬别人，因为把世界拖到战争边缘，对他只会有好处，不会有丝毫坏处。一旦苏台德区归他统治，那末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余部分也就在他的支配之下了。由于法国和英国愿意为他取得苏台德区而效劳，那就已是根据他的条件而赢得了这一仗。但是对希特勒来说，打赢了一仗，决不是就够了，必须把敌人压倒，使敌人发抖到丧失战斗力的地步。敌人已不再是捷克斯洛伐克，而是英国和法国了。

在同一天的下午，一个纵队的坦克和装甲车隆隆地通过柏林。根据希特勒的命令，纵队沿着威廉街走过。他不时地出现在总理府的窗口，用举手的方式向士兵打招呼。在任何其他时候，往往会出现大批德国人向纵队欢呼的场面，但是这一天却没有人群。人们匆匆向地下通道走去。柏林人对军事力量的示威表示沉默和漠不关心，据说这使希特勒深为触动。

事情就象他想的那样发生了；那些傀儡们完全按照预期的路子那样做了。张伯伦是完全准备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采取了同样的行动。墨索里尼是跟着希特勒指挥棒转的，而贝奈斯不久将从政治舞台上被赶走。希特勒只能容忍那些职业政治家发几个钟点的议论，然后他要让他的敌人签投降书。

九月二十八日早晨，法国大使安德烈·弗朗索瓦-蓬塞到总理府求见希特勒。他是一个具有相当外交经验的人，但是他只

能重复他所收到的巴黎来电。

“总理，如果你认为你能把冲突局限于捷克斯洛伐克，你是欺骗了自己。”他说道，“如果你攻打那个国家，你就将把整个欧洲卷入战火。你当然很有信心能赢得战争，正象我们也相信能击败你一样。但是当你的主要要求能不需要战争而得到满足时，为什么你要冒那种风险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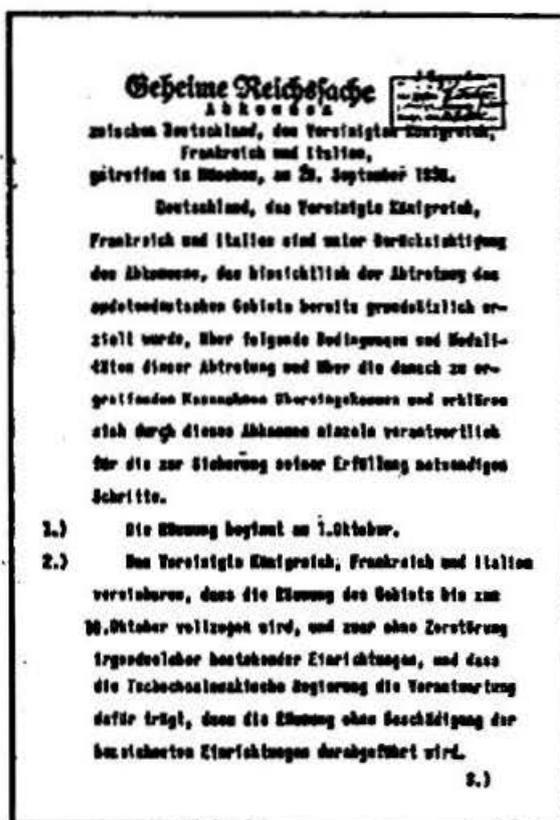
弗朗索瓦-蓬塞告诉希特勒的事是希特勒早已知道的。多少天来，他就知道英法两国是诚实的捐客，他们一心要以和平为代价出卖捷克斯洛伐克。弗朗索瓦-蓬塞甚至还带来了一张画得很清楚的地图，上面是根据希特勒的要求明白地注明了各阶段的撤退日期。地图是法国总参谋部画的。希特勒看后表示满意地说：“人们可以立即看出，地图是了解专业的军事人员画的。”

当希特勒正在同法国大使讨论时，意大利大使贝尔纳尔多·阿托利科来到。希特勒离开房间同这个稍稍有些弯腰曲背的人商量，此人因为兴奋过度而气喘吁吁。他刚从墨索里尼那里收到一份十分重要的电报：英国政府要求墨索里尼出面调解苏台德区问题。由于希特勒真正所要的不是墨索里尼或任何其他人的调解，贝尔纳尔多·阿托利科迅速补充说：“领袖（指墨索里尼——译者）要我通知你，元首不论决定什么，法西斯意大利誓为后盾。”这些话起了应有的效果。希特勒面带笑容，宣称将邀请墨索里尼第二天到慕尼黑进行调解。

象所有的最高级会议一样，在俯视柯尼斯广场的元首府举行的慕尼黑会议，只是把早已作出的决定演戏似地表现一番。墨索里尼并未进行调解；张伯伦和达拉第也没有讨论什么重要问题；捷克人是没有发言权的。英国首相和法国总理的任务只是在希特勒放在他们面前的任何文件上签字，而捷克斯洛伐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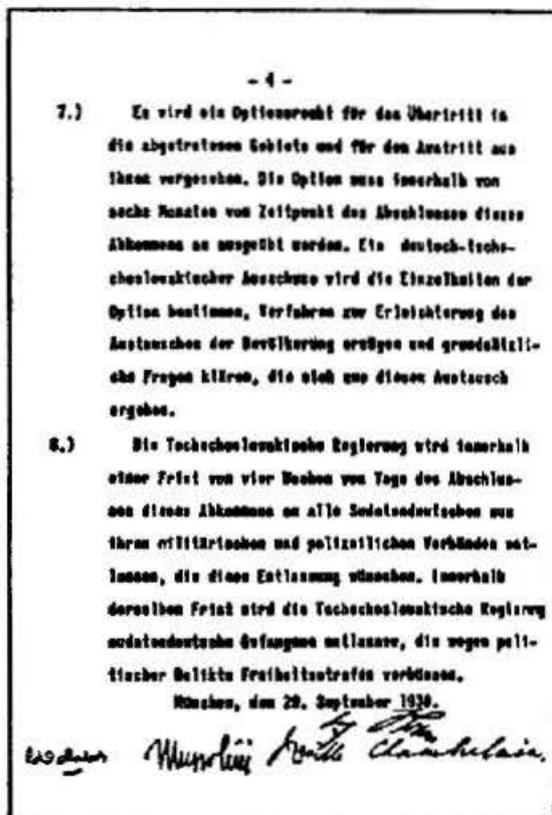
的任务只是服从。希特勒正如预期到的那样宣称说，他从没有打算使用军事力量，而靠祖上经营皮革起家的张伯伦则极想知道是不是要把苏台德区的牲口赶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余地方去。

会议从九月二十九日下午十二点四十五分开始，到晚上九时结束。会议结束时，希特勒邀请每一个参加会议者出席宴会。张伯伦和达拉第两人都无心参加宴会，于是希特勒就同墨索里尼一起赴海德曼大街他的新公寓中去就餐。此时，译员们已在进行工作，准备德、意、法、英四国文字的协定草稿，餐后各签字人仔细地审查了草稿。对墨索里尼起草的原稿，作了几处小修改。九月三十日凌晨一时半，四个文件签了字。由于这时已经很晚，打字员也都精疲力尽，因此决定，不必将文件开头的九月二十九日这个日期予以改变了。



慕尼黑协定原件第一页

慕尼黑协定原件最后一页及签字



作为主要受益人的希特勒首先签字，张伯伦就签在希特勒的名字下面，墨索里尼所签的字把大部分空余地位都占满了，这就使达拉第不得不把他的名字小小地签在边上，活象一只小动物爬在角落边等死。

## 慕尼黑协定全文<sup>①</sup>

### 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割让苏台德领土给德国的协定

#### （慕尼黑协定）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订于慕尼黑）

德国、联合王国、法国和意大利考虑到苏台德领土割让给德国在原则上已达成协议，同意于有关上述割让的下列条款和条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措施，并且通过本协定它们对保证履行本协定所必要的步骤各应负其责任：

一、撤退将在十月一日开始。

二、联合王国、法国和意大利同意从领土上撤退应于十月十日完成，不得破坏目前存在的任何设备，并且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将被责成履行撤退，不得损害上述设备。

三、关于撤退的条件，应由德国、联合王国、法国、意大利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等所组成的国际委员会制定细节。

四、德国军队分阶段占领主要是日耳曼的领土将在十月一日开始。在附图所标出的四块领土，将由德国军队按照下列次序加以占领：

标为第一号的领土在十月一日和二日占领；

标为第二号的领土在十月二日和三日占领；

<sup>①</sup> 协定译文录自《国际条约集(1934至1944年)》。——译者

标为第三号的领土在十月三日、四日和五日占领；

标为第四号的领土在十月六日和七日占领。

其余日耳曼特征最强的领土将由上述国际委员会迅速确定，并由德国军队在十月十日占领。

五、第三款所指国际委员会将决定应举行公民投票的领土，该项领土在公民投票未完成前，应由国际机构占领。同一国际委员会将确定举行公民投票的条件，以萨尔公民投票的条件为基础。国际委员会并应指定举行公民投票的日期，这一日期将不迟于十一月底。

六、边界的最后确定将由国际委员会完成。该委员会也将有权在某些例外情况下，严格地从人种学来确定有些地区可不必举行公民投票予以移交，由四国即德国、联合王国、法国和意大利建议作出非主要的变动。

七、应有自由选择迁入或迁出被移交领土的权利，选择权应在本协定签订日起六个月内行使。一个德捷委员会应确定自由选择细节，考虑便于迁移居民的方法及解决由上述移转而产生的原则问题。

八、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自本条约签字之日起四个星期内将从其军队和公安部队中解除任何希望解除的苏台德德国人的职务，并且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将在同时期内释放因政治罪行而在服徒刑的犯人。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订于慕尼黑。

阿道夫·希特勒            爱德华·达拉第

内维尔·张伯伦            本尼多·墨索里尼

### 协定附件

联合王国陛下政府和法国政府是在坚持九月十九日英

法建议第六款所规定的提议的基础上参加上述协定的缔结。前项建议第六款是涉及对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新疆界面临无端侵略时的一项国际保证问题。

当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波兰和匈牙利少数民族问题已告解决时，德国和意大利方面将对捷克斯洛伐克给予保证。

## 声 明

四国政府首脑声明，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波兰和匈牙利少数民族问题，如果未在三个月内由有关政府予以解决，则应列为出席这次会议的四国政府首脑间另一次会议的议题。

## 补 充 声 明

由于移交领土可能引起的一切问题应视为属于国际委员会的职责范围内。

## 国际委员会的组成

出席这次会议的四国政府首脑同意他们于本日签订的协定所规定的国际委员会应由德国外交部长、英国、法国和意大利驻柏林大使和由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指派的一名代表组成。

希特勒的胜利是彻底的：苏台德区归属于他。在某些争议地区，要进行公民投票；将组织一个国际委员会监督最后协定的执行情况；英法将保证缩小后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疆界。但这些只是空话而已。现实的情况是德国武装部队于第二天开进了捷克斯洛伐克。

张伯伦那天晚上在慕尼黑过夜，第二天早晨他拜见了希特

勒。在他的口袋里装了一份英德宣言的底稿。他觉得至少他应要求希特勒同意发表一个对英表示和平意图的宣言。他写道：

“我们认为，昨夜签订的协定以及英德海军协定，象征着两国人民永远不再兵戎相见的愿望；

“我们业已决定采取协商的方法来处理有关我们两国的一切其他问题，并且我们将坚定不移地努力排除一切可能的纠纷根源，从而为保证欧洲的和平作出贡献。”

希特勒在这一文件上签了字，但并不表示特别感兴趣，因为对他来说，“采取协商的方法”是毫无意义的。希特勒看不起张伯伦，认为他是一个低能儿。“我们的敌人是些小小的蛆虫”，他一年以后说道，“我在慕尼黑对他们有所认识。”

〔张伯伦和达拉第回到了各自的首都。但是他们没有碰到预期的愤怒示威，相反，他们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呼，正如外交部一位官员评论的那样，好象人民是在“庆祝一场打败敌人的大胜仗，而不认为是出卖了一个小盟国”。意气沮丧的达拉第指着欢呼的群众，低声地说：“都是傻子嘛！”张伯伦比他的法国同事较为天真和乐观，在到达伦敦时，他手中挥舞着一张纸，并宣称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在伦敦唐宁街十号门前，大群人高唱“因为他是一个刮刮叫的好人”。《巴黎晚报》则建议给张伯伦“一小块法国土地”，以供他钓鱼之用，并评论说，“要想取得比这更有成效的和平象征”是不可能的了。在随后的下院辩论中，温斯顿·丘吉尔开始他的演说时用了这样的话：“我们遭到了一场全面的十足的失败”，此时有许多人大声喊叫，表示强烈反对。〕

（摘译自一九七三年纽约出版的《阿道夫·希特勒的一生》一书 唐雄俊译）

## 慕尼黑回顾

〔捷〕帕维尔·埃斯列尔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德、英、法、意政府首脑签订了被称为慕尼黑协定的一份简短文件。这个协定的签订，使这个城市的名称有了一个特殊的含义。这种含义将会在今后许多年代内一直保留下去。自从希特勒、张伯伦、达拉第和墨索里尼在那个决定命运的九月之夜，在慕尼黑的元首府签订这个协定以来，慕尼黑就已变成成为政治学和历史编写工作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了。

这个协定的实质极为简单明了。那就是写在序言中的如下一段话：签字国“考虑到苏台德领土割让给德国在原则上已达成协议，同意于有关上述割让的下列条款和条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措施……”。直截了当地说，这意味着捷克斯洛伐克，一个没有出席慕尼黑会议的国家，就此要被肢解了。正如人们当时就认识到的，并在六个月内得到了证实的，这等于是一个独立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就此毁灭了。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希特勒的军队开进了捷克斯洛伐克。慕尼黑协定的目的完全达到了。

但是，不仅仅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就这样被注定了，同时，这个协定也使挽救欧洲和平、挽救世界和平的最后机会丧失了。避免世界大战的唯一机会在于西方国家和苏联的同盟关系，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和苏联本来是通过相互之间的互助条约联

结在一起的，但是捷克斯洛伐克终于在英、法默认和甚至积极合作之下被摧毁了，这就不可避免地在西方和苏联之间打进了一个楔子。

慕尼黑的实质并不是力量的软弱，而是法西斯国家和西方国家军事和政治力量竟然联合起来（动机不一定相同，但无论如何却方向一致）从事于改变欧洲的现状。

### 赤裸裸的纳粹侵略计划

毁灭捷克斯洛伐克，仅仅是德国法西斯主义一连串侵略行动中的一个环节。然而，在纳粹的侵略计划中，夺取捷克斯洛伐克占有一个很特殊的地位。

武装袭击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作为较大的纳粹计划的一部分，在一九三七年底已具体形成。希特勒在十一月五日召集他的主要军事和政治顾问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提出了德国长期政策的详细蓝图。由希特勒的副官霍斯巴赫上校所作的会议记录（因而被称为霍斯巴赫备忘录）为导致慕尼黑的事态发展提供了颇能说明问题的背景。

希特勒长篇大论的开场白的调子是：“只有用武力才能解决德国的问题”，“至迟要在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解决德国的生存空间问题，这是它的不可变更的决心”。关于慕尼黑，霍斯巴赫备忘录具有重大意义的部分是这次会议仔细考虑了“在什么时候”和“用什么方法”进行纳粹的最后打击。这里希特勒列举了三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和“第三种情况”是“必须在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以前采取行动”的情况。在这两种可能的情况下，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武装进攻捷克斯洛伐克。“一旦我们卷入战争，为了改善我们的政治-军事地位，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必

须是同时干掉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以便在可能的对西方的任何作战中消除来自我们侧翼的威胁。”

霍斯巴赫备忘录之所以具有重大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所包含的内容，就捷克斯洛伐克来说，还在于它那非常突出的省略之处，根本没有提到用政治和外交的手段把捷克斯洛伐克这样一个独立国家加以消灭的任何可能性。

在讨论“第一种情况”即“可能最迟在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时期”发动全面战争的时候，希特勒从一开始就认为，“几乎可以肯定，英国已心照不宣地放弃了捷克人，而法国大概也是一样，而且对这一问题迟早将听任德国解决的这一事实也甘心接受了”。

纳粹原来计划把灭亡捷克斯洛伐克作为一次军事行动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看不到可以用政治行动来支持这样一次军事行动。恰好相反，由讲德语的居民进行颠覆性的政治活动，被认为是军事进攻方案的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这还牵涉到要制造一个合适的工具，以组织颠覆活动，并为进攻的纳粹军队提供有效支持。所谓苏台德德国人党就担当了这个角色，它在捷克斯洛伐克讲德语的居民中间是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表面上，它只是关心维护捷克斯洛伐克讲德语居民的权利。党的领袖康拉德·亨莱因也一有机会就表示他对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和它的宪法是忠诚的。然而，事实上，亨莱因的党只不过是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工具。

然而，关于慕尼黑最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是，许多主要的外交家和政治家早在上述这种秘密文件公诸于世之前，也早已看清纳粹凶相毕露的计划了。法国驻柏林大使弗朗索瓦-蓬塞早在一九三三年九月就“坚决认为战争几乎肯定就要到来”。

据美国驻柏林大使威廉·E·多德说，英国驻柏林大使埃

里克·菲普斯爵士曾在一九三四年四月说过：“一两年内不会有战争，但是战争是这里的目的。”这位美国大使本人则说得甚至更加坦率：“希特勒的目标是战争，那是肯定无疑的。至于何时发动战争，那要看准备的程度和有没有适当的事件为借口。”

由此看来，外交界的重要人物，在纳粹政权的早期年代里，就充分认识到纳粹有发动战争的计划。这样的认识，包括对总计划的具体部分如灭亡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的认识，随着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每一次新的冒险而变得更加清楚了。这里，《多德大使日记》也提供了证据。接近一九三四年底，日记中有一段记录了一位西欧国家公使的话。他说：“战争是现政权的首要目标，它不是对法国和比利时开战，而是对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开刀。那就是希特勒的目标……。”波兰的大使则预言说：“德国打算重新吞并阿尔萨斯-洛林，还要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波兰的很大部分。然后它将控制巴尔干地区和整个波罗的海。如果它做到了这一切，欧洲就将属于德国的范围。”接近一九三三年底，就是纳粹政权上台的第一年，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爱德华·贝奈斯就确信，“德国人已下定决心要吞并他的国家的一部分或全部。”

因此，远在一九三八年之前，并且随着最后危机的迅速到来，纳粹的侵略和战争计划，即使没有得到什么秘密情报，根本也不是什么秘密了。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是了解和评价慕尼黑的一个基本背景。

### 错综复杂的西方政策格局

德国如果进攻捷克斯洛伐克，英法可能会抱什么态度？对这一问题，纳粹领袖是根据西方政策已有的具体格局而作出估计

的。西方政策的格局是错综复杂的，同纳粹政策的赤裸裸的计划迥然不同。它不象后者那样有一个主要目标，而是由很多常常是各不相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目标交织在一起。由于它是错综复杂的，西方政策格局本身的存在也就有些模糊不清。因此，在慕尼黑时期和以后，英法的行动容易被看成不过是当时的需要而决定的一些临时性措施。但是，事实上，一九三八年发生的事件只有同具体的长期政策联系起来，才会使人看出头绪来。

人们既然已清楚地认识到，法西斯侵略对英法利益造成了威胁，那末，我们可以问一问，为什么西方国家没有把它们强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联合起来以防止战争呢？真的，它们为什么还要出钱帮助德国重整军备，还要帮纳粹德国进行领土扩张呢？这些问题的答案主要在于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抱有超乎一切的仇视态度。西方政策尽管是错综复杂的，在这方面却是极其简单明了和始终如一的。企图形成一个反苏联合阵线，可以说是唐宁街和凯道赛<sup>①</sup>在两次大战之间所执行的变化不定的政策之中的不变成份。在走向慕尼黑的这一段时期中，这种企图则变为当时政策的主要成份了。

关于西方政策内在的想法，在希特勒刚上台的那一年，罗瑟米尔勋爵就有过相当露骨但无论如何却是反映实际情况的叙述。他说：“德国的刚毅不屈和年青有为的纳粹党人是欧洲防备共产主义危险的卫士。……德国必须有可以自由活动的空间……。一旦德国在俄罗斯西部获得它需要增加的领土，波兰走廊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不久任英国驻美大使的洛西恩勋爵，站在更高的权威地位表述了相同的想法。美

---

<sup>①</sup> 唐宁街是英国首相官邸所在地，凯道赛是法国外交部所在地。——译者

国驻柏林大使多德指出，在洛西恩写给他的信中，“洛西恩明确表示赞成民主国家联合起来以阻止德国朝他们这方面采取行动，并把德国的前进路线引向东方。这也许会引起俄德之间开战，洛西恩似乎对此并不感到不安。事实上，他似乎觉得这将是凡尔赛和约强加给德国的困难的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

在法国，重要的政治家也公开提出西方国家要和德国做交易的想法，这就是让后者在中欧和东欧可以“自由行动”。一家有地位的美国报纸于是写道：“赖伐尔总理兼外长是坚决主张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同纳粹第三帝国签订协定的，据报道，他愿意废除法苏条约，……赞成让希特勒政权担保法国东部边界的安全，而作为交换条件，让希特勒对美美尔地区和乌克兰享有采取行动的充分自由。”法国统治集团之所以按照这条路线制订政策，是由于他们对法国工人运动怀有深刻的恐惧和仇恨。

在美国，也明显地可以看到，有人支持纳粹政权，指望它会同苏联开战。曾任美国驻莫斯科和驻巴黎大使的威廉·C·布利特，就曾迫不及待地表白他对苏联的敌视态度，并试图引诱法国政府废除它同苏联签订的条约，转而同德国结盟。虽然布利特的观点并不完全代表美国政府的观点，却反映了一些美国最有势力的大企业集团当时的想法。

由此看来，西方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时期的政策，并非是由于突然发生紧急情况而采取的临时性措施，而是一九三八年以前早就执行的政策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这一论点也由于纳粹向东方的推进同德国在中欧和东欧的经济渗透（在不小的程度上取决于国际卡特尔等垄断联合组织之间达成的协议）有密切联系这一事实而得到了证实。关于这种协议是世界事务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这一点，有一位美国国际卡特尔问题权威已对此作过清楚的阐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美国司法部分管反托

拉斯事务的助理部长瑟曼·阿诺德写道：“不够坚强然而却很富裕的英美企业组织……把德国卡特尔看成为一个伙伴了。”他还作出了直率的结论：“慕尼黑的和平应归功于这些国际卡特尔。”

就这一点来说，一件突出的事就是英法企业早在一九三六年起就开始抽回它们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巨额投资。资本的抽回也恰好同德国对外投资的显著扩张发生在同一时刻。有时，英法投资者把大量的股票直接出售给德国的银行和工业单位。最值得注意的也许是，法国的军火工业出售了可以控制著名的斯科达工厂的股权一事。人们普遍认为，这次出售发生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与此相反的是，我们有证据说明，早在慕尼黑协定签订之前，法国的许奈特兄弟公司的持股公司欧洲工业和金融联合公司同德国的军火托拉斯赫尔曼·戈林工厂已做成了这笔交易。

西方政策的格局是在一段时期中逐渐形成的。到了一九三七年的春天，特别是就英国的政策来说，它已具有具体的型式。那时张伯伦继鲍德温为首相，不久就派遣了内维尔·汉德森爵士为驻柏林的新的英国大使。在他到任还不满一个月，“据说他已通知了德国政府，如果希特勒占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英国是不会反对的”。他在后来同美国大使的一次谈话中说过这样直言不讳的话，从而证实了这个报道的正确性。他说：“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正在恢复俾斯麦要兼并一切有德意志后裔的欧洲国家（包括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国家）的政策。……德国必须控制多瑙河-巴尔干地带，这意味着它将控制欧洲。英国和它的帝国，同美国一起将控制海洋。英德必须在经济和政治上密切联系在一起以控制全世界。”

象这样重复不止一次的讲得一清二楚的谈话，必然会加强纳粹领袖的信心，即德国对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攻不会

遇到英国方面的任何抗拒。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英国内阁最重要成员之一的哈利法克斯勋爵，在贝希特斯加登访问希特勒，“以便同德国总理亲自交谈来促进英德之间更好的相互了解”。他向希特勒介绍的英国政策的梗概，基本上同汉德森所阐明的是一模一样的。

哈利法克斯勋爵根据西方政策的基本假设，把“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作为他发言的出发点，他说，“他认识到德国总理不仅对德国作出了伟大的贡献，而且正如总理无疑也知道的，通过摒弃共产主义于自己的国家之外，也使共产主义不能继续向西方发展。”

从这里很容易就转到了这次谈话的中心问题，即欧洲的现状问题。“英国方面，”他说，“并不一定认为必须在一切情况下都要维持现状。已经认识到也许必须考虑有所调整以适应新的情况。必要时，可以改正过去的错误，承认改变了的环境。”即使在这个一般性的阐述中，哈利法克斯勋爵的讲话标志着他实际上已开始走向慕尼黑的道路。但他还走得更远，他具体地提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注定要发生属于欧洲秩序可能要改变的那一类问题。在这些问题中，有但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

除了对“可能要改变欧洲秩序”表示了决定命运的赞同之外，哈利法克斯勋爵还暗示他的政府将在获得法国的合作方面起作用。他提出要进行的这件工作，事实上正是当时德国外交的主要目标。这件事确实是当务之急，因为改变欧洲现状的前景仍旧主要取决于法国的态度，正是法国通过一系列的条约和同盟关系为维持欧洲现状承担着义务。

在哈利法克斯勋爵同纳粹领袖的谈话中，他始终强调，必须和平地进行改变现状的任何活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应该以合理地达成的协议为基础。”

## 施加压力和屈膝投降

到了一九三八年初，纳粹领袖们已感到很有把握，他们对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策划的行动现在有了更好的成功机会，所牵涉到的风险甚至比他们原来设想的还小。以前他们指望西方政府同意他们这样做，现在却有迹象表明西方政府将提供一定程度的积极支持。这可能是为什么纳粹开始侵略中欧的时间比霍斯巴赫备忘录提到的时间表大大提前的主要原因。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二日，德国吞并了奥地利，接着就立即爆发了捷克斯洛伐克危机。

德国占领奥地利正好和法国政府的更替同时发生。法国的新外交部长保罗-邦古急忙公开重申，法国准备履行它的条约义务，在捷克斯洛伐克受到袭击时提供援助。他并且作了极大的努力，想要英国政府公开宣布：“如果德国进攻捷克斯洛伐克而法国援助后者，英国将支持法国。”但是一个月以后，在伦敦的英法会议上，西方政府却同意采取一个极不相同的行动方针。

英国在这次会议上表达了大概如下的论点：“如果德国决心要毁灭捷克斯洛伐克，”张伯伦宣称，“他看不到有什么阻止这件事发生的办法。”既然如此，为了和平，也是为了捷克斯洛伐克起见，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必须解决讲德语的少数民族问题，而英国和法国也应该使用它们的一切影响促进此事的实现。

英国建议的政策，曾遇到刚上台的法国新总理达拉第的一定程度的反对。但这种反对意见最后并没有坚持下去，因为法国政府事实上也非常热中于要找到一个体面的方式来摆脱他们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条约义务。

就这一点来说，显得突出的一件事就是，美国驻巴黎大使

布利特五月间曾向美国总统建议，“我们应当设法找到某项办法让法国摆脱它在道德上承担的义务。”他建议，“一旦出现德国人越过捷克斯洛伐克边界的急情”，就应该召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也许将不得不建议要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一次公民投票，以决定那个国家各个不同民族的意向。如果捷克人拒绝举行这样的公民投票，法国人就可以摆脱他们在道德上的严重困境”。这个会议，正象最后在慕尼黑举行的那样，规定只能由英、法、德、意，可能还有美国参加，而把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排斥在外。

由于一九三八年四月英法举行会议的结果，捷克斯洛伐克在此后的几个月中发现它自己处在德国军事威胁和西方政治压力之间那种前有狼后有虎的困境中。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面对着各方面的压力，起初还保持着一定程度的抗拒。的确，这种抗拒是半心半意的，前后矛盾的，并且危险地在接近于投降的那一点上徘徊。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同西方国家打交道时立场不太坚定，这引起了全国的广泛批评。随着向投降跨出每一个新的步子，这个政府也就更加接近于因遭到普遍反对而垮台。

就是这种越来越强烈的、要有坚定的立场的要求在五月二十一日的危机中起了主要的作用。在十分紧张背景下，德国军队在捷克斯洛伐克边界调动的消息，使这个国家受到的威胁看来已到了千钧一发的地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辩论之后，勉强地发布了征召后备役人员的部分动员令。捷外交部长向英国的外交代表解释说，采取这个步骤是“必要的，以便使国内的公众舆论消除疑虑，以及在边界地区维持政府的威信”。

虽然德国立即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恐惧在此后不久就减退了，但五月危机一度曾使政府抗拒继续作出让步的态度变得强

硬起来。于是，又轮到西方政府增加他们的压力了。到了七月中旬，英国政府认为一次新的行动的时刻来到了。内维尔·汉德森爵士七月十八日写信给外交大臣说：“我真诚地相信使布拉格受到真正的压力的时刻已经到来。……这是法国人的任务，但是如果他们不去担当起来，我认为我们就应该担当起来。”具有这样效果的决定实际上在同一天就定下来了。

这个决定，表现为这样的一个建议，即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应同意任命一位公正人士朗西曼勋爵，作为他们和亨莱因党之间的调解人。以毫不含糊的词句写给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爱德华·贝奈斯的这个建议，是如此明目张胆地侵犯捷克斯洛伐克的主权，以致贝奈斯起初暗示政府和他本人也许会因此而下台。

英国政府和支持它的法国人当然知道，没有一个有自尊心的政府能够或应当接受这样的建议。由于这个原因，哈利法克斯勋爵建议作为一项保全面子的措施，“如果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能自己在这个问题上请求我们给予帮助，这无疑地会对这里的舆论产生有利的影响，……我倒是认为，贝奈斯博士本人将会发现，采取主动比在外界的坚持下让步要好一些”。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接到英国大臣致共和国总统的建议后三天内就表示同意了。

这样任命的调解人从八月初到九月中旬呆在捷克斯洛伐克。他的出使做到了在几周前似乎还是不可能的事；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被劝诱提出一个它自己的方案，事实上是同意了亨莱因在他的“卡尔斯巴德计划”中列举的全部要求。按照希特勒的指示，这些要求原来估计别人是无法接受的，朗西曼勋爵实际上打破了纳粹的计划。但是当时危机已进入它的最后阶段，希特勒和他的苏台德爪牙们已经准备放弃使用策略上的花招了。

纳粹现在公然号召并吞捷克斯洛伐克的大片地区。英国政府急忙同意这个要求，利用朗西曼的建议作为一个在全世界和

它自己人民面前很难为之辩护的政策之方便借口。朗西曼勋爵写道：“在那些介乎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国之间的边界地区，那里苏台德居民是一个重要的多数。应该立即给予他们以充分的自决权，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象我所认为的那样，有一些割让是不可避免的，那末就应该迅速使之实现，不要拖延。……因此，我认为那些边界地区应该立即由捷克斯洛伐克转交给德国。”

外交方面的事态发展对纳粹原来灭亡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上所述，那个计划是以武装进攻来设想的，这就要求德国的军事力量要超过它在一九三八年时所达到的水平。西方国家的政策使纳粹领袖有了一个提前（即在军事准备仍然不充分的时刻）实现他们计划的机会。

在吞并奥地利之后还不满五个星期，希特勒和纳粹国防军最高司令凯特尔将军就批准了“绿色方案”（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代号）的原则。一个月后，在五月底，希特勒签署了一份具体的指示，这个指示是以这样明白无误的语言开始的：“我的不可变更的决心，就是在最近立即以军事行动粉碎捷克斯洛伐克。”

这个决心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政治考虑促进的，这在指示的头一段中表达了出来：“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出现不可避免的事态发展，或在欧洲发生的其他政治事件，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可能会促使我提前采取行动。”六月十八日的补充指示，对这种有利机会下了一个十分明确的定义：“只有我坚信，就象那次进入非军事区和进入奥地利一样，当法国不会出兵，因此英国也不会干涉时，我才会决定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行动。”

到那时，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日期已决定为十月一日，“绿色方案”的最后准备工作则实际上在八月底就完成了。因此，一直到慕尼黑会议时为止，纳粹领袖们是按照他们原先的以军事行动灭亡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行事的。

西方的政策虽然并不是阻止德国的目的，但却反对德国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正如哈利法克斯勋爵早先说过的，“严峻的事实往往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战争一旦在中欧发生，很难说战争会蔓延到哪里，或谁可以不卷入战争。”在这个问题上，以英法政府为一方和以纳粹政府为另一方，发生了真正的意见冲突。结果，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的最后阶段，也就是一九三八年九月下半月那个真正的“慕尼黑危机”，看来所牵涉到的几乎完全是国际侵略行动的方式问题。

在英法举行了一系列会议之后，两国政府接着在九月十九日共同给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发了一个信息，建议捷克斯洛伐克把讲德语居民占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地区转让给德意志帝国。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拒绝了英法建议，指出这是在没有他们参加的情况下拟定的，并且指出如果接受这个建议，那“就等于默认这个国家在各方面都将变得支离破碎了”。然而，西方政府却坚持必须接受他们的建议。他们的大使拉克鲁瓦和牛顿在九月二十一日凌晨两点钟拜访贝奈斯总统，毫不含糊地指出，如果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不是无条件地和立即地接受英法方案，那就在全世界面前对因此而引起的战争要负全部责任。如果拒绝这个建议，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还要承担破坏英法团结的罪名，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即使法国去援助捷克斯洛伐克，英国无论如何也是不会参战的。”法国还正式下达通知，“如果因拒绝而挑起一场战争的话，它将不履行它的条约义务。”和贝奈斯总统的会见在凌晨三时四十五分结束。三小时以后，英国大使接到通知要他把初步消息告诉哈利法克斯勋爵：捷克斯洛伐克已接受这个建议。

这就是“慕尼黑一周”的开始。以后八天发生了什么事，已不再具有重要意义了。

这里有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关于导致捷克斯洛伐克灭亡的政策的一个总结。九月二十七日，即在慕尼黑会议之前两天，英国外交大臣发了一封电报，提到拟议中的肢解捷克斯洛伐克问题时，提请德国注意：“英王陛下政府希望希特勒先生有这样的深刻印象，即他是同英国和法国政府，而不是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打交道。”这句话简单明了，直言不讳，充分证实了丘吉尔事后不久为慕尼黑而发表的关于西方施加压力政策的令人震惊的评语。他说：“一切都过去了。缄默的、悲哀的、被抛弃了的、意志消沉的捷克斯洛伐克退居黑暗之中。它同西方民主国家和国联结盟时，总是百依百顺的奴仆，这使它在每个方面都受尽苦难。长期以来，它追随法国的领导和政策，和法国站在一起，结果使它特别遭难。”

## 结 束 语

纳粹德国占领布拉格和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成立“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是不到六个月前在慕尼黑作出的决定带来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导致这个国家最后毁灭的方式的那些细节，在前一年四月举行的英法会议上，几乎都正确地预测到了。因此，德国这次新的侵略行为，除了对实现这些改变的方式方法表示了象征性的不满而外，西方国家是把它作为迟早必然要发生的事情而加以接受的。这并不令人感到惊奇。张伯伦在纳粹进入捷克斯洛伐克那一天为慕尼黑协定辩护时，简单扼要地宣布说：“我们原来希望这个协定也许可以使那个国家有一个新的前途，现在那个国家却分崩离析了。……这也许是可以避免的，也许是不可避免的。”

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事实是，在占领布拉格后仅仅一天，即

三月十六日，英国工业联合会和它的德国的对等组织，在它们各自政府的支持下，签订了所谓杜塞尔多夫协定，结成开发世界市场的经济同盟。在以后的几个月中，英法的政策依然是慕尼黑的路线。也就是这条路线，使英法同苏联之间进行的关于共同反对侵略的长期谈判在一九三九年夏天破裂了。与此同时，英法却同德国的沃尔塔特、达勒鲁斯和其他秘密使节进行了非正式的谈判。

慕尼黑的政策不仅蔑视了和不道德地违反了国际义务，而且它打算实现的目标也没有一个是达到的。原来打算把德国法西斯主义引向东方，却招致了对西欧国家发动的一场毁灭性的大屠杀。原来以孤立苏联为目的，结果却使英国几乎致命地被孤立起来。以竭力反共为动机，却并没有能阻止新的社会秩序的迅猛前进。丘吉尔说，慕尼黑是“我们历史上一个极其重大的里程碑，它打乱了欧洲的全部均衡”。这句话决没有夸大事实。

从纳粹将军们在纽伦堡受审时所作的证词中，我们现在知道，在一九三八年秋天，德国军队并不具有成功地发动一场反对苏联和西方国家联合力量的战争的能力。的确，一些主要的将军深信，这样的战争将会招致溃败，因此他们曾密谋要逮捕希特勒，把他交给军事法庭去审判。他们甚至还把他们的计划通知了英国政府。

但是，西方的政策是决心要同纳粹政权合作，而不是推翻这个政权。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五日，张伯伦对希特勒的访问使将军们的密谋流产了。说他的访问挽救了和平，完全是毫无根据的断言，倒是存在着这样一个可能的假设，即他的访问大概挽救了这位纳粹领袖。

(摘译自一九五八年布拉格出版的《慕尼黑回顾》一书  
钱志坚译)

## 玩 火

〔苏〕《真理报》

欧洲正处于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德国法西斯在英、法统治集团的纵容下企图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兼并苏台德区。德国法西斯为此施展了一切卑鄙伎俩，从恐吓威胁到唆使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亨莱因分子进行颠覆破坏活动，甚至煽动他们发动公开叛乱，反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

德国法西斯为了掩盖它的侵略政策，叫嚷要争取“平等”、“自由”和摆脱凡尔赛和约的束缚。其实，问题并不在于凡尔赛和约。全世界都知道，依据凡尔赛和约，德国把原有的一部分领土划归法国（阿尔萨斯-洛林），一部分划归丹麦（北石勒苏益格），还有一部分给了波兰（所谓波兰走廊），而德国的殖民地则大部由英国管辖。全世界也都知道，依据凡尔赛和约，捷克斯洛伐克不曾分得过德国一寸土地。捷克斯洛伐克并不是德国的组成部分，就象现在德国法西斯占领的奥地利不列入德国版图一样。

德国垂涎捷克斯洛伐克领土这一毋容置辩的事实，是无法以任何外交欺骗词令所能掩饰得住的。

德国法西斯强词夺理地说，他们需要苏台德区是为了实现“民族统一”。希特勒“民族统一”的口号和墨索里尼的政策完全吻合，墨索里尼也在南蒂罗尔省对日耳曼居民进行残酷的民族压迫。不难看出，希特勒在“民族统一”这一冠冕堂皇的口号的

掩饰下，正征得英国保守党员和法国朋友的赞同，企图采用暴力重新划分欧洲国家的疆界。

试想，采用这样的手段来实现“民族统一”，怎么能够维持和平！如果今天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领土苏台德地区统计有多少德国人和捷克人；那么，明天就很可能有类似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这些问题未必会使英、法统治集团感到愉快。

非常清楚，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企图不在于实现“民族统一”，而在于强行重划边界以达到公开侵占别国领土的目的。史无前例的“事件”在我们的时代层出不穷。大不列颠政府首脑张伯伦竟向另一政府首脑卑躬屈膝。声名狼藉地出访希特勒就是这类“事件”之一。但是，尤为严重的史无前例的“事件”是以“和平”为名企图肢解和奴役欧洲某个国家，并且这种企图的支持者和赞同者正是那些屡次庄重地宣誓要尊重和维护捷克斯洛伐克边界的强国。

牺牲小国的利益来和法西斯勾结的政策，从一开始就不仅对普遍和平是最大的危险，而且还包含着对走上这种勾结道路的英法的切身利益的直接威胁。因为这一政策的实质在于不可避免地导致法西斯的胃口越来越大，勾结的代价越来越高。现在的代价是牺牲一个国家的独立，肢解这个国家，而这个国家乃是德国继续执行希特勒进一步向东南欧侵略扩张计划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国际条约还有什么作用，还有什么价值，是否存在国际法，或者借用“第二帝国”首相贝特曼-霍尔威克在一九一四年德皇的大举入侵“中立的”比利时、威胁着巴黎和伦敦时所说的名言：国际法已成为“一堆废纸”了。

由于“民主”强国纵容法西斯侵略的结果，遵守国际法倒成了罕见的事情，而破坏国际义务却不足为奇。小国既有奥地利

和捷克斯洛伐克作为借鉴，也就越来越不相信英法许下的保护它们的独立、使它们免遭法西斯侵犯的诺言了。

苏联是自始至终坚决捍卫普遍和平、维护国际法和国际安全的唯一国家。我们国家在国内已消灭了任何形式的奴役，同时坚决反对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民族奴役和殖民地压迫。统治某个殖民地或附属国的究竟是哪个帝国主义强盗，苏联觉得这个问题并不十分重要；因为苏联认为在德国侵略者和英国侵略者之间并没有区别。但是，对西欧“民主国家”来说，这些问题却不是无关紧要的。英法支持和赞同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掠夺，它们是在玩火，因为他们明天也将面临同样的问题。

（摘译自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一日苏联《真理报》 复  
旦大学外语系工农兵学员余菊芬译）

## 英国在对付希特勒中能够做些什么？

〔英〕温斯顿·丘吉尔

我并不认为由于捷克斯洛伐克问题有引起爆发一场大规模陆战的直接危险。我知道，这种说法是非常轻率的，但是，在这么多的人感到惊慌失措之时，谁都应当冒些风险来陈述自己的真诚见解。第一个理由是，据许多老练的判断者的意见，德国今年尚未为一场大规模陆战这样一个严峻的考验作好准备。第二个理由更加使我信服，因为第一个理由显然是以无法估量的事实和无法调查的秘密为根据的。第二个理由就是，挑起这样一场战争对德国统治者不会有好处。

他们不是正在得到他们所要求的一切而未经战争吗？他们不是正在达到一系列最重要的目标而未放一枪吗？德国不是能够毫无限制地施加经济和政治的压力，而不必真正使用军事力量来压迫这个不幸的国家<sup>①</sup>吗？它在政治上可能被扼杀，它在经济上可能被窒息，它实际上处于优势力量的包围之中，除非采取某些措施来减弱周围的压力，否则，它将被迫继续不断地投降，远远超过任何公正的法庭认为是正当或合理的限度，一直到它的主权、它的独立、它的完整被最终摧毁。那末，德国的统治者们为什么要实行军事打击呢？他们为什么要冒一次大战的风险呢？

---

<sup>①</sup> 指捷克斯洛伐克。——译者

此外,我想还得考虑到,德国为实现它的野心,还有另一条甚至更为诱人的前进路线。在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省匈牙利族的居民中,发生了严重骚乱,无论是否应匈牙利人的邀请,这可以为德国开进军队提供一个借口。于是,利用罗马尼亚的石油和粮食的全部前景就会展开。在这里,武力可能再次得以避免,而实际上的合并可能会假托强迫联盟来加以掩盖。同时,控制维也纳就可以操纵、利用和控制所有多瑙河盆地国家的经济财富,使之有利于德国的计划,有利于德国的财政、贸易和军备。那末,德国为什么要另择一处,指向那个必遭法国和俄国反对并由它们作过明确保证的地方呢?我认为,如果政府把大不列颠的全部力量用来支持法国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诺言,它并不会冒太大的风险。英法两国不会过多地增加所承担的义务,却会使保证加倍可靠。

但是,今年的故事并没有在捷克斯洛伐克结束。它也没有在这个月结束。德国独裁者的权力与日俱增。可能,他的胃口越吃越大。长期以来,法律和自由的力量除了经历挫折、失败和屈辱之外一无所能。可是,任何显示联合行动、主动性和团结的征兆,都会使这些力量的影响大大增强。英国和法国在这样一个时刻、这样一种事业中联合起来,这一事实将会给英法两国以它们所需要的力量和威望,借以使摇摆不定的国家确信,它们这些国家将得到一个坚毅的民族作为好朋友,它们将根据国联盟约和盟约的原则加入联合。紧接着大不列颠和法国可能结成这样一个坚强的联合之后,为了有效地履行国联盟约,我们就能够作出、或者开始作出这样的安排。我们就会有一个作为国际联盟代理者的大国集团,它们将成为文明的捍卫者,而一旦大国集团强固地建成,就会至少在一个长时期中使我们从目前所必须忍受的那种变化不定、焦虑不安的苦恼处境中摆脱出来。在

这个时机中的联合行动，将使处理下一个时机的问题较为容易和较有把握。如果成功，它无疑将为坚持对西班牙实行不干涉政策而采取更有效的联合行动铺平道路。为应付某一特殊事变而联合起来的各国，当它们环顾四周之时，将会高兴地发觉，它们拥有足以对付尚未出现的其他事变的聚合力量，而这样，我们就可能在法律和正义的旗帜下集合越来越多的朋友，大家都服从于自己准备履行的各项原则。于是，借助于联合起来的军事和道义的手段，我们就能为全世界和整个大英帝国的各个自由民族重新取得优势和主动权。

任何人都不能设想，认为这仅仅是一个下定决心、板起面孔却又袖手旁观、坐视捷克斯洛伐克象奥地利一样被宰割、被蹂躏的问题。所要求于我们的决不仅仅是某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将要遭受灾难的也不仅仅是捷克斯洛伐克。请看一看多瑙河盆地诸国。首先是南斯拉夫。这是一个最强大和生气勃勃的国家，它的军人中的四分之三无疑是对英、法的民主制度充满同情，而对纳粹和法西斯统治怀着强烈的憎恨。他们有着维护自身独立的根深蒂固的愿望。假定大不列颠和法国准备卷入多瑙河盆地问题，在调查南斯拉夫将要如何行动方面难道无所事事吗？我们将会赢得南斯拉夫，而且人们告诉我，这将影响到保加利亚，也许会使保加利亚也站到我们一边。接着便是遭到德国潜在的向东扩张的直接威胁的罗马尼亚。如果听之任之，并认为它们没有毅力反抗独裁者们，这三个国家将要一个接一个地落入纳粹的掌握之中。随后，希腊和土耳其的处境将会如何呢？

这五个国家连同捷克斯洛伐克，它们都有强大的军队，它们人口总和达七千五百万，它们有数百万经过训练的战斗人员，它们有无限的资源，它们都希望在当地和平生活，它们分开来会被各个击破，但它们联合起来会成为一支巨大的抵抗力量，由法国

和大不列颠采取果断的行动把这六个国家团结起来，这难道是不可能的吗？为了它们自身的利益，为了法国和英国的利益，首先是为了和平的利益，而保障它们的安全和自由，并把它们联合起来，在这方面难道能够无所作为吗？难道我们真的打算听任这些巨大的可能性统统丢弃而不作出任何协同努力吗？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就不能有片刻的幻想，以为我们将会避免自身的危险。相反，由于一个极其明显的理由，我们将加剧自身的危险。目前德国可能预期进行一次短期战争，然而，一旦它染指这些国家并把势力扩张到黑海，那末不管战争持续多久，纳粹制度将能够无限期地使自己得到供应，而这样，我们将撤掉又一道防止战争的屏障。整个多瑙河国家的纳粹化对于英帝国是头等严重的危险。难道这一切都毫无价值？难道这一切都听其丢弃？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将要为我们的无先见之明和缺乏活力而深切痛悔。

有人说过，如果我们现在不勇敢迎击独裁者，有朝一日我们将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那时我们将要在远为不利的处境下去抵抗他们。两年以前局面是安全的，三年以前情况是良好的，四年以前只要一个电报就能使形势改善。但是，一年以后我们的处境将会怎样？一九四〇年我们的处境将会怎样？在此后的几个月内，所有这些有实力的国家都将作出抉择，或者是遂其意愿，集合在仍然飘扬在日内瓦上空的文明的旗帜之下，或者是被迫听天由命，采用纳粹各国的制度和学说。内维尔·张伯伦曾经谈到同意大利进行谈判。我不想对这些谈判加以评论，因为我宁可等待着什么时候结果被摆在我们面前。我知道，比起建立多瑙河集团来，支持这些谈判并非更加有效的办法；当此危急之秋，没有什么东西比缔结一个富于成果而行之有效的协定更适当的了。我相信政府将作出最大努力。即使为时已晚，灾难

已临头，但也切不要放过任何时机去努力使这一大片地区免受蹂躏、掠夺和破坏。

我现在来谈谈构成我们反对侵略的威慑力量的第二个方面，即国防。我非常欢迎首相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声明，特别是他关于同工会进行协商的决定。我知道他是反对作出草率决定的。在重整军备的第三个年头，没有人会说这是一个草率的决定。我也非常高兴地得悉，他再次保证将采取果断的行动来加速建设我们的空军、我们的防空系统和我们的高射炮部队。显然，还有其他一些资源未被利用，如果作出更大努力的话，它们现在是会被利用起来的。我感到十分遗憾，在过去四年中，正当发现空军建设计划远远地拖在后面踏步不前之时，那些补充资源却未加利用。我们不仅开始时迟了两年，而且第二个两年又因为建设速度太慢而受到耽搁。

让我们从近年来的经验中引出一条教训吧。当前的危机很可能将会过去，将会消失，并平静下来。一条巨蟒在吞咽了祭品之后往往有一段相当的时间进行消化。在秘密的德国空军暴露以后是如此，有过一段间歇时间。在德国违背凡尔赛条约宣布征兵以后是如此，在来因兰被武装占领以后也是如此。现在，在奥地利被扼杀之后，我们大家都惊慌不安，但不久也许会有另一次间歇，也许没有间歇，——我们无法断言。但如果有间歇，那时人们将会说：“请看那些杞人忧天者是怎样被驳倒的；欧洲平静下来了，风平浪静了，战争恐怖过去了。”内维尔·张伯伦也许会重复他几个星期以前讲过的话，欧洲的紧张局势大大缓和了。《泰晤士报》将发表社论说，那些在奥地利被合并后的第二天就大吵大嚷要在对外政策和国防上采取非常行动的人，看起来是多么愚蠢；而没有让自己被这一偶然事件牵着鼻子走的政府又是多么明智。

在此期间，议会民主力量的严重退化将在全欧洲继续下去。德国军队每隔六个星期就要增加一个新的军团。在此期间，各重要的国家以及大的铁路和河流交通线将落入德军总参谋部的控制之中。在此期间，居民将不断地沦于纳粹的严厉统治之下，并在纳粹制度下被同化。在此期间，征服和威吓的势力将获强化，不久将确实无疑地达到人多势众和居于优势地位。于是另一次突然袭击将随之而来。打谁呢？我们同德国间的问题悬而未决。我们无法断言。我们担心的是，随着一个又一个国家卷入纳粹体制，随着它们的全面准备最终完成，随着危险不是日趋减弱而是与日俱增，如今促使我们积极努力的刺激力也将会消失。

前几天，哈利法克斯勋爵曾经说过，欧洲紊乱不堪。欧洲紊乱的部分是议会政府统治的部分。我知道，在独裁巨头们那一边没有紊乱。他们怀着冷酷无情的坚定决心，朝着阴森可怕的目标不断地前进。他们知道他们要求什么，没有人能够拒绝，到现在为止，他们每前进一步都取得他们所要求的东西。当我回顾过去的五、六年时，我发现许多机会失去了，那时，我们能够联合起来对抗威胁，那时，在集合强大的力量之后，继之以豁达大度的行动，我们也许可以避免如今已经临头的灾祸。

对世界安全的严重的、也许是无可挽回的损害，发生于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五年现任财政大臣约翰·西蒙爵士担任外交大臣任内。当时，我一再冒昧请求下院注意这一箴言，即平息战败者<sup>①</sup>的不满应在胜利者开始裁军之前。那时才是对德国人民和德国统治者作出让步的时候，才是让步能够获得其真正价值的时候。但实际上却未作过这样的尝试，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所作所为只不过是玩忽我国的防务，并竭力鼓励法国采取同样轻

---

①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国德国。——译者

率的行动。接着来的一九三六年初德国重新占领来因兰。现在我们知道,如果法国、英国及当时同它们合作的其他大国采取坚定的立场,并利用国际联盟的权威,一定会毋须流一滴鲜血而使德军立即撤出来因兰,而其结果也许会得到无可比拟的好处,因为它将使德国军队中较为谨慎的人物重新得到合适的职位,而不会让德国的这位政治头目得以独揽大权而得寸进尺。在取得这样一个成功之后,我们就可以作出宽宏大量的处置。

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他们采取第三步行动的时刻,但机会并没有以同样有利的形式重现。奥地利已被奴役,我们不知道捷克斯洛伐克会不会遭到类似的攻击。这个小国曾宣布要实行抵抗,如果实行抵抗,一场无人能预言其界限的战争火焰就很可能点燃起来。

关于这些问题,我对下院的议员们谈了五年,成效不大。我眼看着这个著名的岛屿<sup>①</sup>沿着通向黑暗深渊的梯级无法控制地、轻率地步步下沉。起初这个梯级是相当宽阔的,不久到了地毯的尽头。稍稍向前就只是石板,再稍稍向前,你的脚下就是裂缝。请回顾这最近的五年吧。紧接着大战以后的岁月里,我们确实是铸成大错。但在洛迦诺,我们曾经为有可能促成巨大进步的运动奠定基础。请回顾这最近的五年吧——由此可以明白,德国已开始认认真真地重新武装并公开扬言复仇了。如果我们研究罗马和迦太基的历史,我们就会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发生。对三次布匿战争形成一个理智的见解并不困难;但是,如果致命的灾难压垮了英国民族和英帝国,一千年以后的历史学家们将始终对我们的事情的秘密困惑不解。他们将永远无法理解,一个稳操胜券的民族,怎么会听任自己败落

---

① 指英国。——译者

下去。

现在，胜者变成败者，而那些曾经在战场上放下武器并乞求停战的人们，正在谋取世界霸权。这就是当前的形势——这就是一点一点发生而造成的可怕的变化。现在是唤醒英国民族的最后时刻了。也许这是唤醒英国民族而能够制止战争，或者通过我们的努力避免败局、赢得胜利的最后时刻了。我们应当排除万难，尽力把我国人民的全部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团结起来，使伟大的英国民族在全世界面前重新站起来；因为这样一个充满着传统的活力的民族，即使在这样一个时刻也能够拯救文明。

（摘译自一九三八年十月美国《现代史》杂志 施鉴思  
译）

## 张伯伦外交政策的剖析

〔加〕R·P·达特

最近的英苏接近,对整个国际来说,无疑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必须竭力加强和发展这些初步尝试,使它能有一个巩固而持久的结果,即为了共同维护世界和平而达成相互的真实了解和协定。

但是,在这个目标未达到以前,在英国基本政策尚未变更以前,张伯伦政府所扮演的角色,还是那老的一套。

以张伯伦的观点看来,他把吓唬希特勒并暗示说我是可能和你走到一起的,作为迫使希特勒接受英德协商的主要武器。这项英德协商就是张伯伦政策的目的。

在这样紧急转变的关头,摆在英国人民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必须从中选择其一。孤立是行不通的死胡同。

一条道路是和平政策,那就是在英、法、苏三国之间缔结协定,并争取美国和一切同意维护集体和平协定的国家的全面合作。

这个政策是可能制止法西斯国家的进一步侵略的,因为它不是势力均衡,而是民主和平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

伦敦、巴黎、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协定,就是和平,这是集体安全政策。可是,张伯伦对此毫无兴趣。

另一个就是妥协政策,英国企图同德、意、日三国侵略者搞妥协,唆使一个集团去反对另一个集团,削弱法国去培植德国力

量,让德国在中欧、东欧放手去侵略;唆使三个协定国家去反对苏、美,改头换面地推行势力均衡的老把戏。在这样情况下,英国企图乘机大捞一票。

这就是所谓“绥靖”政策,它实质上是煽动战争的政策。它驱使连续恶化和灾难的国际形势,最后走向悬崖的边缘,从而也就把英国人民带到了极端危险之中。

这就是张伯伦的政策。他现在还在继续奉行这项政策。

自从组织“国民内阁”以来,在麦克唐纳和鲍尔温执政的岁月中,特别是张伯伦组阁后的这些年代中,我们曾多次揭穿英国驱使全世界走向战争阴谋的主要企图。同一九一四年以前的政策相比较,目的还是那样邪恶,还是那样模糊,只是形式较为新颖,披上了“爱好和平”的外衣而已。

我们已经再一次着重指出,英国反动政策,并不只限于通常评论中所说的那些简单的“被动”、“无助”、“机会主义”和“投机主义”等等,而是驱使战争的决定性因素。这就是说,战争的直接纵火者是在柏林、罗马和东京,而战争的最终罪恶者却在伦敦。

在去年四月间,我们在一篇文章中就曾指出:

“要了解目前世界的形势,不仅要很好注视法西斯主义,而更重要的是,要注视英国的作用。

“英国依然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国家。它拥有广泛分布的利益,以整个帝国为基础的雄厚资源,还有最巧妙、最老练的政策。在法西斯主义这一阶段的发迹中,反映了目前国际关系的平衡,但它并没有反映出那个使平衡得以存在,使当前法西斯主义可能成为起作用的决定性力量。

“世界的决定性作用,依然还操在英帝国主义者手中。这就是当前形势的中心。大家都已经看到,纳粹的屠刀已搁在欧洲

人民的头颈上了。由于缺乏一种团结力量，一个又一个国家不断地落到法西斯主义者的手中去了。但是，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那个阻碍团结的力量，使纳粹的屠刀得以取胜的原因，就是那个‘国民内阁’下的英国。

“现在正象一九一四年以前的情况那样，为战争敞开了方便之门的主要力量，就是英国。”

虽然，后来法西斯主义力量是相对地强大了，但在目前，这不仅没有减少它的重要性，相反，却变得更加重要了。

斯大林在联共第十八次大会上关于国际形势和英国政策的分析，是对目前形势真实而明晰的指针。他指出英国“不干涉”政策实际上是怎样唆使战争的政策。

“在不干涉政策中贯串着一种倾向，一种愿望，这就是不妨碍侵略者去干它们的黑暗勾当，比如不妨碍日本纠缠于对华战争，更好是对苏战争，比如不妨碍德国陷入欧洲事务和纠缠于对苏战争，让所有交战国都深陷到战争的漩涡中去，暗中鼓励它们这样干，让它们相互削弱，相互消耗，然后，当它们相当疲惫时，自己就以充沛的力量出台活动，当然是‘为了和平’而出台活动，并迫使那些精疲力尽的交战国接受自己的条件。”

他又进一步指出，这个政策实际上是一个“危险的政治把戏”，它使那个政策的推行者自食其果。

“那些创立不干涉政策的人所玩弄的巨大而危险的政治把戏，最终会使他们遭到严重的失败。”

这个分析，为英国目前面临危急阶段和极端矛盾的情势找出了线索。

以往英国传统的势力均衡政策，均分实力以保卫属地政策，已经同英国反动势力的传统反革命政策结合起来，转变到一个新的阶段。

许多批评家都认为，张伯伦帮助纳粹在欧洲侵占土地，是违反了一个世纪来势力均衡的传统。

英国不是曾在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期间，为了阻止这一个德国在欧洲的野心，为了粉碎它独霸地中海的美梦而参战吗？为了这个目的，牺牲了近百万的生命。

二十年以后，这一切牺牲的成果都被随心所欲地抛弃了。它 是被张伯伦这一伙政治家所抛弃了的。他们应该对凡尔赛和约负责，可是，现在他们又变成更大规模分割欧洲的帮凶了。

这是表面的矛盾。因为，在战后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势力。过去法德之间的龃龉已经不再是中心了，虽然在起初几年曾经是这样。

苏、美这两个巨大的世界力量，现在是站在前哨阵地了。另一方面，英国却竭力期望有一个强大而反动的德国成为它在欧洲的帮凶。

英、美、苏之间的联合可以使世界太平。而张伯伦则反对有这样一个阵容坚强的民主和平战线。

不但如此，他还奉行着那势力均衡的老政策，并且纵容这三个法西斯国家去反对苏美，这就在“不干涉”的幌子下，隐藏着唆使战争的罪恶责任。

《伊索寓言》中有一则豢养小狮子的故事。狮子长大后干了些什么，这在原书中是可以看到的。六年来，英国一直在豢养它的小狮子希特勒，期望它长成一头壮狮，好纵容它去咬苏联。现在狮子已养大了，可是英国政策的关键时刻也来临了。

在慕尼黑协定明显失败，当世界舆论有了转变的时候，打倒张伯伦，改组一个奉行革新政策的政府，现在是一个非常适宜的时机了。

（摘译自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加拿大《每日喇叭报》）

## 英国亲德外交的内幕

〔英〕克劳德·科克布什

一九三七年夏季，英国驻西班牙共和国的代办莱希，发表了一些狂言澜语，这些话又从一位英国上议院议员的口中重述出来。他说：“对我来说，我宁愿英国由信仰帝制主义的德国人来统治，而不愿信仰共产主义的英国人来统治。”自从莱希先生这种肆无忌惮的政见在英国发表以后，引起许多人的惊讶。其实这种过分率直的意见，伦敦的许多重要人物都有同感，只不过是嫌他表达得太卤莽了一点。

没有一个政治家会用这种方法表示自己的政见，即使是自己私下议论的也不多。然而，这种政见所代表的政治倾向，却是英德关系、尤其是英国内部矛盾和英国对德政策的一个基本的事实。

魏玛共和国从一般西欧列强、特别是从伦敦所获得的让步，都是靠着流行在伦敦的那种信仰：德国如果被逼得厉害，就要“赤化”了。

希特勒和戈培尔博士的主要胜利，就是将所谓“赤化”的观念更加以扩大，对于每一种民主主义的前进或每一种民治的进步和扩展，都算作“赤化”，从而使伦敦一批要人的恐惧心理也随之而增长。

在英国保守党中，很大一批人把希特勒看作“欧洲的防共壁垒”。这是希特勒在英德政治赌博上最有力的一张王牌。在伦

敦，正象在柏林一样，“防共壁垒”已经成为、而且越来越成为希特勒和戈培尔博士的荫蔽所了。为了德国帝国主义的需要，可以随意应用。

这些说起来也许觉得荒谬，但确是事实。凡是常和英国保守派接触的人，都可以证明：德国政府的采取同盟政策，或者是削弱外国反对者的政策，都已在英国成功地获得了政治上的优先支持；任何政府或政党，凡是阻碍德国的侵略性外交政策的，不是被当作“赤化”，便是被当作“倾向赤化”。

例如，塔里法确实有德国炮台，不但可以控制直布罗陀海峡，并且还可以控制直布罗陀港口本身。在这个地点设立炮台是条约所禁止的。英国海军大将凯斯曾在下院承认，一旦战争爆发，英国舰队必须用烟幕或在重雾遮蔽下，才能安全通过直布罗陀海峡。

但是，在深受戈培尔博士眩惑的英国保守党是怎样看的呢？应该支持西班牙政府，援助它们尽快把德国人赶出塔里法？然而西班牙政府是“赤化”的（戈培尔博士和他的英国朋友都这样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只好让德国大炮仍然留在塔里法，让德国的矿主把毕尔包的所有铁矿都挖掘出来搬到克虏伯去了。

这一切“推理”的过程，在伦敦任何保守党的俱乐部中都可以听到，同莱希先生冒失的政见相差不远。“防共协定”以及它的一切涵义，都不过是同一个破坏政策的扩大。

凡是不熟悉保守的伦敦空气的人，确实难以了解这种事情的重要性。英国水兵被日本人所杀，固然是件憾事；然而日本人不是把中国从布尔什维克的手中救出来吗？墨索里尼在地中海不把英国海军放在眼里，固然也是件憾事；然而，没有墨索里尼，意大利不是就要“赤化”了吗？以此类推，可以推至无穷。

这就是英德关系的真正的背景，这就是英德局势中自相矛

盾的最后钥匙。

举例来说，英国因德国重整军备而恐慌，但在一九三三年，正是英国的钢铁业巨头鲍尔弗告诉大家：德国将必须重整军备，英国钢铁业应该给以援助。

过了一年左右，当英国开始考虑，为防止德国攻击，需要竭力筹款以整顿军备时，英格兰银行却是贷款给德国，帮助德国整军计划的实现。

在国社党扩充空军的第一年，戈林将军的密友、纳粹主义的热忱钦佩者伦敦德里爵士，为了“英德亲善”，却暗暗地压下了航空部专家搜集的关于这件事的重要报告。

哈利法克斯之前往德国，以及此行之一切，都是亲德倾向的最近最重要的表现，这种倾向，现已发展到危险的病态程度。

（摘译自一九三八年二月英国《现代史》杂志）

## 英国外交的秘密

〔美〕L·法拉戈

尽管英国在狂热地准备战争，尽管皇家公园内在挖掘防空壕，尽管英王已经颁布了非常时期的命令以及召集预备军、实行口粮分配等，但是，张伯伦为了避免联合苏联对德作战，却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在这方面，英国首相不仅是实践着他自己的政策，并且还是按照英格兰银行总裁孟特鸠·诺曼的训示而做的。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尖锐化的不久以前，诺曼曾经警告过张伯伦，不许他在任何情况下联苏反德。相反，张伯伦却必须竭尽全力使德国加入反苏联合阵线。

慕尼黑四国会议，正是希特勒希望已久的一个阴谋，也是英格兰银行总裁、卡尔登俱乐部以及英国军火工厂的大老板们四年前合作准备的一个计划的完成。

不管张伯伦是怎样地把他的意图和自我牺牲的努力告诉英国人民，但是，他没有把全部事实讲出来。他对于诺曼的警告、伦敦财团的压力以及他自己宁肯接受最屈辱的和平也不与苏联联合的意愿都一字不提。

一九三四年春天，在英格兰银行的大厦里，一群金融家们围绕着诺曼开会。当诺曼讲到欧洲政治集团以及未来的局势时，他认为，过去十五年中支配英国政治的问题——颠覆俄罗斯的苏维埃政权，仍然是当前的一个非常急迫的问题。他说，过去十五年来，英国为了这个目的曾经单枪匹马地作战。它没有把日

趋衰弱的法国和国内问题严重的意大利看成是可能的伙伴。但是，目前一个新的强国已在欧洲的政治地平线上建立起来了，这就是纳粹德国。希特勒已经使一些批评者感到失望，他的政权决不是暂时的恶梦，而是有美好前途的一个体系，因此，诺曼劝告他的董事们，应该把希特勒包括在反苏计划之内。参加会议的金融家们没有提出反对，并决议伦敦金融界应该暗中援助希特勒，直到诺曼能对英政府施加足够的压力，使它放弃亲法政策，而采取一种更有把握的亲德方针。

英国的金融家们立即行动起来，他们的第一步工作便是支持那时刚要开始的希特勒秘密重整军备的活动。他们利用在维克斯兵工厂和帝国化学工业公司中具有支配势力的股东权，指使这两个庞大的军火企业利用它们力所能及的一切方法援助德国军备计划。这两个企业非常愿意合作，因为这同它们的反苏计划是不谋而合的。远在诺曼决定利用希特勒以前，维克斯兵工厂就已经建立了一个反苏的军火工厂网。它控制着波兰的军需工厂，日本的三井炼钢厂和意大利的军火工业，并与克虏伯以及其他几家德国兵工厂保持密切的联系。事实上，维克斯兵工厂的财阀们在未来反苏战线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他们的代表机关。在日、德、意签订反共协定之前，这个反苏的军火工厂网就已经建立起来了。

不久，英国海军也转向亲德政策。这种积极亲德政策初步的成功，就是英德海军协定，这正是希特勒撕毁凡尔赛和约的实际开始。这个协定同意英国海军部和德国海军部保持最密切的合作；并规定相互交换海军情报。协定签订后不久，一个包括六个海军部高级官员的英国海军代表团前往柏林，在柏林建立了总部，调查德国海军军力。它向德国建议废除海军使用的米突制，采用英国使用的英美制，以便一旦德苏在波罗的海发生战

争时，英国军火商可以立刻供给德国军火。同时，德国也把柏林工业专门学校一种用于潜水艇建造的发明交给了英国海军。

英国陆军部也照样行事。他们同意了同德国交换军官的建议，在一九三四年有三个德国军官来到伦敦，同时有三个英国军官被派到德国陆军部服务。同年，英国军火公司在德国军事杂志上登载出售坦克和枪炮的巨幅广告，这是凡尔赛和约所禁止的。当有人要求维克尔兵工厂保证它的军火决不被德国用于秘密重整军备时，这个工厂的老板说：“我不能给你们一个确实的保证，但是我可以奉告各位，我们没有一件事是没有得到我们自己政府的完全同意和认可的。”

在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七年间，诺曼曾经数次尝试把鲍德温引诱到他的反苏阵线上来，然而这位“老政治家”却顽强地拒绝他的劝诱。鲍德温虽然不是亲苏政策的友人，但他认为希特勒比斯大林更坏。可是，诺曼终于把他的反苏观念灌输到鲍德温内阁几个阁员的头脑里了。首先加入诺曼反苏亲德阵线的第一个阁员就是国防大臣托马斯·英斯基普爵士，他的反苏态度是由于家庭的关系。他的岳父格拉斯哥伯爵就是“基督教反苏运动”的发起人和领导者。其次参加的阁员是西蒙爵士，后来为了酬劳他的功绩，将他升任财政大臣，这是和英国金融界关系最密切的一个职位。在当时担任财政大臣的内维尔·张伯伦也参加了诺曼的反苏计划，并获得了最大的成就。当英国的老牌政治家鲍德温在英王加冕之后呈请辞职时，张伯伦就成了他的继承者。由于张伯伦迁入了唐宁街十号，英国金融界的亲德反苏政策便胜利地进入了内阁衙门。

（原载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八日《文摘》）

## 慕尼黑协定的反响

〔日〕笹本骏二

### 英 国

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下午，从慕尼黑回来的英国首相张伯伦，在伦敦郊外的克鲁顿机场上，把藏在他衣袋里的一张纸头掏出来，挥来挥去出示给守候在那里的人群看。这张纸头就是慕尼黑协定签订后，同希特勒之间交换了签字的“英德宣言”的文本。张伯伦自己把它称为“我们时代和平的标本”。他从机场回到唐宁街十号的首相官邸后，又出现在聚集于官邸周围的伦敦市民面前。在这里，他再次把那张纸头，高高地举起来，摇来摇去回答群众的狂热般的欢迎。

因为签订了慕尼黑协定，不仅制止了欧洲战争的爆发，而且还额外地同德国订立了“英德宣言”。张伯伦对取得的这些成绩感到完全满意。他单纯地想：这样一来，欧洲的和平可以确保，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不必担心战争。当然，作为六十九岁的一个老政治家，能为他完成“和平使者”的使命而感到高兴和幸福，这也是不足为奇的。不过，遗憾得很，张伯伦的高兴和幸福，只不过是推行“绥靖政策”者的一种幻想罢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到一年的光景，它就大白于天下了。

所谓“慕尼黑的解决”，原来就是英国首相张伯伦和法国总理达拉第屈服于希特勒的威胁，把希特勒讲出的条件，原封不动

地叫捷克斯洛伐克吞咽下去。他们帮助希特勒的这种行动，实在是近代欧洲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软弱外交”的标本，它意味着民主主义向法西斯主义的“全面投降”。当然，民间的群众不可能知道得那么深刻。他们只觉得一个月来弥漫在欧洲上空的一片可怕的战争乌云，已经完全驱散，他们从内心里发出了欢呼，这是可以理解的。

据说这一天，伦敦的《泰晤士报》及其他有影响的报纸，收到了五十多封读者来信，他们要求设立“张伯伦基金”，以纪念他的功绩。另外，巴黎的群众报纸《巴黎晚报》还提出了有趣的建议，说是“为了使张伯伦能愉快地钓鱼（张伯伦非常喜欢钓鱼），可不可以把法国的一块土地赠送给他”。这都说明群众对“和平战士”的那种朴素的感谢心情是相当深厚的。

但是也有一些文臣武将，把慕尼黑协定看做是“民主主义对法西斯主义的失败”，他们对“绥靖主义者”所作的决定深感羞耻。在张伯伦领导的保守党和政府内部，也产生了动摇。当时担任海军大臣要职的达富·库巴就是因为反对这一协定而辞职的。当下院进行表决时，以丘吉尔为中心的、保守党内的四十名对德强硬派，都以弃权的方式对这一协定表示反对，其中有一个名叫哈罗德·尼科尔森的人（外交官出身的保守党政治家、对德强硬派的一员），对签订慕尼黑协定的问题，写下了下列内容的感想：

“炮制这一协定的一伙人，似乎没有能力把物质上的援助和道义上的满足区别开来。昨天，我们从心底里感到高兴，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已从迫在眉睫的危险中摆脱出去。不过，它却给我留下了道义上的不安。首相虽然对独裁者抱有明显的亲近感，但似乎不十分了解他们的心理。首相同意动员舰队也是由于内阁会议的强大压力所驱使。须知，我们叫墨索里尼胆战心惊

的，就是动员舰队的那一决定，这一点首相恐怕至今还不理解。另外，使独裁者退缩回去的一个原因，也还由于英国宣布了要同法国、俄国建立共同阵线，这一事实首相也不理解。再有，首相对俄国连一句感谢的话也不说就把它抛开了，这种错误将被独裁者所利用。”

另外，尼科尔森在下院讨论慕尼黑协定时，还对张伯伦、希特勒的“宣言”进行了批评。他说：“二百五十年来英国的传统外交政策，就是全力以赴地阻止由一个国家来统治欧洲，那张纸头给世界的印象似乎是英国已放弃这一政策。”

上述尼科尔森的感想和批评，可以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慕尼黑协定”的实质。

对“慕尼黑协定”持反对态度的文臣武将，除上面提到的那些人以外，还可以举出许许多多，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就是那位年轻的外交官孔·奥尼尔。他是在英国驻柏林大使馆工作的，因为抗议张伯伦的“绥靖政策”，他辞职了。这种年轻的官吏因抗议政府的政策而辞职的事件，在英国也是罕见的。情况就是这样，对张伯伦的“绥靖政策”，群众是欢迎的，与此相反，在有见识的人当中，则抱着严厉的批判和极大的愤怒的态度。

## 法 国

这种情况在法国也是一样，作为张伯伦的良好合作者而工作的法国总理达拉第，并不抱有象张伯伦那样大的幻想，他心里承认：慕尼黑协定对法国来讲是一个巨大的失败。他回到巴黎后，情绪消沉。他所以同神气活现的凯旋将军张伯伦形成对照，原因也就在此。

当他的座机抵达布尔捷机场时，他把外套的领子翻了起来。

他后来回忆说，这是因为“担心鸡蛋和番茄扔来”。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不论在机场上或到巴黎的沿路上，他都为欢迎他的人群所包围。迎接他的外交部长乔治·庞纳（法国绥靖政策的主角）看到群众的这种欢迎场面，以为事情办成，高兴地跳了起来。他说：“巴黎五十万男女老少市民都狂热地欢迎总理，所谓反对派的那些人到底到哪儿去了呢？连一个反慕尼黑派的影子也看不见。”其实他的这番话是撒谎。

和张伯伦的心情不同，这位多少感受到“良心责备”的达拉第，对群众的那种狂热的欢迎，倒是觉得象沉重的担子压在肩上似的。他回过头来对同行的外交部总务局局长莱捷说：“这种无知，真是无可奈何！”从他透露出来的这番忧心忡忡的话，可以看出他的心情比挥舞着“我们时代和平的标本”的张伯伦来得复杂。这恐怕也是法国内心痛苦的一种表现吧！因为它和英国不同，它必须把一个地地道道的同盟国抛弃掉。

但是，一般群众是不知道这种情况的，大多数法国人也同英国人一样，都为“驱散乌云”而高兴。然而，如同在英国丘吉尔和库巴那样的人一样，在法国也有保尔·雷诺和乔裘·曼台尔等人。他们两人都是达拉第内阁中强有力的成员，但因为抗议慕尼黑协定很快都提出了辞呈（雷诺当时任财政部长，半年后出任总理，曼台尔当时任内政部长，后被纳粹杀害）。再有，驻德大使弗朗索瓦-蓬塞，在慕尼黑会议时，一直呆在会场的旁边彻夜不眠，他认为“法国对待自己的忠实盟国太辣手啦！”对此，他深感羞耻。另外还有一个法国人，同样地对慕尼黑协定表示反对，他所采取的态度是古今内外少有的。他的名字叫福煦，是一位将军。当时他被捷克斯洛伐克军队请去在布拉格当教官。他不满法国的那种不负责任的做法，愤怒之余，毅然放弃法国国籍而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国籍。一位堂堂的法国陆军将军感到了

作一个法国人的羞耻,在这一羞耻当中,可以说充满着愤怒。

以上这些事实充分说明,有头脑的英法两国的人们,从慕尼黑的屈辱中受到了何等沉重的打击。但是他们敲起的警钟声,在群众的一片欢笑声中,在战争得以避免的感谢声中和在放心的漩涡中,都未能强烈地震荡下去。

## 德 国

在慕尼黑胜利者——希特勒的国家里,情况又是怎样呢?被战争的阴魂吓得胆战心惊的德国人民,同英、法人民一样,也为希特勒的恫吓所带来的不流血的大胜利而兴高采烈。这就更加提高了希特勒的威信。据后来证实的一个情况,国防军的一部分人已制订好计划,等到慕尼黑谈判破裂,危机进一步升级的时候,就发动政变打倒希特勒。由于英法的让步,他们煞费苦心制订好的计划也就告吹了。英法的软弱表现从两重意义上讲,不能不说是遗憾的。

## 瑞 士

永久中立的瑞士对苏台德问题和慕尼黑会议的看法,自然跟英、法和德、意不同。在慕尼黑会议的前夕,对战争危机的感觉,在如何看待慕尼黑形式的缓和以及在批判英法的“绥靖政策”等等方面,瑞士这个国家也都跟其他国家大不相同。

瑞士人有一种强烈的意识,在他们看来“只有瑞士才是‘欧洲民主主义的老牌国家’”。因此,他们对威胁欧洲民主主义的法西斯主义自然是抱有强烈反感的。这一反感,同样地也是跟寄予“欧洲民主主义”标兵——捷克斯洛伐克以深厚的亲近感联

系在一起的。慕尼黑会议以后，瑞士人的这种心情，在国内的气氛中已明显地反映出来。比如：向希特勒提出警告：“这是最后！不许再跨越雷池一步”的《新文化》主编写的那篇勇敢的社论，就是代表这一心情的。另一方面，瑞士的舆论对张伯伦的“绥靖政策”也抨击得相当猛烈。难道没有办法击退希特勒的威胁吗？英、法领导人是不是为此而作了充分的努力？在同希特勒最后摊牌时他们是不是鼓足了勇气？如此等等。在这方面，瑞士的舆论都对英法进行了严厉的追究。

就这样，在舆论上出现的那种批判态度，也在社会的气氛中反映出来。慕尼黑会议以后，过了一个星期的某一夜晚，我在日内瓦的一家夜总会里，痛饮了一番。当时的节目单中有过这样一出戏：

在昏暗的舞台上，灯光忽然亮了起来，有一个男演员站立在那里，他戴着礼帽，右手拿着一把黑阳伞，左手捏着一张白纸，面孔的样子活象一个张伯伦。

他亮相以后，不一会就打开黑阳伞，这时候灯光朝着伞的方向转动，伞上出现了“张伯伦”几个字。接着，“张伯伦”便用他那嘶哑的嗓子唱了起来。

随同曲调一起，灯光又转向左手挥动的那张白纸上，随后又作出希特勒的模样。

他唱的歌词内容大体如下：

希特勒是个好小子，  
调皮捣蛋，吵吵闹闹，  
要制服他，虽得花很大气力，  
然而，他却能派用场：  
他严密地守卫着欧洲的花园，  
一步也不让东方的大熊跨进！

希特勒是个好小子，

所以我喜欢他！

喜欢柏林！！

喜欢希特勒住的城市——柏林!!!

另外，这时候在商店里，还出售一种用纸折叠成形的东西。这种东西很简单，一般只是把它折成猪形。但是此刻出售的却和往常不同，做工精巧微妙，只要把这张折折叠叠的纸头一伸展开，猪的形状就不见了，接着出现在眼前的便是希特勒的面孔。在欧洲“猪”这个词，是指向“卑鄙的人”的，在这一意义上讲，它已作为欧洲的共同语言来使用。瑞士人就是把这种纸叠的东西悄悄地放在口袋里，一遇到朋友便连忙掏出来，从猪到希特勒，反过来再从希特勒到猪，变来变去做给朋友看，叫朋友发笑。从这种儿童游戏的动作中，可以看出他们反纳粹的心情。

有关张伯伦的这出戏是嘲笑英国的肮脏外交；猪——希特勒的折纸是蔑视纳粹的野蛮。尽管这都是玩笑性的，但这里已洋溢出那种健康的民主精神。

## 苏 联

慕尼黑协定，与其说是英法的让步，宁可说是向希特勒屈服。在导致希特勒恫吓外交胜利的这一协定中，受到巨大打击的另一个国家就是苏联。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纳粹一步一步地冲破了凡尔赛条约的约束；意大利侵略了埃塞俄比亚；在打倒西班牙共和制度方面，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合作，等等，针对这股忽然抬头的法西斯攻势，作为同英法联合起来继续谋求加强集体安全保障体制的斯大林来说，慕尼黑协定确实是对苏联的一个很大打击。捷克

斯洛伐克是苏联的同盟国，然而在决定捷克斯洛伐克命运的重要协商中，苏联却完全被排除在外。

而且，签订慕尼黑协定的结果，明摆着希特勒是要把捷克斯洛伐克纳入德国的势力之下的。这意味着德国的军事压力已朝着东方即朝着苏联方向靠近了一大步。希特勒的扩张政策是以乌克兰为目标的，这一点在他写的《我的奋斗》一书中，已用“向东方挺进”的这句话，公开地宣布出来。苏联对英、法无偿地把捷克斯洛伐克送给德国，当然感到很大疑虑。斯大林所以怀有疑心并指出“张伯伦企图把希特勒的进攻引向东方”，也是不足为奇的。慕尼黑会议一个月以后，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满不在乎地说：“允许德国进入中欧是既定下来的，是正常的而且是当然的。”

张伯伦虽未说出“与你无关”，但却以这样的态度把斯大林拒之于门外，不让斯大林参加对苏联来讲具有切身利益的重要会议。而达拉第出卖了同盟国，则装做若无其事。至于斯大林的看法，他认为“英法不会白白地把捷克斯洛伐克送给德国”，所以对英、法的怀疑越来越加深。

慕尼黑协定带来了许多后来左右欧洲局势的重要因素。概括起来有两点，一是希特勒的判断。他认定“英法这些蛆虫，根本不想打仗”；二是斯大林的头脑中已明确地出现了一种想法，这就是“要使希特勒掉转锋芒，就必须想个什么办法”。

一九三八年中秋时分，在斯大林头脑中出现的这一想法，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成熟起来，直到签订震撼世界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为止，足足花了十个月的时间。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一月东京岩波书店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一书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史组译）

# 我的离国出走

〔捷〕E·贝奈斯

编者按：E·贝奈斯，慕尼黑时期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本文是他所写的回忆录的一部分。

在签订慕尼黑协定后的次日，即一九三八年十月一日，戈林元帅正式通知捷克斯洛伐克驻柏林大使V·玛斯特尼博士说，德国不能容忍我继续担任共和国总统。同时暗示，如果我不立即辞职，德国在执行慕尼黑协定时，将对捷克斯洛伐克无情刁难。

柏林外交部国务秘书威兹萨克也对我们外交部部长A·海德利奇发出了同样的通知。我们派往柏林参加讨论慕尼黑协定执行事宜的代表团的几个成员也将同一消息报告给我。与此同时，通过非官方的渠道，我在布拉格也受到同样的威胁，而雅洛斯拉夫·普雷斯博士从柏林回到布拉格时也带给了我同一信息。

事情还不仅如此。

还应补充一句，九月二十六日在柏林体育宫，希特勒本人曾对我进行了粗暴和冷酷的攻击，他宣布我是他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并直截了当地说，他和我之间是一场生死斗争，他总算说了一句老实话。

这一切使我感到非出走不可。这样做是符合国家利益的，但它也表达了我对新出现的局面的个人看法，也是对那些搞出

慕尼黑“绥靖”的西欧国家的明确抗议。此外，我已经发觉国内的风向有了变化。

因此，在十月五日，我给早已由我指定的新政府一封宣布辞职的信。然后，我在一次广播演说中向捷克斯洛伐克人民道别，象形势所要求的那样，我讲得字斟句酌，心平气和，但是从战后远景来看，我的话都为此后的事态所证实。我要求我的同胞抑制他们的感情，置降临到我们头上的祸事于度外，不要非难和谴责别国，以避免内部的争吵，并对我们神圣事业的正义性不要丧失自信和信念。我指出慕尼黑不过是开个头，别的事还会接踵而至。我将对我的原则和民主制度保持忠诚，并且，在任何地方我都将为祖国工作。在当时，也许我的听众中间只有少数人听懂了我的话。我再一次想到“我的计划”和迫近战争。

当我于十月六日午后不久告别我的家人，从布拉格迁往波希米亚南部的谢济莫沃河口的时候，我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已极度疲劳，心里有一种难以描述的感情，沉痛地思考着使欧洲颤栗并且也许会使它完全崩溃的可怕的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巨变。我在那里企图从去年和特别是早几个月所受到的沉重打击中恢复过来。

为了有时间准备我未来的计划，我打算在我的祖国再呆上几个星期，至少呆到十月二十八日（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日——译者）。在那以后，我打算到瑞士或英国，再转道上美国去。在那里，由于我的美国朋友们的推荐，我已接受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之职。但是，布拉格和柏林间的紧张状态在继续着。柏林政府通知布拉格说，只要我留在国内，它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就只具有临时性质；而布拉格政府被来自柏林的新的威胁吓怕了，好几次通过斯契施尔博士送信到谢济莫沃河口，要求我一安排停当就离国出走。与此同时，从伦敦回来的我的外甥博胡希·

贝奈斯带来我的朋友们的迫切的敦促和警告,要求我尽快出国。就这样,尽管我还远远没有康复,我决定提前到十月二十二日赴伦敦,我的主要理由是避免加重政府的困境。

在慕尼黑以后,捷克斯洛伐克政局的发展是众所周知的。我应独自一人对慕尼黑及其一切后果承担责任,最严厉的谴责和最粗暴的攻击都是针对我而来的。要把一切责任推在那个关键时刻站在最高位置上的人身上是轻而易举的。那个人因而也是万死不能辞其咎的!我从开始起就告诉自己,现在不是讨论这种事情的时候,也不是追究真正的罪魁祸首或者为已发生的事情争吵的时候。因此,我沉默地承担了这个责任,并告诉我自己,在事态的进展使得有可能作出解释以前,我必须坚定地和耐心地承担它。因此,我没有抗议,没有申辩,也没有抱怨国内或国外的任何人,我甚至没有批评采取了自杀政策的法国或者英国,波兰或者南斯拉夫。

(摘译自一九五四年美国出版的《E·贝奈斯回忆录》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史组译)

## 张伯伦对慕尼黑协定的辩护

〔英〕R·G·D·拉芬

V·M·托因比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晚至三十日凌晨，在慕尼黑签订的那份被看成为制止专横侵略的协定，是由张伯伦亲手经办的。因此，他对这件事所作的辩护是最有权威的。

张伯伦十月三日在下院说，希特勒、墨索里尼、达拉第和他本人在慕尼黑聚会，是为了审查把苏台德区转让给德国的方法、条件和时间。而他与达拉第想要达到的目标是用一种有秩序的方法来取代暴力的方法以实现一项一致赞同的决定，以减少人们因转让领土而遭受的苦难；而要判断他们是否已有成效地实现这些目标，将取决于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三日的戈德斯贝格备忘录和慕尼黑协定两者之间的差别。

张伯伦断言，戈德斯贝格备忘录实际上是一份最后通牒，只不过说明了德国的要求；而慕尼黑协定则阐述了英法两国九月十九日提出的有关四个协商国所负责任和置于国际监督之下的建议的适用条件。

在这里有两点。第一，四大国所达成的协定取代了德国的要求。从形式上看，这当然是真实的。希特勒的要求在四大国的会议上被通过了。需要考虑的问题是：经过这番过程，是否在实质上改变了那些要求。第二，领土的转让应该受国际的监督。张伯伦十分强调在慕尼黑会上授与国际委员会以广泛的权力。

但是，这个国际委员会是如何组成的呢？说也奇怪，在报上和其他地方刊登的慕尼黑协定的许多文本，都删去了“国际委员会组成”这一节。鉴于慕尼黑协定的性质决定于这个机构对协定的实施，整个文件必须根据这一节来加以考虑。这一节内容如下：

出席这次会议的四国政府首脑同意他们于本日签订的协定所规定的国际委员会应由德国外交部长、英国、法国和意大利驻柏林大使和由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指派的一名代表组成。

这样，解释和应用一个用词含糊、包括着模棱两可词句的文件这一十分重要的工作，被交给了由五个人所组成的机构去办了，其中，三个人是驻柏林大使，他们必然比他们的大多数同胞更多地受德国人观点的影响，因为他们在德国人主持下开会，而且在德国外交部召开，那里有着大量的德国文献资料。在一些特殊问题上，英国大使内维尔·汉德森爵士和法国大使安德烈·弗朗索瓦-蓬塞先生得到指示，要他们尽力达成一项有利于捷克人的解决办法，但是，当他们得知他们的政府不准备重新面临一场被慕尼黑协定已结束了的危机时，他们对贯彻这些指示就受到了限制。正如参加国际委员会的一位英国代表团成员所写的：“一旦在暴力威胁下进行协商的原则接受了，那就很难于找到一个有可能站得住脚的地位。”确实如此，里普卡博士写道，三位大使中，只有意大利大使阿托利科对捷克代表的论点表示同情。希特勒可以放心地把慕尼黑协定交给这样一个机构去解释。这个国际委员会只会有助于表达德国人对协定的观点。

其次，张伯伦谈到德国的占领日期。戈德斯贝格备忘录要求在十月一日以前即在八天之内军事占领苏台德区，直到由德国划定的界线为止。张伯伦说，慕尼黑协定规定从十月一日到十日分五个明确规定的阶段分期占领。

由于协定是在九月三十日凌晨签订的，它对第一区的占领在通知后给予一天时间而对第四区的占领给予六天时间。至于比其他四个区加起来还要大一些的第五区，在慕尼黑未作规定。十月五日由出席慕尼黑的四国代表作了规定，并于十月六日为国际委员会所接受。因此，对捷克居民要撤出的大部分领土来说，居民在接到通知后最多不过五天时间就要撤出，这事实上甚至比戈德斯贝格备忘录所容许的时间还少。实际上，德国军队在十月八日就开始进入第五区，因而住在这个地区某些部分的不幸居民在接到警告后不到三天时间就要撤出。

第三点是，德国占领线的确定是由国际委员会决定的。但事实上，正如我们刚才看到的，决议并不是由有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参加的国际委员会而是由慕尼黑的四大国作出的。张伯伦认为，国际委员会发觉“日耳曼人占多数”的地区比戈德斯贝格备忘录所要求的要小些。他说，戈德斯贝格备忘录要求的那条线所包括的某些地区，不能被称为日耳曼人占多数的地区。他没有说明他根据什么证据而得出这个结论的。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国际委员会采纳的那条线同戈德斯贝格线差别很小，而且基本上是有利于德国的。

张伯伦的第四点是关于公民投票区的划界问题。在戈德斯贝格备忘录中，希特勒所提出的分界线划在捷克斯洛伐克一边的公民投票区是明确的，而划在德国一边的线是不明确的。根据慕尼黑协定，所有公民投票区都要由国际委员会作出规定。

这一说明看上去很不错。但这并不令人信服。在下院辩论过程中，反对党发言人道尔顿问道，公民投票区这条线的两边是否都按日耳曼人占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标准去划，还是只在这条线的捷克一边这样划。内政大臣回答他说，“公民投票打算在两方面都按这样的标准做。”十分明显，那是英国政府的观点。国际

委员会是否同意要等着看了。

张伯伦提到的第五点是，戈德斯贝格备忘录规定，公民投票区由德国军队和捷克军队在分界线的各自一方占领，直到公民投票的时候为止，并规定在公民投票期间撤退；而慕尼黑协定则规定，公民投票区应该立即由国际机构占领。

但是，在他讲话时，差不多三天已经过去了，还没有一支国际部队来占领。确实，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公民投票区还有待国际委员会来确定界限，而由于国际委员会本身要决定那些区是“日耳曼人占多数的”，这就使公民投票变为多余的事了。

张伯伦的第六点也同公民投票有关。戈德斯贝格备忘录没有说明在哪些地区内公民投票将是有决定性的。它只说，所有合格的投票人的简单多数将在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作出决定。由于戈德斯贝格线捷克一边的选举区的居民比那条线的德国一边的居民要少得多，捷克人自然感到惊慌，唯恐整个公民投票区将包括分界线德国一边人口密集的地区，并对整个地区作出单一的决定。张伯伦指出，慕尼黑协定采取了萨尔区公民投票的规定，也就是说，应按行政区或地区来投票。

在这里，慕尼黑协定对戈德斯贝格备忘录作了明确的改进；但只是假定在分界线德国一边的某些选举区属于公民投票的范围才是这样的。要不然捷克人也许可能失去在分界线他们这边的少数几个地区，而没有可能以那一边的任何领土作为补偿。如这一假定不存在，那么这种改进的价值也就不存在了。

张伯伦的第七点稍微有些令人满意。他指出，慕尼黑协定没有禁止从苏台德区搬走食物、家畜和原料。

戈德斯贝格备忘录的附件曾坚持，在捷克人应撤走的地区必须无损坏地交出一切“军事的、商业的、交通的设施(工厂)，包括航空事业的地面机构和所有无线电台；所有商业的和交通的

物资,特别是铁路系统的车辆……所有公用事业(煤气厂、发电站等)”。这同慕尼黑协定并没有什么差别。它只是更为含糊而已。协定规定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有责任在不损害任何“现有设施”的情况下实行撤退;它把有关撤退的条件交给国际委员会去详细规定。显然,“设施”这个名词用起来是方便的,而且会被德国所控制的国际委员会利用来掩盖戈德斯贝格备忘录中较为明确的条款。捷克斯洛伐克人将失去他们花了很多钱的、精心建造的和强大的防御工事体系以及他们的矿山、工厂和铁路。但是,慕尼黑协定至少有这点改进,即它没有象戈德斯贝格备忘录所规定的那样,规定“不许把食物、货物、家畜、原料等”搬走。那些被纳粹德国的先遣部队吓得逃出来的不幸难民,如果在不违犯国际协定的条款下,可以用卡车或货车运走一些行李,然后赶快离开,或者至少可以用童车或手推车运走少许财产。大多数难民是非纳粹日耳曼人、犹太人和那些自己知道被纳粹列入迫害名单的捷克人。但是这种可以把动产搬走的规定,确实也使那些可以暂时安全地留在苏台德区、并希望在危机过后有秩序地离开的捷克人减轻了一些痛苦。

张伯伦在他的第八点中声称,慕尼黑协定包括了在戈德斯贝格备忘录中根本找不到的一些规定。这些是关于迁入或迁出被割让的领土的选择权利,并为便利这种迁移而设立一个德捷委员会。

他进一步指出,慕尼黑协定给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四个星期的时间,去遣返在他们军队或警察中服役的苏台德日耳曼人,而不是立即把他们免职;并在同样的时间内释放苏台德日耳曼人的政治犯。

他为慕尼黑协定辩护的第九点和最后一点是最没有说服力的一点。这是关系到保证的问题。张伯伦强调,英法对无端入

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新边界提供了保证，德国答应在波兰和匈牙利的少数民族问题解决时也给予保证，以及由有关政府在三个月内进行直接谈判或再召开一次四大国会议来解决那个问题的规定。

把戈德斯贝格备忘录和慕尼黑协定的条款加以详细对照，显示出前者是赤裸裸的侵略，而后者所包含的国际程序的规定则用一些模棱两可的措辞作为外衣把它薄薄地掩盖起来了。慕尼黑协定的总的后果是把戈德斯贝格备忘录上所规定的条款予以认可。和平已经得救了，因为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只要求德国通过国际协商来实现它的要求，而不是在任何主要要求上作出让步。丘吉尔在张伯伦的演说之后讲了话，他用简单而有力的比喻，把德国人比作一个武装的强盗，他要求一英镑，给了他以后，又要求两英镑，最后同意接受一英镑十七先令六便士，余下部分算是友好关系而答应不要了。

在慕尼黑达成的协议，确实只不过暗示一场山雨欲来的战争暂时避免了，这场战争曾威胁着整个夏天，而且在九月已经打起来了。从暗示威胁的斗争和兵力的考虑中，西方大国显示出面临耻辱和不祥之兆。捷克斯洛伐克突然被暴力肢解了，这使西方世界大为震惊。“捷克斯洛伐克默默地、伤心地、被人遗弃了，被粉碎了，陷入黑暗之中。”丘吉尔的话普遍地被认为表达了真实情况。在慕尼黑的条文中，根本没有说到补偿捷克斯洛伐克人在被割让领土上的公共财产或岁入损失。它们没有规定，德国人应承担捷克斯洛伐克任何一部分公共债务。它们没有规定对从苏台德区逃出来的那些宁愿失去生计而不愿失去自由的那些人给予赔偿。至于对那些可以利用他们自己选择权的人的赔偿问题，则交给德捷委员会去处理。没有人怀疑，最需要选择权的那些人，是犹太人和反纳粹日耳曼人，他们是不会有什么机

会得到补偿的。在十月的头几天，从被割让的领土上惊慌逃亡的悲惨描绘传到了英国和法国。同时，传来消息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已正式禁止被割让领土上的居民移居到内地，并提出要送回难民的打算。十月一日苏台德德国人党的领导人亨莱因被任命为德国苏台德区长官。十月七日，他在一次广播演说中宣布，在苏台德日耳曼人中的政治反对派不值得怜悯，也不会得到怜悯。“我们要把他们关起来，直到把他们搞臭为止。凡是逃出去的和后来回来的，都要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英国舆论是如此激动，伦敦市长为此筹设一笔救济难民的基金，并亲自飞往布拉格安排让尽量多的难民得到临时安置，直到能作出安排让他们移居西方世界为止。西方的舆论也大大地由于想到被绑架和逮捕而落入德国人手中的捷克人而感到困惑。对这些人在慕尼黑没有作出同释放德国政治犯相对应的规定。英国和法国驻柏林大使奉命为释放他们施加压力，但对这种压力是否会得到成功并不抱有什么希望。

西方大国以捷克斯洛伐克人为代价而获得的具有这些特点的和平，使西方舆论界感到苦恼。在英国，人们普遍地感到，张伯伦在十月三日宣布的由英国给与捷克斯洛伐克一千万英镑的贷款是完全不够的，应以相当大的一笔无偿赠与加以补充。

在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他们凭良心认为向德国投降是合理的，不管他们对蛮横的解决办法感到多么遗憾。在他们看来，麻烦的根子在于一九一九年强行把苏台德日耳曼人合并到捷克斯洛伐克，还在于建立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小国以代替较为宽容的哈普斯堡君主制的整个过程。由于那个君主制似乎早已为人们所忘却，和平的唯一办法看来只能是尽可能使少数民族分布到他们的民族国家里去，甚至牺牲一个捷克斯洛伐克也可以，尽管捷克斯洛伐克远不如某些别的国家那样压迫它的少

数民族。

由于不能保护朋友免受残酷虐待所造成的耻辱，只能勉强承认把苏台德区合并到德国，这对将来必然预示着不祥之兆。在战争威胁下，德国已在欧洲大陆上取得了统治地位。整个东南欧处于它的威胁之下，现在一个具有现代化武装部队、防御工事和军火工业的多瑙河国家已变得毫无力量了。而事实上，能否使捷克斯洛伐克作为一个独立实体存在下去呢，或象丘吉尔预见的那样，它是否会在几个月内“被纳粹制度所吞没”呢？在后一种情况下，中欧的统一将在德国的控制下实现；在这以后，整个欧洲大陆将由德国人来支配了。西方大国确实“遭到了完完全全的不折不扣的失败”。

（摘译自一九五三年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的《国际事务概览》 殷国柱译）

# 黑暗后的光明

——在下院的讲话

〔英〕内维尔·张伯伦

**编者按：**本文是慕尼黑会议前一天，张伯伦在英国下院的一次演说。张伯伦详细地回顾了召开慕尼黑会议的背景，阿Q式地自诩为“我的访问（指求见希特勒——编者）避免了一场一切都已准备好的侵略”，争得了“我们时代的和平”；但是，却也自我暴露了对希特勒卑躬曲膝的丑态以及欺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的卑劣行径。

我们在（一九三八年）七月不得不面对的形势是，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和苏台德日耳曼人之间一直在进行的谈判出现了僵局，大家早在担心如果这种僵局不很快打破，德国政府也许不久就要干涉这个争端。就英王陛下政府来说，有着三种我们可能采取的不同方针。我们既可以用同德国开战相威胁，如果它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话，我们也可以站在一边静待事态自己发展，最后我们还可以试图用调解的方式获得和平解决。我们拒绝了第一种方针。我们对捷克斯洛伐克没有条约责任。我们历来拒绝接受任何这样的责任。

第二种可供选择的方针，对我们来说也是不行的。不管这

块土地离我们多么遥远，我们当然知道，星星之火一旦点燃，就有可能引起一场大火。我们认为，我们的责任是尽我们的一切力量去帮助争议双方获得协议。我们致力于第三种方针，即调解的工作。我们知道，这个工作是艰巨的，也许甚至是危险的，但是我们认为这个目标是好的，值得去冒这个危险。而当朗西曼勋爵表示他愿意承担我们的使命时，我们高兴地认为我们已得到了一个调解人。他的长期经验以及坚定、机智和富有同情心的优秀品质，使我们对成功抱有最大的希望。最后，朗西曼勋爵没有成功，那不是他的错误，我们和全欧洲都必须永远对他和他的全体工作人员为了和平而进行漫长而劳累的努力表示感谢，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双方的尊敬和信任。

虽然可靠情报表明，在苏台德地区，到九月十四日秩序已完全恢复，但下院将记得，在九月十四日晚，一种非常危险的局势已经形成，存在着现在集中在边界的德国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以防止在苏台德区再次发生事件，以及捷克部队和苏台德日耳曼人之间发生战斗的紧迫危险。另一方面，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也许已感到不能不立即动员，因而冒触发一次德国侵略的危险。不论在何种情况下，德国的侵略也许被料到将引起法国为援助捷克斯洛伐克而采取行动，从而导致一场欧洲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英国很可能因支持法国而被卷入。

在那些情况下，我作出决定，认为把一项计划付诸实施的时候已经来到了，我心目中把它作为最后的手段已有相当相当长的时候了。同极权主义的政府打交道的主要困难之一，是缺乏同掌握国家最后决定权的人建立联系的任何手段。所以，我决定亲自到德国去会见希特勒先生，并在私人会谈中弄清楚，是否还有一点希望来挽救和平。我知道得很清楚，在采取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行动时，我将使自己遭到批评，理由是我降低了英国首

相的尊严；如果我不能带回一项满意的协议的话，还会引起失望，甚至可能还会引起愤怒。但是，我认为，在这样的危机中，问题是如此严重，关系到几百万人的生命，这样的个人考虑就谈不上了。

希特勒先生热情地响应了我的建议，因而在九月十五日，我第一次飞往慕尼黑。从那里我乘火车到贝希特斯加登的希特勒先生的山区别墅。我承认，在这次冒险活动中，我对每到一地所受到的热情欢迎感到惊奇，但是，现在它所带来的宽慰心情表明，当时局势被看得何等严重。第一次会谈长达三个小时，除了希特勒先生和我本人之外，只有一位译员在场。当时我很快就发觉，情况比我所认识到的要严重得多和紧迫得多。希特勒先生以有礼貌和完全明确的措辞，讲清楚他已下定决心，苏台德日耳曼人必须有民族自决的权利；如果他们愿意的话，还必须有重归德国的权利。他说，如果他们不能用自己的力量来达到这一目的，他将帮助他们这样做。并且，他明确地宣布，他宁可准备冒一场世界战争的危险，也比等待好。他又一次抱怨英国对他施加威胁。对此，我回答说，他必须区别威胁和警告。当时事实上存在可能发生突然事件的情况，他可能因此有正当理由来埋怨。我请他认真地想一想，英国无论如何是不会同德国开战的。

我得到的印象是如此强烈，这位总理正在打算立即侵略捷克斯洛伐克。我问他，为什么要我长途跋涉？因为，显然是在浪费我的时间。对此，他回答说，如果我能在那时那地向他保证英国政府接受民族自决的原则，他就非常乐意讨论把它付诸实施的方式方法；但是，如果相反地我告诉他这样的一条原则不能为英国政府所考虑，那末，他同意我们之间就无需再继续会谈了。当然，我不能在那时那地作出这样的保证，但是我保证立刻回去和我的同僚们商量，如果他能在这段时间避免采取敌对行动。他

给了我那种保证，并说，只要捷克斯洛伐克不迫使他动手。从那时以来，这个保证一直具有约束力。现在我回顾一下，一点也没有什么怀疑，全靠我的访问避免了一场一切都已准备好的侵略。在我看来，这是很显然的，由于德国军队当时所占有的地位，任何人都不能有效地防止那场侵略，除非给苏台德日耳曼人以民族自决权，而且要快快给他们。这是和平解决的唯一希望。

第二天我回到伦敦。当晚，内阁开了会。朗西曼勋爵出席会议，他是应我的要求，在同一天从布拉格赶回来的。朗西曼勋爵告诉我们，虽然在他看来，布拉格最后谈判破裂的责任归咎于苏台德的极端分子，不过，从最近的事态发展来看，对日耳曼居民占大多数的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国边界地区，应当立即给予民族自决的全部权利。他认为，土地的割让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认为应该迅速执行。和平转让的措施可以在两个政府之间作出安排。然而，德国人和捷克人还得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许多地区住在一起。并且，朗西曼勋爵认为，在那些地区里应当根据第四次计划的方针，为地方自治找到一个基础。这个第四次计划已由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于本月七日发表了。另外，他认为，只有当捷克斯洛伐克的内外政策致力于使它能和它的所有邻国和平相处，它的领土完整和安全才能保持下去。为此目的，按他的看法，它的政策应当完全中立，正如瑞士的情况一样。这就要求捷克斯洛伐克保证，在任何情况下，它也不会进攻它的任何邻国；同时，这也意味着欧洲主要大国共同保证反对侵略。

当然，英王陛下政府认为，在他们答复希特勒先生之前，有必要同法国政府商讨，因此，达拉第先生和庞纳先生被邀飞到伦敦，于九月十八日同英国大臣们进行会谈。也许我可以读一下会谈以后发表的公报，其内容如下：

“在全面讨论当前国际局势以后，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的代表对于为了促进和平解决捷克问题而采取的政策，意见完全一致。两国政府希望今后将有可能为了欧洲和平的利益而考虑一项更普遍的解决办法。”

在会谈期间，两国政府的代表以希望找到一项不导致一场欧洲战争的解决办法为指导，这种解决办法因此也不会迫使法国根据它所承担的责任采取行动。大家同意，达到这个目的的唯一手段是接受民族自治的原则。因此，英国和法国驻布拉格的公使奉命通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疆界以内，让主要由日耳曼人居住的地区再继续存在下去，不能不危及捷克斯洛伐克本身的利益及欧洲的和平。因此，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被劝告必须立即同意：把苏台德居民超过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所有地区直接转让给德国。一个国际组织准备成立起来，去研究如调整边界和在有选择权的基础上进行可能的人口交换等问题。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被告知，为了满足他们对未来的安全的正常要求，英王陛下政府准备参加一项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新的边界不遭受无端侵略的国际保证，把它作为对欧洲实现和平的一个贡献。这样一项保证可以维护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因为它用一项不遭受无端侵略的一般保证以代替现存的同法国和苏俄相互承担军事责任的条约。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于九月二十日对这些建议作了答复，提出苏台德争端应当根据一九二六年德捷仲裁条约的条款提交仲裁。然而，英国和法国驻布拉格公使奉命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指出，在这一基础上没有和平解决希望，而为了捷克斯洛伐克和欧洲和平的利益，力劝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立即接受英法建议。这一点，他们于九月二十一日立即并无条件地做到了。英王陛

下驻布拉格公使于九月二十二日奉命通知贝奈斯博士说，英王陛下政府深切地意识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所同意作出的巨大牺牲，和他们所显示的热心公益的伟大精神。把这些建议提出来当然是为了希望防止一场普遍的灾难和使捷克斯洛伐克免遭侵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毅然作出如此重大的让步，使英王陛下政府确信获得了任何别的事情都不能引起的那种程度的同情心。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于九月二十二日辞职，接着，立即成立了一个以陆军监察长西洛维将军为首的举国一致的政府，他们在布拉格强调说，这个政府不是军人专政，并已接受英法建议。我们曾希望，苏台德日耳曼人的紧迫问题，不会因匈牙利和波兰少数民族坚持要求而在这个特殊的时候变得进一步复杂化。然而，这些少数民族曾一贯地要求象给予苏台德少数民族那样的相同待遇。他们要求在转让苏台德日耳曼人占多数的领土的英法建议被接受后，就由匈牙利和波兰政府提出割让波兰和匈牙利少数民族居民占多数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土的相同要求。匈牙利驻伦敦公使和波兰驻伦敦大使于九月十九日和二十日向英王陛下政府提出了这方面的要求。九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这些要求又在布拉格提了出来。英王陛下政府已注意到这些要求，并答复说，他们目前正集中全力于苏台德问题，而欧洲的和平和战争问题取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他们充分理解匈牙利和波兰政府对他们各自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少数民族的关心，但是希望他们在目前微妙的情况下不要做扩大当前危机的事。波兰政府对这一答复颇为不满，并且强调波兰的要求必须从速解决。军队已在迪钦一带调动，值得重视的民众情绪已在波兰出现。由于匈牙利摄政于九月二十日到罗明坦访问陆军元帅戈林，以及首相、外交大臣和总参谋长于九月二十一日到贝希特斯加登访问，这使

匈牙利政府受到了怂恿。他们采取了动员措施，使匈牙利陆军力量增加了一倍。

鉴于事态的发展，为苏台德日耳曼人问题找到一个解决办法的任务就更加进一步复杂化了。然而，我于二十二日回到德国来因河边的戈德斯贝格，在那里，德国总理已指定了一个会晤地点，这对我来说，比遥远的贝希特斯加登要方便得多了。当我一路经过街道和乡村时，再一次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向我表示德国人民对和平的要求。当天下午，我同总理进行了我们的第二次会晤。当我逗留在伦敦期间，英王陛下政府已同法国政府一起为实施建议中的领土转让和划定最后的边界作好了安排。我就这些问题向希特勒先生作了说明，并且还把关于建议中的使捷克斯洛伐克不遭受无端侵略的保证告诉了他。

在保证这一点上，他没有表示反对，但是说他不能参加这样一项保证，除非其他大国包括意大利在内也是保证国。我说，我并没有要求他参加一项保证，但是，我却想问他是否准备同新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缔结一项互不侵犯条约。他说，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他少数民族仍然感到不满时，他不能参加这样一项条约。但是，尊敬的议员先生们将看到，他自此以后就以更加积极的形式表达了他的看法，并且说，当他们感到满意时，他就会准备参加一项国际保证。然而，在这个独特的时候，我们之间对保证这个主题没有作进一步的讨论。希特勒先生说，他不能接受我向他提出的其他建议，理由是这些建议太拖拉，并且给捷克人一方今后推诿责任的机会太多了。他坚持认为，鉴于苏台德日耳曼人所受到的压迫和恐怖行为，迅速解决是必不可少的。接着，他向我提出了建议的主要内容，这些他后来都包括在一份备忘录中——只是在这次会谈中，他实际上没有提出时限。

尊敬的议员先生们将意识到，我在面临这种完全出乎意料

的情况下所处的困境。我在贝希特斯加登曾被告知，如果我接受了民族自决的原则，希特勒先生愿意同我讨论实施这项原则的方式和方法。他后来告诉我，他一刻也没有想到我竟然能回去，并且说接受了这项原则。我并不希望尊敬的议员先生们认为他是在蓄意欺骗我。对此，我一刻也没有如此想过。但是，在我这方面，我期待着当我回到戈德斯贝格时，我只需要同他悄悄地讨论我所带去的那些建议就行了。可是，当会谈一开始，我就被告知这些建议是不能接受的，而且它们要被另一些我所完全意想不到的建议所代替，这使我大为震惊。

我觉得我必须有一点时间来考虑一下我怎样去做。因此，我退出了会谈，我的心里对胜利地完成我的使命充满了不祥的预兆。然而，我首先从希特勒先生那里得到了他以前所作的保证的一个补充，即在谈判未获得结果以前，他不会出动他的军队。在我这方面，我着手向捷克政府呼吁，要他们避免也许可以触发事件的任何行动。

我们为第二天上午十一时半恢复会谈作好了安排，但是，鉴于要通过译员谈话所存在的困难，以及对希特勒先生所讲的话是否始终为他完全了解和赞赏这件事，我感到没有把握，所以，我认为聪明些还是把我对他的新建议的一些意见写成书面的东西，以便在会谈开始之前，让他有时间看到。因此，我写了一封信给他，这就是白皮书中的第三号文件。我在早餐后不久发出了那封信。大家可以看到，我在信里声明我准备把这些建议转告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但是我指出，在我看来，要他们接受是极其困难的。总理在接到这封信后，表示他愿意书面作出答复。因此，会谈被推迟了。他的复信一直到傍晚才收到。

我曾希望这次推迟也许意味着正在作出一些修改，但是，当我收到复信（即第四号文件）时，我感到大失所望，虽然信里作

了一些说明，但是对上一个晚上他向我谈的那些建议没有作什么修改。因此，我写了复信（第五号文件），要求给一份关于这些建议的备忘录和一份地图复本，以便转交给布拉格，并且暗示我打算返回英国。备忘录和地图是在我同这位总理最后一次会晤时交给我的，这次会晤从当晚十点半开始，一直进行到次日凌晨二、三点钟，德国外交部长以及内维尔·汉德森爵士和霍勒斯·威尔逊爵士都出席了；我第一次发现在这份备忘录中规定了时限。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话说得非常坦率。我竭力强调指出，坚持这样的条件可能产生的危险以及战争的可怕后果。我宣称，这个文件与其说是备忘录，还不如说是一份最后通牒，它的措辞和语气必将使中立国的公众舆论大为震动，我严厉地责备这位总理对我为争取和平所作的努力没有作出任何反应。尽管说了这些坦率的话，这次会谈还是在比以前更为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下去。希特勒先生对我说，他对我的努力表示赞赏和感谢，但是，他认为他已经作出了反应，因为他已取消了他曾计划好的行动，并且，在他给捷克斯洛伐克的建议中提出的那条边界，同军事征服后他将提出的边界是大不相同的。

我认为我应当补充一点，在我向希特勒先生告别之前，曾同他私下说了一些话，这些话我并不认为是不重要的。首先，他极其诚恳地向我重申了他在贝希特斯加登说过的话，即这是他在欧洲对领土的最后一点奢望了。他不希望把日耳曼以外的民族包括在德国范围内。其次，他再一次非常诚恳地说，他愿同英国友好，只要苏台德问题能够在和好的情况下得到解决，他愿意高兴地恢复会谈。他确实说过：“有一个棘手问题，那就是殖民地”。〔议员们喊：“西班牙”。〕（笑声）我真的认为，在象目前这样一个时刻，没有什么问题值得好笑。这些话从长远来看是重要的，是应当充分加以重视的。他说：“有一个棘手问题，那就是殖民地，

但这不是一个战争问题。”接着提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动员，这是在我们会谈中间向我们宣布的，这件事引起了一些干扰，关于殖民地的问题，他说，“将不存在动员的问题。”

我现在可以简单扼要地重述一下这份备忘录的内容。备忘录建议把地图上深色的那部分地区立即从捷克斯洛伐克分离出来。这些地区包括所有苏台德日耳曼人占人口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地区以及另外某些地区。到十月一日，捷克士兵和军官必须全部从这些地区撤出，并由德国军队占领。在十一月间举行一次公民投票，然后根据投票结果，由一个德捷委员会或一个国际委员会来确定一条明确的边界；这就是说，边界将要按照在这一边或那一边的居民是日耳曼人还是捷克人占大多数加以改变。此外，涂有绿色的某些其他地区将成为公民投票的对象，但这些地区将仍由捷克军队占领。在公民投票期间，德、捷双方军队都要从有争议的地区撤出，所有进一步的细节则由一个德捷联合委员会来予以解决。

我于九月二十四日返回伦敦，并作好安排，把德国的备忘录和地图直接送交捷克政府，他们当天傍晚就收到了。在二十五日，星期日，我们从驻这里的捷克公使马萨克先生那里收到捷克政府的复信，信里声明他们认为希特勒先生的要求在目前形式下是绝对地和无条件地不能接受的。我们把这封复信交给了法国的达拉第先生和庞纳先生，他们是在同一天晚上到达，来同我们交换对局势的看法。第二天上午，会谈继续进行，当时他们告知我们，如果捷克斯洛伐克被进攻，法国就要履行它的协定义务，我们在回答中告诉他们，如果由于这些条约义务使法国军队同德国发生了实际的敌对行动，我们当然认为有责任支持他们。

与此同时，作为维护和平的最后努力，我派霍勒斯·威尔逊爵士于二十六日前往柏林，他带去了我给希特勒先生的一封私

人信件，这封信要在当天晚上八点希特勒先生在柏林发表演讲之前送到。法国的内阁阁员们完全赞同这种主动精神，并为此目的在中午发表了一份公报。霍勒斯·威尔逊爵士从我那里随身带去一封信（白皮书中的第九号文件），信中指出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和全世界公众舆论对德国的备忘录的欢迎，证实了我在戈德斯贝格向他表示的期望。因此，我进一步提出建议，希望有可能通过谈判得到解决，而不诉诸武力，这就是说，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之间应当在英国代表的参加下立即进行讨论。霍勒斯·威尔逊爵士于二十六日下午到达柏林，他把信件交给了希特勒先生，后者仔细听着，但表示他不能放弃备忘录所规定的步骤，因为他认为举行会议将导致今后无法容忍的拖延。

我应当告诉下院，我同希特勒先生的会谈以及他的每一次演说，给予我深刻印象的是他对捷克政府的诚意抱有根深蒂固的怀疑和不信任。这就是这次谈判过程中处处遇到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与此同时，我读了希特勒先生在柏林的演说，在这次演说中，正如我所说的，他对捷克政府愿意实现它们的诺言表示不信任。我随即发表了一项声明，在声明中，我代表英国政府就捷克政府向我们和法国政府所作的诺言应予执行提出了保证。但是，昨天早晨霍勒斯·威尔逊爵士在同希特勒先生继续会谈时，觉得他的观点显然仍未改变，于是按照我的指示，以明确的措辞向他重申我在几分钟以前所说的我们同法国会谈的结果：如果捷克人拒绝德国的备忘录而德国进攻捷克斯洛伐克，那末，法国政府已告知我们，他们将履行他们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义务；而如果法国军队因此而同德国发生实际的敌对行动，英国政府将认为有责任支持他们。

在十点三十分左右，我收到了希特勒先生对我托霍勒斯·

威尔逊爵士送去的那封信的复信。这封信已经印在白皮书上了。把这封信细致看一下，可以看出关于希特勒先生的意图的某些局限性，这是没有包括在备忘录中的，同时还有某些补充保证。例如，有一项明确的声明，即军队不得越过红线，他们只是维持秩序，公民将在没有外界影响下进行自由投票，并且希特勒先生将遵守选举结果，最后，一旦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问题得到解决，他将参加对捷克斯洛伐克剩余部分的国际保证。这些就其本身来说都是为使人安心的声明，因而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在我同希特勒先生建立个人接触之后，我相信当他作这项声明时，他说的话是算数的。但是，当我读他给我的信的时候，首先浮现在我脑海中的是分歧和暧昧又一次缩小到了这样一点，即如果它们不能通过谈判来解决，那真是不可想象的。我是如此强烈地感到这一点，以至我觉得非要给总理写一封最后的——最最后的——信不可。我给他的私人信件内容如下：

“读了你的来信以后，我确实认为你能够不通过战争立即得到你所一定要的一切。我准备立即亲自前来柏林同你和捷克政府的代表讨论转让的安排问题，如果你愿意的话，法国和意大利的代表也可以参加。我确信我们能在一个星期内达成协议。不管你是多么不信任布拉格政府的意图，你不能怀疑英国和法国政府有力量使诺言立即公平地和充分地被执行。正如你所知道的，我已公开声明，我们准备保证诺言的执行。我不相信由于在解决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时耽误了几天，你就愿意为发动一场毁灭文明的世界大战承担责任。”

我还有另一些事情要告诉下院。现在希特勒先生已通知我，他邀请我于明天上午在慕尼黑同他会晤。他还邀请了墨索里尼先生和达拉第先生。墨索里尼先生已接受邀请，而我可以断定达拉第先生也将接受。我毋需说出我的回答将是什么。〔一位

议员说：“感谢上帝保佑首相！”我们都是爱国者，不可能有那一位下院尊敬的议员先生不为此而心情万分激动，因为危机再一次延缓了。议长先生，我不必再多说了。我确信下院将乐于让我现在就去，并看看在这次最后的努力中我能做些什么。由于这一新的事态发展，也许下院可以认为这样做是好的，让这次辩论休会几天，到那时也许我们可以在更愉快的情况下再见面了。

\* \* \*

张伯伦先生演说结束时，当即出现了一次在威斯敏斯特难得有过的那种最激动的祝贺场面。下院全体起立向他连续欢呼了几分钟。当欢呼声平静下来时，艾德礼先生和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简短而热情地表示了他们的赞同，并希望张伯伦先生成功。

第二天早晨八点半，首相离开赫斯顿机场前往德国，在两星期内这是第三次了。在他步入飞机之前，他说：“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常常习惯于这样说，‘假如你第一次没有成功，那就努力、努力、再努力吧。’现在我正是在这样做。

“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希望我能够说象霍特斯珀在《亨利四世》中所说的话：‘离开了这荆棘般的危险，我们就得到了鲜花似的安全。’”

就在同一天，慕尼黑协定由张伯伦先生、希特勒先生、墨索里尼先生和达拉第先生这四位国际政治家谈判停当了。这项协定于九月三十日星期五凌晨两点半签署。

九月三十日星期五上午，捷克斯洛伐克接受了四大国政治家所商定的条件。张伯伦先生在回英国之前，同希特勒先生又进行了一次会谈。那天下午他离开慕尼黑机场时所发表的一项声明中提到了这次会谈，后来在飞抵赫斯顿机场后，他在麦克风里的简短讲话中又提到了这件事。

“我只想讲两件事。首先，在所有这些令人焦急的日子里，我收到了无数件来信，我妻子也如此，这些都是些支持、赞同和感谢的信件；我简直无法告诉你们那给了我多么大的鼓励。我要对英国人民这样做表示感谢。其次，我要说的是现在达成的关于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解决办法，在我看来，它只是使整个欧洲可以得到和平的更大解决办法的一个前奏。

“今天上午我同德国总理希特勒先生又举行了一次会谈。这里有一份文件，上面既有我的签名，也有他的签名。你们也许有人已经听到了它的内容，但我还是想读给你们听一听。

“‘我们，德国元首兼总理和英国首相，今天又举行了一次会议，双方一致认为英德关系问题对两国和整个欧洲来说都是最重要的问题。

“‘我们认为，昨夜签订的协定以及英德海军协定，象征着两国人民永远不再兵戎相见的愿望。

“‘我们业已决定采取协商的方法来处理有关我们两国的一切其他问题，并且我们将坚定不移地努力排除一切可能的纠纷根源，从而为保证欧洲的和平作出贡献。’”

在白金汉宫被英王接见以后，张伯伦先生驱车来到挤满欢乐人群的唐宁街。应人们再三要求，他在唐宁街十号一楼的窗口讲了话。

“我的好朋友们，这是我们历史上第二次从德国把体面的和平带回到唐宁街。”

在群众欢呼之后，隔了一些时候，首相才能继续他的讲话。

“我相信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我由衷地感谢你们。”

（摘译自一九三九年英国伦敦出版的《寻求和平》一书  
殷国柱译）

## 寻求和平

〔英〕内维尔·张伯伦

对我们去年经历过的事件，不管会有什么样的最后评判，不管英国政府已经作出什么样的评判，我们可以断言，这一个时期，将是一个不平凡的时期，在英国人民的历史上，这是一个难忘的时期。

我们自己已尝遍了百感交集的味道——先是忧心忡忡，后来是极度宽慰，情绪随着种种怀疑和恐惧的反复而变化。现在，我国人民已平静下来了，他们沉着而坚决，对自己的力量有信心，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做了和正在做着人们为维护和平能够做的一切事情。在确信我们目标的正义性和大公无私之后，我们一如既往地准备听取别人的意见，但决不是就此照办。至于在方式方法上，不管我们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分歧，令我感到满意的是，对我们遵循的政策原则，举国上下基本上是一致的。

最近几天，看来我已成为众矢之的，许许多多臭鸡蛋向我投掷，但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不会使我改变初衷。英国人民注视着我那把随我四处奔走的旧伞。我相信，他们对我们为了使欧洲免于战争所作的努力，以及目前所取得的成就是赞许的。

没有什么东西会诱使我们去进行一场战争，除非我们确信，不打仗，就将牺牲我们自己的自由和荣誉。我深信，如果有人想以武力来替代辩论（辩论的办法，正是我们国内用来解决我们内部争端的），那末，对任何我们可能想到的去制止他们的必要措

施,英国人民将会做我们的后盾。

目前,我们政策中的若干发展,迫使我们和诱使我们在欧洲承担起新的义务,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进一步充实我国的国防力量。爱干涉别人的事,成为多管闲事的人,从来不是我们政策的一部分。长时期以来,我们在欧洲大陆上有过某些联盟和协定,当然,在维护和平方面,我们是同样感兴趣的。只要这些不受到威胁,那我们无意走得更远。

至于德国的行动,只要他们局限于在德国范围以内,并只是为了促进德国的利益,而不威胁到非日耳曼人国家独立的话,那我们没有必要加以干预。然而,当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这两国的居民绝大多数并非日耳曼人)被并入德国的时候,那末,别的国家就马上要问:这一兼并进程要到哪里为止?每一个德国的邻国都感到其安全受到了威胁,这原是很自然的事情。猜疑、普遍的猜疑产生了,我们正在注视着这一政策所跨出的第一步,而这一政策可能打算逐个逐个地将别的国家并吞,从而最后控制全世界。

纳粹领袖们也许并无这样的野心,他们亲自说过,他们不想要把他们积储起来的强大武力用于侵略别国,或者企图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控制弱小国家。

如果确实如此的话,那末,我说,从英国的政策来讲,德国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我被告知,很多德国人不理解英国的政策,以为我们多少有包围他们国家的意图。我能够理解,吃尽战后严重匮乏苦头的人们,是害怕由于某些强国采取审慎政策而遭受到抑制或约束。好吧,让我现在告诉你们,一如我过去一直说过的那样,我们从来没有想要孤立过德国,或想阻碍德国正常和合法的扩展其在中欧、东南欧的贸易;更别说,想要对它发动战争而策划某种联合来反对它了。诸如此类的设想都是荒诞无稽的,

如果旨在宣传而一再重复，那末，除德国以外的任何地方，没有人会相信的。

另一方面，我同样要讲清楚的是，我们不准备坐视一个接着一个的独立国家的被消灭。在和平时期，我们是要不断地抵制这种做法的，因为在一些国家还不相信德国会就此罢休之前，欧洲是不会平静和安全的，而这些正好是我们曾给波兰、罗马尼亚和希腊作过保证的，并且，这些保证确为他们所热烈欢迎。

为了使局势平静和稳定，我们正着手同其他国家、特别是俄国和土耳其进行会谈。

希特勒先生在其最近的讲话中，提到了英德海军协定问题，他说：协定的基础是，英德两国之间不可能发生战争的这样一个信念。他接着又说，那种愿望和信念迄今还活在他的心里，但他暗示他的信心不再为伦敦所分享。他说，在任何冲突中，大不列颠必然会站在反对德国的一边，所以一场反对德国的战争在这里被认为是当然的事，正因为如此，所以协定的基础已经不再存在了。

唷，现在问题严重了，我现在要作出一个坚定而明确的声明，就我们方面来说，协定的基础并没有消失，相反，我现在认为，就象我过去一直认为的那样，英德海军协定能被正式看作我们两国人民不愿再互相作战的象征。我相信，这一愿望在两国人民之中同样始终坚守不渝。我还确信，两国人民希望他们的政府据此调整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和据此处理其事务，以使我们之间不再引起战争。

如我所解释过的那样，我刚才所说的和我以前提出的保证，丝毫不矛盾之处。希特勒先生还说，他希望我们英德两国间避免军备竞赛，他又说，他准备同我们磋商海军问题，旨在获得一种明确而坦率的谅解。英王陛下政府对那个声明予以最认真的

考虑，并将及时地把我们的答复送交德国政府。

让我在此时此地说一说，我们既不希望在军备方面，也不希望在经济方面同德国搞毫无止境的竞赛。我们已经签订的那个英德支付协定，业已证明对双方都有好处。我以为，不管我们两国在经济制度方面多么不同，支付协定产生了相当可观的相互贸易量。此外，我们不反对就相互贸易、改善两国经济状况所采取的措施进行商讨。当然，这只能是在向我们明白表态和有恢复已经动摇了的信心的愿望下进行。

很清楚，对欧洲国家提供的那些保证，大大地增加了我们的责任。因此，我们有必要把我们置于满足他们要求的地位。现在的战争不再事先有什么预备阶段。过去则不是那样，会给你许许多多表明战争即将临近的警告。目前，战争乃是准备周密的袭击，闪电式的突击是战争的第一个信号。因此，我们必须采取预防措施。其他内陆国家的国境，在边境上筑有防御工事，由边防战士日夜防守。我们这里的防御工事就是对空袭的防御，这已托付给保卫英国本土的国防义勇军了。

最近，我有机会同法国社会党领袖、前总理勃鲁姆先生交换了意见。他告诉我，在他以及同他交谈过的所有社会党朋友都认为，欧洲战争的危险只有一个，而且这倒是一个真正的危险，那就是人们获得了这种印象：大不列颠和法国并不是真心实意的，他们不见得会履行其诺言。再也没有更大、更致命的错误可犯的了。如果由于一种误解而使欧洲陷入战争的话，那将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目前欧洲的危险所在是但泽。我们给予波兰的保证是明确的，虽然我们将乐于看到波兰和德国之间的分歧将通过协商，友好地解决，虽然我们认为，他们可能而且一定会这样解决。任何试图用武力来改变现状，诸如威胁到波兰

的独立,那将不可避免会引起一场大战,我国则将被卷入。

我并不希望你们认为,所有这一切会导致战争的立即爆发,相反,我们越强大,我们就越能抵抗侵略,如果有需要,我们就是要打击侵略者,这样,和平就可不受干扰。所以,我非常高兴地告诉你们,在三军方面,我们正在增强我们的力量,在人力和装备两个方面,在舰艇、枪炮、飞机、弹药各个方面都达到了足以反映我们最高声誉的程度。

我们所采取的措施将大大增加我们的国家开支,我往往因我不再是财政大臣,不再首先由我想方设法肩负起供给他们资金的责任而高兴。但我的同事、约翰·西蒙爵士,在预算方面,无论在决定多少开支出自借款,或多少开支出自税收方面,却是如此地成功。他为在社会各阶级间公平合理地分摊新税收而煞费苦心。我想不起近来的任何预算——不光是指我自己的预算——遭到象这样少的批评的。

展望未来,我担心,我们看不到有任何核减税收的希望;我们一定要注意每一个辨士的支出,以及我们目前肯定经受不住沉迷于任何大量增加我们当前三军费用的计划。如果我们能从国际紧张局势中(海外都在焦虑)稍微得到些缓和的话,有许多迹象表明,我们是能够扩大贸易的,而这将有利于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我国劳工大臣提出的最新数字表明,失业人数有进一步的减少。现在就业的和被保险的人数超过过去任何记录。

如果我有时间,我可以提供别的征兆,表明未来决不是没有希望的。我曾经谈到过在南非洲有一个很大的地区,那里每年的旱季很长,旱季时只是一片荒凉的沙漠;但当旱季一过,雨季来临时,顷刻间,褐色的大地就长满了青草,成了一个真正的花园。我们也如此期待着生气勃勃的信心的失而复得,当它一来

临,我们的沙漠将百花齐放,象南非洲的干燥高原一样。

产生这种信心的力量,并不单单在我们手里,只要我还担任首相,我仍将期望,并尽一切所能把它争取回来。同时,我们每一个人也要保持信心,以便作出贡献把它争取回来。依靠这种信心,无论是怎么强大的物质力量,也决不能动摇它。

让我对你们背诵一位伟大的美国诗人的诗作为结束:

我们的祖先们安息了,  
但人们仍然象祖先们一样  
勇敢、聪明、诚实。  
为什么老是计算损失,  
而不寻思收获?  
最好的东西,就是——  
我们现在所有的。

(摘译自一九三九年七月号美国《现代史》杂志 上海  
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史组译)

## 论慕尼黑

〔英〕爱德华·哈利法克斯<sup>①</sup>

我无意重写以慕尼黑为高潮的这段历史。先后在外交部掌权的大臣中，没有人会象那时的大臣那样倒霉。那时每天二十四小时，无时不忧心忡忡，因为他手头简直没有什么牌可以用来支持他的外交活动。英国人民多年来一厢情愿，总是认为既然他们如此清楚地看到战争是不可取的，那末别人一定也是看到了的。由于低估了战争爆发的危险，三军和工业的发展都受到了阻碍。因此外交大臣就象是这样的一个打牌的人，人家要他下赌注，而他却知道，牌这样打下去，如果运气不好，他手头并没有能赢回赌注的王牌。

随着捷克斯洛伐克上空乌云密布，情况愈来愈清楚的是，对那个国家唯一直接有条约义务的法国人，极不愿意看到发生要把他们卷进去履行义务的事态发展。我们也痛苦地知道，我们自己的国家要投入一场战争的任何条件也都不具备。因此，英法两国都大体上认识到，事态发展会不可避免地和不愉快地走向慕尼黑。

由于慕尼黑而引起的批评意见从来也没有使我感到一点惊奇，如果我不是恰好在负责岗位上，我很可能自己也已挤身于那些批评者之列了。但批评者应该注意到两三件事情。一件事

<sup>①</sup> 哈利法克斯是张伯伦担任首相期间，1938年至1940年间的英国外交大臣。

情就是，他们在批评慕尼黑的解决办法时，他们是批错了对象，批错了日期。他们应当批评历届政府和各有关方面看到了德国的事态发展而没有预见到有必要重整军备。应当批评的日期是一九三六年，那一年德国违反了条约规定，重新占领了来因兰。我毫不怀疑，如果那时我们干脆叫希特勒滚回去，他就不会有后来造成更大祸害的力量。但是，撇开法国人不说，一九三六年时英国各界舆论，没有一个会不反对这样的行动的。照英国人看来，德国人要走进他们自己的后院去，而且当时也已在同他们讨论他们有权重新占领该地的日期和条件，为此而竟同德国人打仗，这是不可理解的。于是，我认为是最后一次可以不用打仗而有效地获得和平的机会就此白白错过了。

那些批评者也没有想到要考虑一下政治或战略方面的事实，而这些事实是同人们的激动情绪相矛盾的。批评者或是不知道，或是不想知道，英联邦不大可能会一致支持英国在一九三八年为了捷克斯洛伐克而采取一项积极干预的政策。而且一旦奥地利被吞并，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捷克斯洛伐克已是不可防御的了。但那些批评者，出于善意和其他无可非议的动机，由于看到一个弱者受到一个彪形大汉的威胁和迫害，而旁观者却似乎不肯冒一点个人风险出面干涉，因此他们深为不满，从而也就看不到一些具体的事实。这种反应又受到另外两个因素的影响而变得更加激烈。一个因素是有些人在为张伯伦辩护时不幸提出了这样的论点，说捷克斯洛伐克放弃它的日耳曼人，从长期来看是对它有利的，因为这些人是同化不了的，因而他们会不断制造麻烦。这样的论点简直是再伪善也没有了。可以为慕尼黑辩护的唯一理由，也是真正的理由，就是整个这回事是糟糕透顶的，但这是无可奈何地在两害之中取其轻的一种做法。

另一个给批评意见火上加油的因素是，内维尔·张伯伦在

感情冲动下自己使用了一些不幸的字句。“光荣的和平”、“我们时代的和平”等诸如此类的字句，即使对他最亲近的人来说，听起来也是很刺耳的。正如他的传记作者提醒我们注意的，在讲了这些话后不久，张伯伦就恳求下院议员们不要揪住他在如此耗人精力的紧张状态下所讲的话。但归根结蒂，有一件事是主要的和无可争辩的。在一年后战争终于爆发时，英国和英联邦是完全团结一致的，大家都问心无愧，确信对在欧洲避免一场大战，已尽了一切努力，已不存在其他途径了。这就是张伯伦完成的一件大事啊。

从这一点来看，丘吉尔在他的世界大战回忆录中所说的话是不太公正的。他说：

“张伯伦回到英国。……他挥动着有希特勒签字的联合声明。……他的汽车经过欢呼的群众时……他对哈利法克斯说……‘三个月后，这一切将成为过去’；但他在唐宁街官邸的窗户前又挥动那张纸说：‘……我相信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

这段话的含义不可能不是说张伯伦存心要使群众接受一种他自己也并不相信的看法。事实是这两句话当然是指的两件完全没有联系的事情。他讲第一句话时，我是唯一的当事人，也是我把这件事告诉张伯伦传记作者法伊林教授的，而丘吉尔也就是从这本传记中引用了这句话的。因此，张伯伦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是最一清二楚的。当他说：“三个月后，这一切将成为过去”，他是指当时群众的热情。当他提到“我们时代的和平”，他想到的是他相信这是希特勒在声明上签字时的精神，而当时他是倾向于相信存在这种精神的。张伯伦无疑有他的过错，可是人们没有理由指责他不老实嘛。

（摘译自一九五七年英国出版的哈利法克斯回忆录  
《充实的岁月》 李中长译）

## 慕尼黑危机的真相

〔英〕弗雷德里克·莫姆

编者按：本文作者莫姆，是“慕尼黑”时期张伯伦内阁中的大法官。这是一篇道地的投降主义辩护书，胡说在强敌之前，只能屈膝投降。但由于当时已是一九四四年，慕尼黑事件的贩卖真相早已大白天下，因此，这篇辩护词同张伯伦的下院演说相比，已经不是那末“理直气壮”了。

### 对张伯伦先生的指责

有人断言，英国在内维尔·张伯伦及其政府的领导下出卖了捷克斯洛伐克，因为捷克斯洛伐克要保存日耳曼人占人口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苏台德地区，但英国却拒绝为此而同德国开战。“出卖”一词显然是用得不很确切的，因为英国从来没有答应过要保证捷克斯洛伐克领土的完整，也从来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承担过任何直接或间接的义务。后来固然派出了朗西曼勋爵去布拉格充当捷克政府和苏台德日耳曼人之间的调解人，试图使多年来有冲突的双方能和平解决问题，但是事情是讲得一清二楚的，朗西曼勋爵并不是仲裁者，英国对他个人的见解或结论并不承担支持的责任。

后来的事态发展极为清楚地表明，自一九三八年五月以来，充当苏台德人领袖的体育教师康拉德·亨莱因一直是在希特勒的影响下进行活动的。希特勒早已下了决心要获得苏台德，他只是在等待一个下手的借口。当然，他是会找到借口的。他庄严地向世界保证，他只是要为第三帝国收回几块日耳曼人占多数的地区，“他在欧洲别无其他领土要求了”。那些不受国内政治影响，或虽仇视希特勒但不抱偏见的人大抵倾向于认为，希特勒的话虽然不应深信不疑，但还是有些道理的。其理由有三：在吞并奥地利后，希特勒载誉而归，已不必再冒险了；德国老百姓总的来说不想打仗；进一步侵入非日耳曼人居住的地区，会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在希特勒看来，也是太危险了。

那末，人们对张伯伦在一九三八年九月涉及希特勒和捷克斯洛伐克时的行为进行攻击，其实质究竟是什么呢？归根结蒂，这就是说，在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二日纽伦堡国社党代表大会上，希特勒发表了反捷战争叫嚣，戈林指名捷克斯洛伐克为“敌人”，并警告其他国家不得干预，在这种情况下，张伯伦先生应当宣布，如果德国想用武力吞并苏台德，英国就将对德宣战。对张伯伦还必然会有这样的指责，说他本来应当请下院同意对德宣战，而不是飞往慕尼黑去同希特勒谈条件。鉴于希特勒所抱的态度，我们是否就此投入战争呢？有责任感的人是不会赞成英国虚张声势、进行恫吓的。“勇敢地面对希特勒”，这是一九三八年人们经常提到的，借用了拳击比赛场上使用的术语。但这显然并不意味着你握紧拳头，摆好进攻的姿势，然后在希特勒前进时就叫饶认输。不！如果我们进入比赛场，那就得准备打到底啊。

##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

许多批评内维尔·张伯伦的人似乎认为，苏台德问题引起的危机可以不必追溯其历史背景，但身处首相地位的人是不能如此看问题的。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存在，要归功于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战，因为战争结果是奥匈帝国的瓦解。涉及的人民是多民族的，并且是互相敌对的，其中有捷克人、摩拉维亚人、斯洛伐克人、匈牙利人、日耳曼人、波兰人和卢西尼亚人。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捷克人最多，多少年来他们同日耳曼人一直长期不和，世代结仇。因此，不顾原属奥地利的三百万日耳曼人（且不说还有一百万匈牙利人）的反对，把他们纳入这个新的共和国，这多少是一桩危险的试验。

很清楚的是，由占多数的捷克人统治了十八年的那些少数民族，没有一个是心甘情愿、表示满意的。如果希特勒打进去的话，他们之中是不大会有人准备抵抗的。

应该公正地补充指出，捷克人并没有在这个新的国家里过分地压迫那些少数民族，但是，他们也没有能作出一定的努力，以满足少数民族在这个共和国内享有合理自治权的愿望。因此，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前，捷克斯洛伐克少数民族的不满情绪已与日俱增，而三月份情况又有了严重的变化。

### 吞并奥地利的影响

吞并奥地利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地位产生了三个很严重的和显著的影响，并终于导致了慕尼黑危机。第一个也是最严重的

影响是，这个共和国的战略地位大大恶化了。在波希米亚森林地带和其他德捷边界线上，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凭借自然地形设置着坚强的防御工事，但是，它却根本没有准备好抵御来自奥地利方向的进攻。事实上，现在可以很容易地从陆路袭击这个共和国了。第二个后果是，它的经济地位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第三个影响是，这件事对要求自治的苏台德人以及共和国的其他少数民族，特别是波兰人和匈牙利人，起了鼓舞作用。

### 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纳粹鼓动

四月二十三日，亨莱因在卡尔斯巴德一次苏台德人的盛大集会上提出八点要求。他说，这是为“和平解决问题铺平道路”。问题于是变得严重了。这些要求包括：日耳曼人和捷克人的地位应完全平等，划定和正式承认德语区，并让这个地区享受充分自治权。然而布拉格政府却作出决定说，亨莱因的要求“不能构成谈判的基础”。乍看起来，这种态度似乎是不合理的，因为从表面上来看，八点要求似乎是同捷克人在签订凡尔赛和约时所作的诺言一致的。情况看来是，布拉格政府对共和国的地位已变得令人非常担心这一点，迟迟没有认识。这个国家已为敌对国家所包围。由于德波贸易协定的修改，它受到了经济压力。波兰也指责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未能满足捷境内波兰少数民族的要求，从而威胁要对它发动进攻。苏台德纳粹党则日益加紧进行煽动。马尔扎人只是在等待德捷问题的解决，然后也提出他们的要求。

### 法国的态度和所处的地位

可以不用夸大地说，批评张伯伦先生的人总是对法国的处

境毫不加以考虑：如果为了要制止苏台德归于第三帝国而投入战争，将会给法国带来什么后果。许多批评者似乎认为，英国即使没有盟国，而且还要应付敌对的日本和意大利，也是能够并且应当投入战争的。他们没有想一想这条道路的结果是什么。连那些比较讲理的批评者（即在“慕尼黑”已使战争立即爆发的危险消失之后才成为批评者的那些人），也没有真正想过，如果法国拒绝投入战争而保持中立，即使英国愿意帮助，捷克斯洛伐克也是注定要彻底完蛋的。

法国人经过探询，发现如果它投入这样一场战争，它在东方是找不到盟国的。波兰驻法公使声明，如果法国为了帮助捷克斯洛伐克维持其边界而投入战争的话，波兰既不会支持法国，也不会允许苏联军队通过波兰去援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大使也说得很清楚，南总理斯托亚迪诺维奇最近刚同意大利签订了条约，他是不会参加对德作战的。罗马尼亚大使没有把话讲死，但显然也不能指望罗马尼亚会支持法国。批评张伯伦先生的人应该首先拿出证据，说明在希特勒不让步的条件下，法国政府在一九三八年九月是有决心要对德国发动一场全面战争的。然而，实际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

## 法国的军事地位

法国的部长们对自己的军队，特别是空军、高射炮和坦克的情况是完全了解的。德国每月飞机生产量估计有三百架至五百架。法国每月生产量却仅为四十架至六十架。

除巴黎外，法国各地几乎都没有高射炮，而德国在西班牙已显示出它的轰炸力量正在日益加强，使巴黎和那些靠近德国边境的法国城市居民胆战心惊，极其惶恐不安。

坦克的情况也同样严重。单讲坦克数字是不能说明问题的，因为当时的法国坦克已陈旧不堪，也很难说清楚一九三八年九月时究竟有多少坦克。然而在一九三八年七月，法国仅有三十八辆现代化坦克。一年后，经过大力改进，法国也仅有约二千二百辆现代化坦克，而德国却有四千辆至六千五百辆。然而，我们关心的只是一九三八年九月的情况。毫无疑问，当时法国在飞机、高射炮、坦克和反坦克炮方面都不如德国，因而任何有远见的政治家或将军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要帮助捷克斯洛伐克而发动对德战争，其成功机会是非常渺茫的。

### 纽伦堡代表大会

希特勒当时得出结论，摊牌时间已到。他一如以往，在纽伦堡国社党年会上充当了受到广泛宣传的主要角色。九月十日，戈林元帅在演说中大吹特吹德国力量如何强大，谴责了捷克斯洛伐克，并警告其他国家不得干预。元首在用词激烈的九月十二日总结演说中宣布，苏台德日耳曼人自决要求的背后有着第三帝国的力量。他描绘出一幅捷克斯洛伐克日耳曼人受到虐待的图景，重复了以前的声明，指出第三帝国不会再让这些日耳曼人继续受压迫了。最后他说：“我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必须立即停止压迫三百五十万日耳曼人，他们应自由地享受自决权。”

事态的发展达到了高潮。

### 张伯伦的贝希特斯加登之行

在这种令人惶惶不安的气氛中，张伯伦先生于九月十四日打电报给希特勒，提出前去会见希特勒的建议。他接到了答复，

说元首将很高兴,定于第二天下午在贝希特斯加登进行会面。在内阁的同意下,张伯伦于第二天飞往贝希特斯加登。英国首相此时已年迈体衰,对他来说,进行这次旅行是需要有点勇气的。在他飞越海峡和德国平原的旅途中,他的心情不可能是轻松的。他一贯自认是热中于和平的人,现在他得考虑战争的可能性,但是他又完全知道整个法国政府极其反对战争,并正在想方设法体面地逃避他们承担的条约义务。他也完全知道英法两国都根本没作好战争的准备。如果英国支持一个没有准备好的法国,日本和意大利又可能积极采取敌对行动,而英法在冲突中又不大可能有其他盟国,英国所冒的风险是够大的。在这次会议上,希特勒占有了所有的王牌。

在贝希特斯加登,张伯伦同希特勒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希特勒表明了决心,要让苏台德人有自治权,而如果苏台德要求并入第三帝国,也就应该这样做。他斩钉截铁地宣布说,“与其等下去,我是准备打一场世界大战的。”在希特勒讲了这些话并大肆谩骂了一阵之后,张伯伦打断了希特勒的话头,问希特勒为什么要他远道跋涉前来德国,因为这显然是白白浪费时间。此时希特勒答应,一旦英国同意自治原则,他愿意讨论实施这一原则的办法。于是张伯伦说,他在同政府其他成员商量之前,是不能作出这样的保证的;他将回去征得他们的同意,如果希特勒在此期间不发动战争的话。对此,希特勒表示,除非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态发展迫使他改变主意,他是同意的。

这是慕尼黑危机的第一个决定性阶段。实际上,这意味着希特勒发出了最后通牒。是接受呢,还是拒绝呢?再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供选择。

九月十八日,星期日,达拉第和庞纳来讨论局势。九月十九日,实质上是接受了希特勒最后通牒的“英法建议”送给了布拉

格政府。

## 戈德斯贝格危机

但是，正如我们现在已知道的，希特勒并不想和平解决问题。他想的是，坦克滚滚，战鼓咚咚，他的军队象征征服者那样举着卐字旗进入捷克斯洛伐克。他想的是，德国在十月一日就武力占领苏台德。因此，当张伯伦再次飞往德国，于九月二十二日同希特勒在戈德斯贝格会晤时，他收到了一份附有地图的备忘录，规定要立即割让所谓日耳曼人地区，另外，还有其他一些远远超过了英法建议（原是根据希特勒的最后通牒而拟出的）范围的条款。张伯伦没有接受这些新条款。

不管是对还是错，张伯伦在戈德斯贝格得出结论，我们和法国都不能劝告捷克斯洛伐克驯服地接受德国的侵略。有条不紊地解决问题同赤裸裸地使用暴力完全是两码事。

因此，九月二十三日，英法政府通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说，鉴于希特勒提出的要求，他们不再认为捷克斯洛伐克不应当作备战准备了。同天，捷总统发布了总动员令。

如前所述，法国政府是极不愿意投入战争的。然而，由于条约的关系，无疑它也有不得不履行义务的情况。九月二十四日，法国政府于是发布了部分动员的命令，征召了一百万后备役军人。

九月二十七日，英国海军收到了动员令，这是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一步。伦敦的公园和街道开始挖壕沟，人们在家里试带防毒面具。政府发布了紧急状态的动员令，并批准了空军辅助部队的征召。战云密布，战争一触即发的局面是有目共睹的。这个国家任何有理智的人都认为，这决不是什么特大规模的虚声

恫吓。

九月二十八日，张伯伦向下院发表了他的历史性演说，详尽地介绍他最近的活动，他的贝希特斯加登和戈德斯贝格之行，以及随后霍勒斯·威尔逊爵士和内维尔·汉德森爵士去见希特勒的情况。他也谈到了他发给希特勒的电信的基本内容。他明白无误地指出，英法强烈希望能找到欧洲不用打仗而解决问题的办法。

就在此时，财政大臣约翰·西蒙接到了两张纸，他立即转交张伯伦。张伯伦看来电时全场鸦雀无声，然后他说希特勒刚通知他第二天上午去慕尼黑会晤，被邀者还有墨索里尼和达拉第。他补充说，大家又有了机会通过讲理、善意和讨论来“处理一个解决办法已指日可待的问题”。

## 慕尼黑达成协议

第二天上午张伯伦从赫斯顿出发飞往慕尼黑。在那里他受到了德国老百姓的夹道欢迎。他在希特勒的官邸会晤了墨索里尼、达拉第和希特勒。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希特勒、张伯伦、达拉第和墨索里尼在慕尼黑签订了协议。谁要是说九月二十九日在慕尼黑达成的协议同九月二十三日希特勒在戈德斯贝格提出的要求没有什么差别，那是不真实的。从捷克斯洛伐克角度来看，一些更动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更动可以归结如下：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慕尼黑协定不是德国的一份“不容讨价还价的命令”，而是一个在国际委员会主持下国际间安排的解决办法。

第二，在戈德斯贝格提出的条款，不提国际间对新边界的

保证。在慕尼黑，英法对此作了保证；德意则一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波兰和匈牙利少数民族问题解决以后，也将作出保证。

第三，希特勒在戈德斯贝格时提出要在一些捷克人显然占多数的地区举行公民投票，这一点放弃了。

第四，在慕尼黑规定新边界要由一个国际委员会决定。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有捷克人，他同德国人处于平等地位，而不是一切由德国说了算。

第五，德国军队将不是在十月一日用武力占领苏台德，而是在十天的时间内分阶段进行占领工作，从而使愿意撤离的人有时间这样做。

协定文本立即送交捷克政府。经过反复推敲，捷克政府在九月三十日接受了协定的条款。

我的看法是，可以公正地说，就以上扼要介绍的情况来看，特别是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盟国中没有一个是愿意为了苏台德问题而同德国开战的情况下，慕尼黑协定是正直的捷克政治家们也能正当地加以接受的一个协定。他们这样做无疑拯救了千千万万捷克人的生命，节省了千百万捷克克朗的钱财，保全了大量的财产。同样，也可以公正地说，根据当时的情况，英法走的道路也完全是合理的。两国在一九三八年不得不尽一切可能而体面地“赢得时间”。

（摘译自一九四四年英国出版的《慕尼黑危机的真相》  
淮海译）

## 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

〔美〕科林·利格姆

〔内容提要〕 本文介绍了莫桑比克、安哥拉、纳米比亚、罗得西亚、南非等南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情况，特别介绍了近年来非洲解放运动中同南非白人政权进行“对话”逆流的某些背景。其中几内亚(比绍)应属西非。

由于一九七四年四月的里斯本军事政变以及葡萄牙随后决定放弃五百年殖民主义的结果，黑人解放运动针对着南部非洲的现状及其白人维护者而进行的斗争，就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打倒了马尔塞洛·卡埃塔诺政权，也就打掉了非洲南部地区的白人霸权所依靠的三大支柱之一，从而导致在几内亚(比绍)建立起一个受以前武装解放运动控制的独立政府，导致在莫桑比克由胜利的武装解放运动来掌权，并且导致协商决定安哥拉的三个解放运动在安哥拉独立过程中所担任的任务。而这些发展，又使得维持白人现状的其余两个支柱(罗得西亚和南非)更显得突出了。

葡萄牙作为非洲的一个军事因素的消亡，显然已经引起了一种新的不稳定的政治局面，这种局面不仅影响那些已经组成或正在组成殖民地独立后的政府的解放运动，而且还影响那些继续在库内内河、赞比西河和林波波河以南(也就是在纳米比亚、罗得西亚和南非)进行解放斗争的解放运动。本文的目的，是要考

察各种不同团体的倾向性,以及同它们的政策有关的各种因素。但是,在我们对各个国家逐一进行分析之前,仔细地看一下引起这些运动的政治上比较主要的来龙去脉,应该是有好处的。

## 黑白之间趋向缓和

同十多年来支配着斗争的武装暴动政策相对照来看,南部非洲解放政治的新形势的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更多地强调缓和与谈判。

当然,暴力与谈判的抉择,从来就存在于非洲人的心目中。也许是在一九六九年四月的卢萨卡宣言中最坦率地表达出来了。此项宣言是由非洲统一组织的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十四个会员国中的十三个会员国正式通过的,它明确表示宁可和平解放南部非洲。它保证:只要白人的殖民地政权和地方政权一旦接受由各该国家的各族人民进行民主统治的原则,游击队的活动就会控制起来;它还声称:一旦各白人政府同意就达到这个目的的方式方法问题同它们自己的那些具有代表性的黑人领袖们进行谈判,那末,黑非洲最后由多数人统治的时间表该是好商量的。但是,除了这样一些保证外,各签字国还公开宣布要继续支持暴力斗争。

由于这种旨在改变宪法的和平谈判建议毫无结果,因而黑非洲知道,除了有力地进行武装暴动,倾全力以打倒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的葡萄牙统治,没有别的办法可以代替。(当然,几内亚(比绍)并不在南部非洲,而是在西部非洲。)但是,由于一九七四年葡萄牙政权的改变,黑非洲的领袖们断定:一个新的、决非偶然的、通过谈判的进展机会已经出现。南非总理巴尔塔萨尔·约翰尼斯·沃斯特在一九七四年十月的几次讲话

中的那种比较有利于促进缓和的调子，则助长了他们的这种信念。当时南非共和国正遭到联合国的驱逐，只是由于美英法三国投票否决才得幸免。（当美英法三国使用它们的否决权时，西方国家已经私下告诫南非人：今后这样的支持就要看某些积极的迹象为转移了，这些迹象就是南非共和国愿意满足联合国大会的那些更现实的要求——特别是同意纳米比亚独立和积极改变其本国的种族政策。）

沃斯特先生关于他的政府要向新的方向前进的诺言，立即引起非洲人的积极反应。赞比亚总统肯尼亚·卡翁达在同他最亲密的同盟者（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博茨瓦纳总统赛雷茨·哈马爵士、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将军以及莫桑比克的当选总统萨莫拉·莫伊塞斯·马谢尔）会商之后宣布，黑非洲准备开始同比勒陀利亚会谈，以促进缓和。

在这些公开声明的后面，已经有过一些非常秘密的活动。一九七四年九月，沃斯特先生曾经访问过象牙海岸，同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总统及其邻邦塞内加尔的总统列奥波尔德·桑戈尔举行会谈。这位南非总理又曾到马拉维同卡穆祖·班达总统商量过，而且还曾去过博茨瓦纳。南非的居间人，包括南非英美公司的主席哈里·奥本海默，也都忙于为赞比亚和南非使节之间的外交会谈铺平道路。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下旬和十二月上旬在卢萨卡举行的一系列会议中，这些活动的发展达到了顶点。在这些会谈中，黑非洲私下向比勒陀利亚提出缓和（即停止游击队活动）的三个条件：罗得西亚新宪法的谈判，必须达成协议；旨在建立一个独立的纳米比亚而进行的宪法会谈，必须开始；沃斯特政府与具有代表性的南非黑人领袖们（包括监禁在罗本岛和其他地方的那些政治犯）之间的有意义的讨论，必须开始进行，目的是要谈出一

个可以为南非全体居民所接受的新宪法来。关于满足第一个条件的进程,是在十二月初开始的,当时伊恩·史密斯政府的代表同罗得西亚三大解放运动新近联合的领导人员在卢萨卡会晤,订出了在这个脱离英国的英国殖民地搞缓和和谈判的协议。这个卢萨卡协议规定:史密斯政权要立即释放全部政治犯,并且立即开始同具有代表性的黑人领袖会谈,为罗得西亚合法的独立决定一部满意的新宪法;解放力量在谈判期间要停止游击队攻击;全部“恐怖行为”一旦停止,南非就要从罗得西亚撤回其二千名准军事性的警察。

在业经同意的关于纳米比亚独立问题的谈判方面,其进展的可能性应该说是相当大的,尽管不象有什么马上可以达成的协议。问题大得多的倒是沃斯特先生是否愿意在他自己的共和国内部,推行那种会使共和国的黑人多数满意的改革。对他来说,对于南非周围地区(即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的缓和条件,要比对他自己的心脏地带的缓和条件好商量得多。

尽管如此,只要缓和的进程一旦开始,就一定会引起可能进一步改变南部非洲均势的许多极其重大的变化。与此同时,要是该地区所有各族人民取得完全民主权利的进程遇到一些障碍,或者进展得太慢的话,那末,黑非洲人就保有恢复猛烈的游击队活动的选择自由,而这个选择自由,由于葡萄牙殖民帝国的崩溃和里斯本的前非洲殖民地的迅速转为黑人多数统治而变得更有生命力了。

在这个总的方面,必须注意的是:葡萄牙殖民主义的崩溃,包含着一些重要的教训,也许这些教训已经对索尔兹伯里和比勒陀利亚的白人政权起作用了。事实上,黑非洲的总统们关于转向缓和和谈判政策的决定,看来是以白人政府对于葡萄牙人的遭遇所预示的凶兆而作出的重要判断为依据的。

第一点教训是：武装起义运动，不必以取得军事上的优势为胜利的绝对条件；长期斗争的政治影响可能比军事上的胜利具有更大的重要性。除在几内亚（比绍）外，反葡游击部队都没有赢得他们的战争。尽管他们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战斗中已经逐渐地壮大起来，而且经过一段长时期就可以打败已经削弱的葡萄牙军队，但是在一九七四年四月，总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然而，这次使葡属非洲殖民地的黑人多数可以获得解放的里斯本军事政变，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些殖民地旷日持久的长期斗争促使其突然发生的。由于战争引起的对于里斯本的国家预算和葡萄牙的人力方面的需要不断增大，因而在葡萄牙，从国家的利益出发，对于这种冲突的价值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同时，公众对于国家领导人的信任也大为低落。如果没有非洲灌木林中的游击队在削弱萨拉查老体制的基础方面作出贡献，葡萄牙的武装部队运动是否还能如此容易地夺到政权，那是完全没有把握的。

因此，葡萄牙人拥有比反对他们的游击队更大的军事力量，这还是不够的。只要那个掌权的少数人统治集团一旦确已证明它自己不能取胜，并已陷入愈来愈软弱无力的防御斗争，那末，军事力量上的显著优势也就消失了。到那时，贸然想要对那些日益怀有敌意的和不受管束的本地居民进行“一场争取人心的战斗”的话，那简直是一定要失败的。（也许这是最重要的教训之一，不仅是葡属殖民地的战争具有这种教训，而且第三世界所有最近的武装冲突，也都具有此种教训。）

葡萄牙殖民主义的死亡，除了给游击队武装斗争的政治意义以新的说明外，还足以证实一九六三年阿尔及利亚的前领导人艾哈迈德·本·贝拉在同南非黑人领袖商讨时所提出的解放南部非洲的主要战略措施的切实可行性。当时本·贝拉认为：新

成立的非洲统一组织(一个独立非洲国家的集团)应该集中它的力量,在这个地区(南部非洲)的那些白人少数的堡垒的最薄弱处赢得多数人的统治权。总之,应该力图首先打倒葡属殖民地政权,然后推翻罗得西亚的白人统治,最后反抗南非政府。

非洲统一组织确实是按照这样的先后次序行动的,而且在达到它的初步目的之后,目前正在瞄准第二个目标——罗得西亚。事实上,非洲统一组织的特殊机构——非洲解放委员会,早已决定把原先给予各反葡解放运动的那部分武器和大部分资金,分配给一些反抗史密斯政权的团体了。所以,谁都能够预感到津巴布韦解放力量正在大大加强(“津巴布韦”是非洲民族主义者给罗得西亚取的名称)。非洲解放委员会还打算增加对纳米比亚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支持。目前,非洲解放委员会常常以较少的注意力和援助给予那些准备以武力反抗南非的解放力量。

## 外援的来源

正如以上讨论中所表明的那样,外援对解放运动向来是重要的。它们已从黑非洲各国取得了此类援助的主要部分,但是它们也一直收到其他国家(特别是共产党国家)在经济、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大量支援。考察一下外援的这种比例结构情况的原因,确定一下这种外援比例结构情况在各解放运动的政治倾向性方面,以及在那些解放运动看来要遵循的那些政策方面,究竟表明了一些什么迹象(要是迹象的话),都该是有好处的。

各解放运动已经发现非洲统一组织是一个当然的同盟者和坚定的支持者了。非洲统一组织从一九六三年的成立大会起,就致力于集体行动,反抗“白人的南方”,以便完成“尚未完成的非

洲革命”。这个组织一直企图使它所给予解放斗争的援助的有效性提高到最大限度，而且坚持要把所有来自非洲内部和来自海外的一切援助，全部通过非洲解放委员会来统筹进行，借此使大国的争夺和干预解放斗争的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由于此项援助是按照本·贝拉战略所提出的先后次序支付给各个不同的运动的，因此，这种安排毫无疑问地影响着各个不同地区的解放斗争的处境。

但是，非洲统一组织在执行其全部统筹进行的原则方面，一向只是部分地成功。当然，大部分来自黑非洲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援助，都是通过非洲解放委员会来统筹提供给各个不同的解放运动的，其他来自南斯拉夫、瑞典、丹麦、挪威、荷兰等国政府的以及来自象世界基督教会理事会和英国工党等一些非政府团体的援助，也是一样。但是，苏联和其他华沙条约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至少在一九七〇年以前），向来只是把他们的一部分援助通过非洲解放委员会来进行。也许这些共产党国家所提供的大部分援助，一直是直接送到这些捐赠者所赞助的特定团体手里的。

那些解放运动一直谋求或接受来自非洲以外的直接援助（也应该指出，并不是所有需要这种援助的团体都曾拿到手的），它们明显地这样做，是由于想炫耀一下它们自己在当地的政治前途。

主要的西方国家显然不在非洲解放运动的援助者之列。（诚然，在肯尼迪政府时期有一段很短的时间，霍尔敦·罗伯托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接受过美国的一些支援，已故的爱德华多·蒙德拉纳设在坦噶尼喀首都达累斯萨拉姆的莫桑比克学院也得到美国若干非军事性的援助。）但是，这种情况并不反映非洲解放运动内部因此就有一种反对西方的倾向性；事实上，这些团体

从来没有停止过向西方国家敲门求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主要国家倒是一直踌躇不前，因为生怕怂恿暴力推翻罗得西亚和南非的政权，或者削弱葡萄牙。西方国家宁愿依靠劝说，以图影响非洲南部葡萄牙人的和南非少数白人的政权放宽它们的国内政策。可是，它们所依靠的这种劝说，至今没有引起什么有意义的变革；而黑非洲人则终于看到了这些西方国家即使实际上并不是白人政权的直接或间接的支持者，充其量也不过是解放力量的态度暧昧的赞助人。

总之，南部非洲的黑人解放运动一直在寻求外援，而且不管从哪里得到这种援助，他们都要。

### 几内亚(比绍)的解放者

葡萄牙的三个主要非洲殖民地，都已朝着独立的方向前进，其速度的快慢，与它们各自的解放运动的活动效果成正比。例如，首先取得独立(一九七四年九月)的殖民地是几内亚(比绍)。在那里，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进行过一场成功的游击队起义，而现在已经在刚成立的政府中掌权。目前，独立党并无明显的政敌；不过，它的前途如何，还要取决于党内能否保持团结——这种团结原是由一九七二年被暗杀的前杰出领袖、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阿米卡尔·卡布拉尔奠定的。这个运动内部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乃是大陆上的某些黑人领袖与出身于首都比绍或佛得角群岛的葡萄牙混血种知识分子之间的对抗。事实上，卡布拉尔的被害可能就是由于这种对抗而造成的紧张关系所引起的。最近关于葡萄牙打算在一九七五年七月让佛得角群岛独立的声明，并没有指出佛得角群岛是否愿意同几内亚(比绍)联合，但是为决定佛得角群岛的前途而举行公民投票的计划，却把

在这个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交给了独立党，指定它为当地协助进行选举准备工作的唯一政党。

当前的独立党政府，是一个实用主义的非洲民族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联合政府。而后一类人包括那些坚决主张要给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带上独特的非洲风格的人——就象几内亚的总统塞古·杜尔所主张的那样（杜尔在游击战争的年代里是独立党的主要同盟者，因而对他的小邻邦有强有力的影响）；也包括那些赞成同莫斯科结成国际同盟的人——如同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另一个独立党的有力支持者）所赞成的那样。新独立的几内亚（比绍）共和国总统路易斯·卡布拉尔，受到他已故的哥哥阿米卡尔的那样独特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及他自己与菲德尔·卡斯特的私人友谊的强烈影响，但是，他也象他的哥哥一样，依然对葡萄牙人怀有好感，而且有能力推行一条实用主义的路线。

独立党政府的政策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现在还不清楚，然而在掌权的显要人物之间一定会有政治斗争——这一点在紧接独立之后的日子里，在所有的解放运动中，都曾出现过。但是几内亚（比绍）和葡萄牙相互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则对独立党政府的政策影响极大。这也要取决于葡萄牙自己在国内最后形成的政权的性质。由于目前的里斯本政府迅速地把政权移交给独立党，并且同意给予佛得角的政党以较重要的任务，这就大大有助于消除解放斗争所带来的苦难。

另一个可能对独立党的未来方针有重大影响的因素，是几内亚（比绍）从哪里取得外援的问题。葡萄牙本身没有能力对这个穷得可怜的小国提供很多的援助。苏联和中国已经提供了巨大的援助，但没有说出任何数字；是否还有其他来源（例如，欧洲共同体）能比得上共产党国家所准备给与的援助额，还有待于考

查。非洲统一组织已通过决议，从非洲解放委员会的一九七五年度预算中拨给新的共和国一百万美元。

## 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和莫桑比克

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将在一九七五年七月独立之后掌握这个国家的政权。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的领导人，也同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的领导人一样，一直受到游击斗争的艰苦经历的影响；而且，这个阵线也是非洲民族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混合的产物。但就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来说，民族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强烈地受到北京的那种通过农村革命和农业政策而树立起来的自力更生的典范所吸引。这对解放阵线领袖（也很可能是新的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萨莫拉·莫伊塞斯·马谢尔及其代理人华金姆·希萨诺说来，的确是如此。不过，这两人在他们处理问题的方法上，都不如可能担任新外交部长的马塞利诺·多斯·桑托斯那样严格地讲求意识形态。桑托斯是个诗人和知识分子，他受莫斯科的影响比受北京的更深。

在武装斗争时期，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虽然设法在流亡的运动里取得强有力的地位，但当莫桑比克解放阵线面临莫桑比克独立的现实时，这些知识分子的政治力量似乎就衰退下去了。人们可以预料，一旦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掌握政权，它吸取坦桑尼亚的朱利叶斯·尼雷尔总统的观点，将超过接受任何非洲以外的政治影响。尼雷尔作过莫桑比克斗争的赞助人；他对外国的意识形态所抱显著的反感，以及对非马克思主义的非洲社会主义的提倡，都强烈地影响了萨莫拉·马谢尔。（马谢尔愿意同里斯本的新政权合作，并表示乐于同他的强邻南非商谈经济联系，这些都已表现出他的实用主义的倾向。）

由于非洲人的战略推进到第二阶段，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对罗得西亚和南非的政策在决定事态的发展方面可能是关系重大的；同时，对罗得西亚的政策与对南非的政策，也许会有相当大的不同。猜想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决不会对罗得西亚采取敌对行动，那是毫无道理的。由于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控制着罗得西亚这个内陆的、与外界脱离的殖民地通向海洋（经由贝拉港）的最直接、最便宜的路线，因而它就有能力切断这条史密斯先生以往为逃避国际经济制裁所用的航道。然而，莫桑比克要中断罗得西亚的进出口贸易也要付出一笔代价。多年来，莫桑比克的贝拉港为了它的经济繁荣，大半依靠来自罗得西亚和赞比亚的进出口贸易。由于一九七二年封锁了罗得西亚和赞比亚之间的边境，现在赞比亚的许多贸易都选定向北取道坦桑尼亚的路线（这条路线将随着一九七五年底中国人所建的坦赞——现已改名为坦扎拉——铁路的完工而增加其吸引力），或者向西经由安哥拉的路线。即使罗得西亚真的解放了，要吸引赞比亚的货物回到贝拉来，也是不容易的。

过去，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积极地帮助津巴布韦解放运动经由莫桑比克西部要地太特省渗入罗得西亚；当前，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正在开始把它的若干旧兵营供津巴布韦游击队使用。这种合作可能为罗得西亚的游击队开辟东翼战线。

然而，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可能在早期阶段作过反对南非的保证，那完全是另一回事。当今年年中莫桑比克获得独立时，它就会发现自己几乎濒于破产的局面，特别是因为这个国家拥有的自然资源不多，因而它不但需要巨大的地方力量，而且需要较多的国际援助，以便在非殖民地的基础上合理地重建自己的经济。在这一方面，作为传统的政策和现实的地理条件汇合的结果，莫桑比克同南非的经济密切联系起来，就成为十分重要的

了。人们可以探索一下它们在经济上相互依存的三个主要方面。第一，洛伦索马贵斯（莫桑比克的首都，也是第二个重要港口）的生存能力主要依赖于南非的进出口贸易。当前这项贸易约占通过这个港口城市进行的贸易额的百分之七十五。对南非来说，从德兰士瓦东部经莫桑比克出海的装运出口，不但提供最便宜的运输路线，而且还减轻了南非自己负荷沉重的港口的拥挤。第二，莫桑比克最大的单项外汇收入来源是来自兰德金矿十三万五千名左右移民工人的工资，这些工人又是南非开采金矿极其重要的劳动力。第三，引起争议的莫桑比克卡布拉巴萨水力发电联合企业（它的建造主要是由南非提供资金的）现在即将完工。卡布拉巴萨所拥有的潜在能量远远超过莫桑比克可以料想得到的需要量，而它所仅有的另一个大主顾就是南非。

这些共同的经济利益迫使两国的政策不得不考虑它们自己不可抗拒的要求。只有莫桑比克革命政府甘愿牺牲它自己眼前的民族利益并准备使国家陷入更深的破产状态，才可能打算同南非断绝一切经济关系。但是从马谢尔最初的一些政策声明推测，这样的决定似乎是不可能的。尚待考察的事情就是：这两个政治上的当然对手为了服务于它们根本的和眼前的相互补充的国家经济利益所能搞的那种交易了。

## 安哥拉的未来

安哥拉的内部情况，完全和莫桑比克不同：它潜伏着很大的爆炸性。安哥拉解放运动总共有三个，在葡萄牙人崩溃以前，都未能在当地稳固地立住足，并且长期避免采取共同行动。其次，安哥拉的丰富资源（诸如石油、矿产、以及专供销售的农作物等），却给安哥拉的葡萄牙人带来了法定的大量的利益。（罗安

达附近和卡奔达地区的油田则除外，因为这些油田大部分已由英国人拥有的跨国公司所控制)。最后，在安哥拉六百万全体居民中，葡萄牙人组成了六十万人左右的社会集团，并且其构成的居民的少数，比罗得西亚一九六五年单方面宣布独立时白人的少数，还大了一倍。由于这许多因素，安哥拉正冒着卷入一场内战的危险，其后果的悲惨，可能同一九六〇年比利时殖民统治骤然结束后的刚果所遭受的一样。

### 关于纳米比亚的斗争

纳米比亚(西南非洲)，位于安哥拉的正南面，是旧时德国的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委任南非统治。尽管委任统治早已结束，而且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于一九六六年就已宣布南非占领西南非洲为非法，但南非当局至今还霸占着它。一九六六年，西南非人民组织建立了纳米比亚人民解放军，并开始派遣一批起义者，经由卡普里维地带和安哥拉南部，渗入了纳米比亚。于是，反抗南非统治的武装斗争，就在当地揭开了。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是纳米比亚的一个主要解放组织。它和南部非洲的其他运动有几点不同。第一，人民组织内部有两个部分，一为国外集团，是专组织武装斗争的，另一为国内集团，是继续执行非暴力政策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大规模武装侵袭，迫使南非当局不得不动调大量武装警察，分布在纳米比亚北部边境一带。这支警察力量，在葡萄牙人垮台以后，还因得到武装部队的增援，而更加加强。但是，人民组织，在派遣训练有素的战士渗入纳米比亚对黑人进行政治工作方面，还是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个组织认为，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奥万博兰黑人举行总罢工(在南非的统治下，这样大规模的罢工行动还是

第一次)的功绩,应归于他们。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第二个特点,是它同世界上任何主要势力中心的不结盟程度。它一直避免在中苏纠纷中支持哪一方;它得到西方和共产党各国的普遍承认;它的不可争议的领袖萨姆·努乔姆经常赴上述各国首都进行访问。人民组织最近于一九六九年底在坦桑尼亚举行的一次协商会议,就有西欧各国的观察员,以及捷克、罗马尼亚、苏联和南斯拉夫等国的观察员参加。它的军事援助,主要通过非洲解放组织得来。它的战士曾在埃及、阿尔及利亚和坦桑尼亚接受过军事训练。它从苏联、南斯拉夫、挪威、丹麦和瑞士等国获得的一些外援,也是由各该国家通过非洲解放委员会这个渠道输送进去的。

人民组织包括着来自各主要黑人种族集团的代表,但其主要力量,则是扎根于奥万博族的人民之中。这个种族的人数,几乎占全部黑人居民的一半。奥万博人都集中在奥万博兰省的北部,同边界对过的安哥拉南部的部族有种族上的联系。

在纳米比亚境内,人民联盟的唯一对手,就是西南非洲民族联盟,后者的国内根据地,主要被局限在南方的那个赫雷罗小部落,这部落的酋长克莱门斯·卡蓬奥是国民大会的知名人物。国民大会,由纳米比亚境内所有黑人政治组织所组成,实际上是一个自由散漫的协会。人民联盟每次参加大会都是很勉强的,最近它更公开地反对大会和卡蓬奥。在国外,民族联盟给人们的形象已经减弱,它所获得的国际支持和援助数额,也已下降到最低水准。

南非当局虽然不反对让纳米比亚人民自决,但却是反对纳米比亚作为一个单一的、不可分割的国家而独立。它鼓吹分别建立七、八个“祖国”的思想,认为这样,每一“祖国”就有权来决定各自的自由。但是,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压力,来自南非的一

些比较友好的西方国家的压力,正在日益增加,此外,一个独立的稳定的黑人安哥拉也正在出现,所有这一切,就会使压力增加到大大超过南非当局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反抗能力。由于预见到这样一种可能性,沃斯特政权早已使纳米比亚白人,针对着这个根本变革的需要,作好准备。南非已经表示,可在纳米比亚建立两个各自独立的国家。一个是北方奥万博兰全部黑人的国家,一个是南方的黑人和白人联邦。

## 关于罗得西亚

转向罗得西亚来看,人们发现,它象安哥拉那样,有着三个反对史密斯政权的武装解放组织,它们是: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简称“津民盟”),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简称“津人联”)和一个从“津人联”中分裂出来的团体,即津巴布韦解放阵线(简称“津阵线”)。此外米佐尔瓦主教所领导的非洲人全国委员会,还继续在罗得西亚境内通过合法手续,坚决要求黑人的政治权利。所有这些运动,没有一个采取过任何特殊意识形态的主张,或者在非洲以外发展过牢固的对外联系,因而在展望中,他们全是非洲民族主义者。

“津民盟”一直是在军事上最活跃的团体。它的首领恩达巴宁吉·西索尔牧师,由于进行反对史密斯政权的政治活动,从一九六六年起,就被关在罗得西亚的监狱里,直至一九七四年十一月才获释放。在他离职期间,流亡的“津民盟”是由赫伯特·契特波领导的。然而在监狱中,西索尔和他的助手们之间,似乎已经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特别是同罗伯特·缪加伯有意见冲突,后者还主张要罢免西索尔的领导职位。同样地,在“津民盟”的领导人们被释放以后,契特波也处于受责难的境地。这个运

动曾经得到坦桑尼亚和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的秘密支持。从一九七二年起，“津民盟”开始从莫桑比克太特省的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的地区里出来有效地进行活动。同年十二月，“津民盟”已经具有成功的游击斗争所必须具备的条件，那就是，在罗得西亚境内获得了一个受当地农民支持的、有适当的交通工具以便于运送武器和便于受过训练的人员进出这个国家的一个军事根据地。“津民盟”除了受到坦桑尼亚和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的帮助外，在最近几年里，还曾是得到非洲统一组织非洲解放委员会资助的唯一的罗得西亚游击队组织。

至于“津人联”，它是一个曾经分裂过的运动。它的外援，主要来自赞比亚和阿尔及利亚。自从一九六五年“津人联”的领导人同意和北京断绝关系后，还得到苏联的一些援助。它的领导人乔舒亚·恩科莫从一九六六年起就被关在罗得西亚的监狱里，直至一九七四年十一月才得到释放。作为一个流亡团体的“津人联”所遭遇的是一个分裂的经历。一九七一年，当一个罗得西亚黑人青年毕业生的团体，即通常所知的津巴布韦解放阵线在赞比亚成立时，“津人联”中有一部分人在恩科莫的两个主要助手（罗伯特·契克雷马和乔治·尼昂多罗）的领导下参加了“津阵线”，同时另有一小部分“津人联”成员，曾企图同“津民盟”合并，但是没有成功。

尽管当前的游击活动的实际效果还不是很突出的，可是，这股压力在同联合国所强制进行的国际经济制裁运动结合起来时，就在索尔兹伯里造成了一种象是受围攻的气氛。作为政治士气重要气压表的白人移民数正在下降，同时还有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的罗得西亚白人青年正在向国外移出。作为对游击队威胁的答复，罗得西亚当局采取了治安措施上的突然升级。官方宣布，从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以来，大约打死了四百六十八名游击

队员，但估计尚有三百五十到四百名左右的游击队员在国内继续活动。罗得西亚迅速地增加了防务和治安活动的开支，总数达到一九七五年国家预算的百分之十五。

史密斯政权过分的反动倾向，却起了有利于游击队的作用。该政权在东北地区实行了粗鲁的强迫十万人左右的部族居民重新定居的横蛮政策，促使一些原来基本上是驯服的农村居民，转变为实际上是不满意于白人政权的居民，他们比以前更愿意为起义部队提供新兵了。

葡萄牙人在非洲政权的崩溃，显著地改变了津巴布韦解放部队进行活动的环境。一方面，由于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在附近的莫桑比克掌了权，又由于非洲统一组织的非洲解放委员会新近正集中力量于解放罗得西亚，因而游击队活动的可能性增长了。另一方面，由于某些非洲黑人总统同南非共和国在卢萨卡作出的趋向于缓和的成果，因而在罗得西亚也存在着重要的新的谈判机会。现在索尔兹伯里不仅面临着同莫桑比克接壤线上的更加可信的游击队活动的威胁，而且似乎很有可能，由于沃斯特政权已经在卢萨卡提供保证的结果，索尔兹伯里还会丧失南非的军事援助。

就是在这个稳定的新的背景前，伊恩·史密斯同意暂时释放包括西索尔和恩科莫在内的罗得西亚黑人政治犯，以便他们去卢萨卡参加实现上年十二月的协定。在那里，各位黑人总统实际上是在强迫各个解放部队同意联合在非洲民族委员会的保护伞之下，并解散其他的、无论是流亡在外的或是在罗得西亚内部的团体。重新组织的委员会的临时领导集体，则由乔舒亚·恩科莫、米佐尔瓦主教和西索尔牧师组成。黑人领导者们，在保持同史密斯政权继续进行宪法谈判和释放全部被拘押的人犯的条件下，保证停止游击队的活动。

尽管这些解放部队经常宣称，他们不会接受比多数人的统治更差的条件，可是临到成功的时刻，他们却没有能够坚持。这样就留下了余地，使就卢萨卡协议中所建议的，关于分阶段移交政权的日程表进行谈判。然而史密斯先生曾时常宣称：在他自己的一生，他不会看到黑人的多数统治。但他会不会将这种态度坚持到底，还不清楚。然而毫无疑问，罗得西亚的新的孤立，可能会增强某些罗得西亚白人的势力，这些白人主张，只有同罗得西亚黑人谈判获得结果，将来才能提供任何合理的前景。各解放团体都希望这种展望得到胜利，要是它失败了，那末各团体就准备实行他们的另一种选择，即发动一次决定性的武装斗争。这样一种起义的企图，就会使索尔兹伯里面临着虚弱的、破灭的、象曾经颠覆葡萄牙人的非洲政权的经历那样的前程。

## 武装斗争和南非

虽然在南非共和国国内，黑人解放运动还没有成为严重的因素（纳米比亚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除外），可是在他们的国土上，现在却有了三个奉行以武装斗争作为实现多数统治手段的各自独立的南非人团体。目前，所有这三个团体的活动，大部分是流亡在国外的人进行的。

三个团体中最突出的一个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国大”），它是这个国家的最老的一个黑人民族主义运动。从一九一二年它的创立直至一九六一年，“国大”都坚定地遵循着非暴力政策。但是在末了的一年，它在纳尔逊·曼德拉的领导下进行了武装斗争，随后于一九六四年，曼德拉被判处无期徒刑，监禁在罗本岛上，他的罪名是插手建立“民族之矛”这个起义团体。在以后的年月里，流亡的“国大”，通过招募南非黑人去国外受

训，继续建立游击队伍，而同时也试图在国内创立地下小组。这个流亡团体在坦桑尼亚设有自己的总部和训练营，并且还在阿尔及利亚和赞比亚享有种种方便。这是在曼德拉以前当律师时的伙伴、现任“国大”代理总主席奥利佛·坦博的领导下进行的。除了在一九六七年的一个短暂时间里，“国大”的部队曾经参加“津人联”反抗罗得西亚的一次无结果的联合军事行动外，它没有表现从事公开的武装斗争的企图。

在它的大部分历史中，“国大”是积极地反共的，而且，它的会员资格只局限于黑人。在六十年代里，这些政策被削弱了，因为当时“国大”已同南非国内的其他“大会”组织（值得指出的是：南非印度人国民大会，民主主义者大会和南非工会大会）建立了工作关系。在所指出的其他三个“大会”中的第一个的领导中，具有强烈的共产主义因素；第二个，则是被禁止的南非共产党的前线组织。在流亡中，“国大”继续执行着只限于黑人入会的政策，但它已开始同其他的流亡的“大会”比较紧密地携起手来了。结果是，尽管坦博和他的主要助手们煞费苦心地努力保持旧日的组织的独立性，可是“国大”已经受到共产党人的影响了。况且，对“国大”的主要支援，除非洲统一组织所提供的以外，就是来自苏联和东欧国家，因此在运动中，坦博就难以拒绝给共产党人担任某种职务了。（确实地，“国大”在中苏斗争中，是公开站在莫斯科一边的，同时尽管它的大部分军事人员是在阿尔及利亚和坦桑尼亚受训的，但是有些干部则是在东欧和古巴受训的。）

许多年来，“国大”的主要对手是一九五九年从该组织分裂出去的，在罗伯特·索布克韦领导下的泛非主义者大会。这个团体在一九六〇年被南非当局宣布为非法，而索布克韦在罗本岛度过了十年之后，现在还是一个被管制的人，住在金伯利。在

流亡期间，泛非主义者大会这一个具有黑人意识的反共组织的力量已经衰退了，原因是由于发生了一系列的分裂，失去了它的大多数最能干的领导人。在这个组织的坦桑尼亚训练营中，只有很少数的武装游击队，而它之所以能够在流亡中维持下去，全靠非洲解放委员会的大力支持。而令人费解的是，非洲解放委员会所给予这个组织的基金，同这个组织的实力完全不成比例。

第三个承担着对比勒陀利亚白人少数政权进行武装斗争的流亡组织，是一个主张贤人政治的小团体——南非非洲人民民主联盟（简称“南非民盟”）。它是从“非欧洲人统一运动”产生出来的，其领导人员大都是托洛斯基分子，并且是由一些中级职业人员所组成。它在流亡中的领导人是艾萨克·塔巴塔，一个有名的托派小册子的编写人。他曾经搞过反对共产党政府卷入黑人解放运动的运动。“南非民盟”曾经遣送若干受过训练的干部向南非渗透，不料很快就遭到逮捕、审讯和监禁。到目前为止，它没有得到非洲解放委员会的财政支援。

在一九七四年事件的后果上，南非的解放力量和他们在非洲解放委员会的忠实朋友们，都看到有更好的机会，可以通过发动反对南非的武装威胁，以取得南非在政治上的让步。他们相信：紧随着莫桑比克（还有安哥拉的）黑人政权的巩固，加上继续对罗得西亚白人霸权施加压力，或者干脆就排除罗得西亚白人霸权，加强实行武装斗争，就足以使南非成为国际瞩目的中心，并有助于动员非洲其他方面对解放事业的支援。这个战略目的之一，是要对西方的决策者施加压力，使他们减少对南非共和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援助，同时这个战略又是削弱比勒陀利亚政权并促使它在国内政策方面作出一些有意义的改革的手段。

上述战略除产生这些外部的结果外，还被指望能导致这个

种族不和而经济繁荣的国家的改革。

这样一种战略的成功，主要决定于沃斯特政权实际上面临着什么样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怎样去理解它们。武装斗争战略的拥护者认为在这一点上，已经看到了某种令人鼓舞的趋势。他们指出：南非在世界大家庭中更加孤立了——这从联合国大会驱逐南非的压倒多数的表决上得到证明；对解放运动的援助在不断地增长，援助不仅来自非洲和阿拉伯各国的政府，而且还来自苏联、中国、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和其他国家。西方国家也已大大地意识到南非种族分裂的严重性及其对南非白人少数政权的前途以及对于西方国家的投资的影响。在南非内部已经有许多信号：不仅黑人的斗争性增强了，而且在南非的白人方面，也大有向隐藏在白人优势的现状背后的历史悠久的傲慢进行挑战的准备；南非政府对于北部边界的形势，自从葡萄牙政权崩溃以来，就愈来愈感到紧张；同时在白人当中，更加明白地意识到，虽然要求改革的外部压力还不难处理，可是内部的压力却正在增长。南非总理本人曾经用迫切的言语谈到，共和国内部需要改变一些情况，同时他答应在种族隔离政策的应用上，要消除那些比较使人不愉快的部分。虽然，十分值得怀疑的是：依靠他脑子里的这种装饰门面的措施，会不会使这个国家的黑人多数及其国外支持者得到满足。

正如在本文开始时所提出的那样，南非的黑人运动不能指望从非洲统一组织那里立即输入大量的军事援助，因为非洲统一组织目前已经决定要倾全力于解放罗得西亚。

尽管目前有缓和的空气，可是南非对于解放运动及其支持者所提出的挑战，仍然感到紧张不安。最近几年来，南非政府发言人使用着可怕的言词，说什么已经存在着“外界的力量威胁着非洲人民的和平共处”，或者甚至于说受到“也许是埃及的空军

或受坦桑尼亚的米格十七式飞机的空袭威胁”。在这种被围攻似的气氛中，南非的国防预算，就从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四年度的六亿八千八百万美元猛升到一九七四至一九七五年度的十二亿美元。南非共和国现有武装部队二十万人，预备队约八万人。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一九七四年，内南部非洲黑人的民族自决，正大步地向前进展。今年它将继续前进，随着安哥拉、莫桑比克、佛得角群岛、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岛、以及科摩罗群岛的法国领地等那样地实现独立而继续向前迈进。而且反对次大陆上余留下来的两个白人少数政权的压力，预期还有可能会增长。

在整个南部非洲探索黑人多数统治的过程中，武装的解放团体曾经受到非洲统一组织的坚决支持，并且同这个顾问团体共同确定了一个基本上是非洲民族主义的方针，以共同防止外来影响注入南方白人统治区的解放斗争中来。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一、二月号美国《共产主义问题》杂志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谷凡译）

日中友好协会(正统)机关刊物:

## 《日本与中国》周刊简介

《日本与中国》创刊号为三十二开本八页,于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日由日中友好协会筹备会(一九四九年十月开始活动)出版。同年八月一日第三号起,改为十六开本四页,每月一期。当时,在美军占领下,用纸和取材都极其困难,但中国人民从海外送来照片和报纸、杂志。那时,协会的干部只因散发从中国送来的《人民日报》,就遭逮捕,被判处作苦工五年,在这样的环境下,《日本与中国》还是继续发行。

随着在全国各界、各阶层的会员和组织的扩展,从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的第十七号起,每月出两期,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的第五十六号起成为旬刊;进入六十年代,页数也增为六页、八页。

十六开本改为大张的四版,是从一九六三年一月一日开始的。

一九六六年是大动荡的一年。当时《日本与中国》的每期发行数字超过了三万份。为了把发行量扩大为数十万份,就在全象网一样地设置分、支社;名称也从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一日的第四九一号起改称为《日中友好报》。从七月四日的四九三号起成为大张的六版的周刊。

日本共产党堕落到反华,日中友好运动不得不出现分裂。

日共分子篡夺了这个报纸的发行权,使报纸从五一一号起就成了反中国的“机关报”。因此,我协会(正统)于公元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出版了《日本与中国》复刊第一号,也就是总号五一一号。从那时候起到今天,《日本与中国》就息息相关地反映了我协会生气勃勃的波澜壮阔的活动。进入复交后的新阶段的《日本与中国》,遂成为具有数十万读者的日中问题唯一的专门报纸。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一日复刊第四一五号日本  
《日本与中国》周刊 福建师范大学李茂忠译)

## 近年来日本有关中日战争问题的著作

一九七五年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失败的三十周年。为此，日本出版了一些有关中日战争的著作。

熊泽京次郎的《天皇的军队》(现代评论社)，主要根据“衣”师官兵的口述材料，描述了日军在山东省的暴行。高桥实的《花冈矿山上的中国人》(《中国研究》第五十五、五十七期)，是一篇关于被强行抓走的中国人的遭遇的调查报告。

同时，还发表了不少中日战争时期身在中国、和中国人民一起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过斗争的人们的回忆录。先前连载于《历史评论》的中西功的《在中国革命的暴风雨中》，由青木书店汇印成书。抗日战争初期来我国参加反侵略战争工作的革命作家鹿地亘，战后搁笔甚久，近年以小说体裁写了《上海战役中》，由东邦出版社出版。原为日本士兵、被俘后成为八路军战士而参加中国革命队伍的水野靖夫，写了《同日本军队作战的日本兵》(白石书房)。《现代史》季刊第五期发表了对同一经历的香川孝志的访问记《从俘虏到反战士兵的转变》。作为水野、香川等人回忆录的证明材料，延安《解放日报》所载有关消息已经译成日文，由太平洋战史研究会汇编为《华北日本士兵的反战运动(一)》。

中日战争时期也在中国，但当时属于日本侵略者阵营的人物所写的回忆录，较重要的有松本重治的《上海时代》(上、中、下三卷，中央公论社出版)。这部回忆录所涉及的时间，是从作者于一九三二年底就任“同盟通讯社”的前身“联合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时起，到一九三八年下半年他因病返回东京总社时止。作者因为职务的关系，当时了解一般人所不知道的日本军事政治动向，他同在华日本官方人士又有工作上的联系，因而他叙述的历史事实，客观上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情况。该书下卷记述了当时同松本重治有关的对国民党政权诱降的活动。作者同我国一些亲日派人物、汉奸有过密切的接触，对他们的言行作了详细的记录。这部回忆录对于研究当时国民党政权的卖国投降活动，提供了一